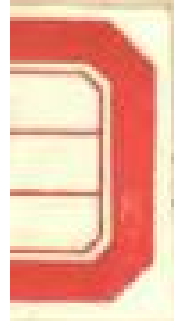



GAOKELIN YISHI

高克林回忆录

行同



高克林回憶錄 行日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高克林回忆录

江长录 整理 李伯森 核校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20千 插页:6

1987年12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9·108 印数:1—2,000册

ISBN 7-204-00245-8/k·15 每册:3.00元



高克林

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著 王德平、孔慶雲
 編次 齊東林校印

同不刊 校=原約

- (一) 魯忠才長征記 內容詳述其口五十四年，實支二十八元。在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最多計數是幾十元），在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
- (二) 魯忠才長征記 內容詳述其口五十四年，實支二十八元。在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最多計數是幾十元），在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軍隊計數的數目是幾十元。

出

七十五元，存款一百五十元。到時是... 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長征記...

- 4、看路上不住房，衣口放得不算草，則每兩塊可省五十元以上。那看下均就是講的。
- 5、到國家法法要多注意。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長征記 魯忠才著 齊東林校印

1941年9月，毛澤東主席來電修改《魯忠才長征記》的手

志。



1946年春，大青山支队主要负责人在凉城县合影。左起：
康健民、高克林、姚喆、李井泉、高增培。



1948年12月，绥远
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
就职合影（部分）
前排左起：乌兰夫、
高克林、傅作义；后
排左起：王克俊、杨植霖。



与谢觉哉同志合影。



1958年10月，高克林与董其武上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965年10月，在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宴会上。左起：陈漫远、赛福鼎、贺龙、王恩茂、高克林、刘春、沙里斯、陈克寒。



1978年10月，僑夫人王希宁，与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左）参观古田会议旧址合影。



1957年，高克林（左）与张稼夫（中）、秦仲方（右）在青岛。



1986年6月，高克林与绥蒙老同志合影。左起：白成铭、杨植霖、苏谦益、高克林、张达志、贾春明。



1980年7月，高克林和已故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右)在黑龙江省视察工作时合影。



1986年12月，高克林在渭华起义旧址文管所与渭华老同志合影。



1986年12月，高克林（前）在渭华起义旧址参观。

书赠高克林同志

生行定征敌程颂营
平实未前残正赞经
贯尚惊又平入皆好
己节旗破外墙欣愿
克名擎南塞萧欣只
持重罪笊戈扫后书
矜历伐牢横净劫苗

楊植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

1941年8月26日

高克林同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原载1941年9月14—15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篇调查报告拟定了题目，并且写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所谓的“征长”，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活跃城乡经济生活，陕甘宁这区富县城关区组织人力、畜力去定盐池运盐，取得成功。调查报告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成就和经验教训，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问题讲得这么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同四十年前大不相同。我们从事的经济工作，其复杂程度，是过去完全不能比拟的。更加需要人们深入到经济生活里面，掌握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目前在不少同志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识不足，学习不够。我们要系统地学习基本理

论和专业知 识。同时，要大 兴调查 研究之 风，钻到 沸腾的 生活中 去，向实 际学习。 我们的 宣传工作 要实在地 而不是浮 夸地，深 刻地而 不是肤 浅地反 映这方面 的情况。 从这个 意义上 说，重新 看看《 鲁忠才 长征记 》，还 是很有 教益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四十期上关于重印《鲁忠才长征记》的说明。

序 言

看了《高克林回忆录》，使我这个对华北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缺乏切身理解的人受益匪浅，我乐意为之作序。

1940年晋西事变以后，我看了高克林同志所写的《鲁忠才长征记》这本小册子。这是我首次得知高克林同志其人。这篇调查报告说实话、讲实事，朴实无华，不仅回答了运盐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且证明了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对这篇调查报告作了很高的评价。

1942年底，我从延安回到中央晋绥分局后，开始和克林同志有了工作来往。在此后的几十年交往中，我对他的印象是人如其文。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脚踏实地的人。他在工作中具有相当高的组织工作能力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没有主观主义习气，善于虚心倾听不同意见，也善于团结各种类型的人，甚至过去是曾经站在敌对立场反对过他的人。

1942年8月，高克林同志到绥蒙地区工作。在这

一地区，他先后任塞北工委书记、绥蒙区党委书记、绥远省委书记等职。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把绥蒙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和侵华基地，在其“蒙疆”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频繁进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扫荡”。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我们除部分主力部队和部分游击队、武工队外，主力部队从大青山突围，转移到雁北的偏关一带。克林同志到这一地区后，他和党委的同志们团结各族人民，坚决执行党的“挤敌人”方针，并在敌占的大城市、交通要道采取隐蔽的政策，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绥远和平解放中，他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的战略思想，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合作，使绥远地区顺利实现了解放区化，使起义部队实现了解放军化，受到毛主席的赞扬。随后，他又和董其武率领这支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人民又立了战功。

全国解放后，高克林同志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高克林回忆录》写的是克林同志在抗美援朝以前的革命活动。他从小参加革命，早年参加并领导过著名的渭华起义。这本书写的不仅是他对自己历史的回顾，而且也叙述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而且也有失败的教训。

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在绥蒙和雁北地区的工作中，至今有不少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应由过去工作过的同志共同负责。至于有关晋绥地区的整风审干中的问题，以及晋绥土改中的若干问题，则首先应由分局负责，不应将它说成是地区性的问题。

这本书依然保持《鲁忠才长征记》的文风，文笔朴实，亲切感人。它是党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有益教材。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读一读《高克林回忆录》，会得到不少教益和启示。

张稼夫

1988年1月于太原

目 录

序言	1
一、开始革命生涯（1907·3—1925·11）	1
风雨年代的家庭	1
反感孔孟礼教	4
初见魏野畴	6
寻求救国真理	9
组织罢课斗争	11
青年生活社	15
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17
驱逐军阀吴新田	21
转为中共党员	24
二、渭华起义前后（1925·11—1929·8）	28
派入国民军	28
创办军校	35
组建许旅	38
参加起义	45
三反“围剿”	53
陕北找党	60
三、在河北的日子（1929·8—1933·12）	64
任北平军委书记	64
天津被捕	67

监狱绝食斗争·····	70
任直南特委军委书记·····	75
盐民斗争·····	80
奉命赴沽源·····	83
四、在陕甘宁边区 (1933·12——1942·8)···	86
回陕找党组织·····	86
组织临时省工委·····	90
合水被捕·····	92
虎口脱险·····	95
洛川建党·····	98
给中央写运盐报告·····	103
《鲁忠才长征记》·····	104
办民族学院·····	112
五、在塞北抗日前线 (1942·8——1945·9)···	117
受命大青山·····	117
兴县会议·····	119
渡河谈判·····	122
晋绥分局的指示信·····	124
渡过艰难岁月·····	130
偏关整风·····	136
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140
六、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9——	
1948·10)·····	144
随贺龙征战·····	144
停战命令之后·····	147

两年的土改斗争·····	150
把战争引向蒋管区·····	156
七、绥远的和平解放(1948·10 — 1950·1)···	163
大势所趋·····	163
“绥远方式”的提出·····	166
县委书记会议·····	168
艰难的和谈·····	172
执行《协议》·····	176
联络处进驻归绥·····	178
在省扩干会的报告·····	181
“九·一九”起义·····	184
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188
进入归绥的工作方案·····	190
毛主席再次接见·····	194
省委移驻归绥·····	199
建立新政权·····	205
八、改造起义部队(1950·1 — 1952·5)···	209
安置绥西人员·····	209
合并整编·····	211
学习运动·····	214
团结改造·····	218
悼念烈士·····	221
抗美援朝·····	223
易地整顿·····	225
赴朝参战·····	229
后记 ·····	235

一 开始革命生涯

(1907·3—1925·11)

风雨年代的家庭

在陕西省华县赤水镇南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它南靠秦岭，北向渭河，东临遇仙河，西挨赤水河；水源丰富，灌溉方便；土地肥沃，物产富足。村东有两个小竹西，郁郁葱葱，四季常青；村周围有关公庙、娘娘庙、三神庙和阎王庙，给村堡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1907年8月11日，我就降生在这个村庄——华县赤水镇程高村。

我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风雨年代。那时，清王朝腐败不堪，濒于灭亡；帝国列强，鱼肉中华；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爱国志士，奔走呼号，倡导革命。整个中国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动乱之中。

程高村里的人主要有两个姓：一个姓程，一个姓高。还有几户杂姓，其中一户是乐人，红白喜事给人吹唢呐。姓程的有权有势。里正（管赋税的基层小官，

和村长不同)是姓程的,村长也是姓程的。村里文有秀才,武有武举,几乎都是姓程的。姓高的无势、无钱,多是穷人。有竹匠、木匠、理发的,还有刀客。高家有两个祠堂,我在东祠堂念书。清明祭祖时,高家祠堂熬一锅菜,每人吃一碗。好时,还给每人发几个烧饼,这是男人的特殊福份,因为女人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

为了生计,高家就不得不奉承巴结程家。有一年,我家种了二亩大烟,为了少缴点税,父亲给里正买了一盒点心。我没有见过点心,感到很新奇。父亲对我说:“象里正这样的人才能吃点心。”那时,我们都盼姓高的也出个有权的人。高家有个高善人,是唯一能供孩子到省里读书的富户。大家都希望他儿子考上法政大学,将来做个大官。后来,他儿子被医科大学录取。为此,我父亲常叹息:“高家命运不好,后继无人才。”这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泛起了缕缕疑云:我们诚心祭祖,祖先为什么不庇护我们?我们虔心敬神,神灵为什么不保佑我们?

在动乱的岁月,我的家境也每况愈下。我家有水浇地十四亩,坡地四亩。家庭兴盛时,一家人能吃饱穿暖。遇到丰年,还稍有节余。我十岁左右,父亲患了肺病,而且越来越严重,繁重的农活使他力不从心。他管养不了马,就把马倒换成骡子。之后,又把骡子倒换成牛。稍有灾年,还得借粮度日。为了一家人的

生活，父亲不得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冬灌小麦时，两脚踩在冰水中，两腿的汗毛上结满了冰珠。我心疼地叫他快出来。他却饱含辛酸地对我说：“吃饭并不那么容易。不这样，就吃不上饭。”

为了减轻父亲的生活重担，我从小开始学做家务农活。担水扫地、割草喂牛、搂柴出圈，都是我常做的活。摇耒时牵牛，浇地时看水，夏收时割麦，秋收对拾棉，都是我常干的活。同时，我还学会了犁地、扬场等技术活。一次，我上坡割草，不小心从坡上滚下，镰刀割破了我的手，至今伤痕犹在。在初涉人生的道路上，我就感到人生之艰难。

1922年4月前后，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一场祸国殃民的直奉战争。盘踞在陕西的草阎乘机拉夫派款，百姓恐慌万状。白昼锁城门，夜间不敢出。陕西代理督军刘镇华乘机横征暴敛，每里强收白银五百两、麦六十石、豌豆三十石、麸子六十石、草二十万斤，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兵荒马乱之时，我父亲又不幸摔伤。我出城请医，只得从城门下钻出去。请医生回来时，坡门还是叫不开。那时，没有权势的人坡是叫不开门的。医生无奈，给了点药就把我打发回去了。后来，父亲的肺病一天比一天重。临终时，他怕我承受不了这样大的打击，断断续续地安慰我：“我不算夭折……我

已经活了四十多……”我万没想到父亲这样早的丢下了我们。我从里正家借了口棺材安葬了父亲。这时，家里只剩母亲、我和十岁左右的弟弟。我失去了完整的家，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我既恨军阀混战的社会！更痛恨不平等的户族压迫。我也在苦思：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社会现实？

反感孔孟礼教

我父亲笃信孔孟之道。在我家二道门的上头，写着“耕读传家”的横额。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家祖祖辈辈只是耕而不读。父亲没有考上童生，遗憾终生。他把希望又寄托在我的身上。他希望我象孔子表扬孔文子那样“敏而好学”。故给我起了个“高文敏”的雅名。实指望我念好书，有所作为，改换门第，光宗耀祖。其实，父亲对我有所作为的要求只不过是将来能做个小学教员。在他的眼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六岁时，父亲把我送到本村私塾念书。先生给我教“人”、“手”、“足”、“刀”、“尺”。父亲还嫌敏的少，又在家敏我念《三字经》。先生教的我尚不能消化，《三字经》我怎么能理解？这不过是慈父的一片苦心。父亲专给我准备了个小凳子，供我写字时用。每天饭后，我坐在小板凳上，父亲手把手

教我。父亲准备了个手板，上面写着：“打以教之”。稍有不顺，就“打以教之”。我记得一次最多挨过三十个手板，把我打得晕头转向。念书，简直成了我最大的精神负担。

我八岁那年，私塾换了先生。我又开始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礼记》等。后来，我父亲听说离村十里的圣山村有个吕先生，曾考过童生，很有名望。我十一岁时，父亲把我送到圣山村的私塾念了一年。因学校离家较远，我就在圣山村义父家吃住。此后，我又到渭南县郭家村姑父的私塾里念了一年。我姑父是个秀才。他以后被聘请到渭南县固市镇教学，我也随他到固市镇念了一年。我十三岁那年，父亲送我到华县教育高小上学。开学时，学生要先交十串钱作为学费和饭钱。当父亲和母亲把沉甸甸的铜钱抬到驴背上时，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念书呀！你上学可不容易啊！家里为你摊了多大的本钱！”我心里却想：要是孔孟不写书，我也不受背书之苦，家也不费筹钱之难。

父亲对我要求十分严厉。他常说：“宁落绝门，不落骂门。”他不许我和女孩子来往，不许我和村里同龄孩子玩耍。孩子们知道我循规蹈矩，不敢和他们打架，就有意逗我，开我的玩笑。我只好忍气吞声。晚上，父亲是绝对不让我出门的。孩子们结伙在我家后墙外叫我的名字，有的还挑衅性地骂我。我有时也想

跑出去和他们比个高低。但慑于父亲“打以教之”的家规，只得暗自跺脚。

白天，我受先生管教；晚上，又受父亲约束。他对我严令除了背书还是背书。当我流露出厌倦情绪时，父亲除了使用手板之外，就是重复“要知书内有黄金，高点明灯下苦心”等一套说教。那时，我用死背的办法，通背会了《论语》、《孟子》。但我横竖看不到书内的黄金，留给我的只是不愉快的回忆。

在我十五岁那年，家里用五十块白洋给我娶了个媳妇，媳妇是我二姑给介绍的。由于对这个包办婚姻不满，我后来连二姑家也不去了。结婚时，给我披上红布，戴上礼帽，还叫我给媳妇作了三个揖。在大人的摆布下，我别扭地完成了繁琐的结婚程序。家里请了几席客，送客时，我不愿送岳母。父亲直瞪眼，我只得违心从命。当我送客回来后，父亲用木杈把狠狠教训了我一顿。这些封建礼教使我当众出丑，更增强了我的叛逆心理。我开始琢磨：封建礼教何时能改变？孔孟之道谁人能推倒？

初见魏野畴

1920年，我到华县教育高小读书。校长叫杨鹤年，是个开明人士。第二年8月27日纪念孔子诞辰时，校长请咸林中学教育主任魏野畴给学生作报告。

魏野畴是陕西省兴平县人，1898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过爱国反帝斗争，并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秦钟》、《共进》刊物的领导人和撰稿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也是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对于魏野畴的英名，我已有所闻。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期间，魏野畴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他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从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要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去代替封建主义的一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在他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文字学、农学等课程，加强了英语、体育和音乐教学，改革了国文、历史课的内容。在讲授历史课中，他使用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在讲授社会进化史中，他教育学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勿作时代的落伍者。为了锻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 ability，他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体育、文娱和社会等有益活动。他导演的新剧《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华县县城和附近各县。

魏野畴已成我心目中的伟人。能听到他的报告，我感到幸运。我默默祝愿他报告成功，不负重望。魏野

畴终于出现在讲台。因我的个子矮，被安排在前面听讲。我看得真切，听得准确。他中等个子，穿着长袍，清瘦的脸庞，带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谁也没想到在纪念孔子的大会上。他选择了批孔的题目。他声音宏亮，吐字清晰，把孔子的学说大卸八块。他以详尽的材料，鲜明的观点，严密的论证，把孔孟思想批得体无完肤。他说：“东方固有的混沌思想或为一般顽固遗老拥护着毒害我们，或附会古今中外学派，提倡武断谬误思想毒害我们。我们要十分审慎，免得这些毒菌传染给我们。我们防毒的唯一凭借，就是千万没涸蔽自己的感觉，把别人的口舌当自己的眼睛，或把自己的耳朵当眼睛。我们不要信什么‘金科玉律’和‘天经地义’。现在，我们须得自己教育自己，并要用科学的方法学习，防止混沌思想的传染。”最后，他借出：若学校继续使用旧教材就是误人子弟，给学生灌输封建主义毒素。

魏野畴的批孔报告给华县威林中学、教育会高小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思想，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找到了批孔的理论武器，孔孟的偶像在我头脑中垮掉了。我对“天经地义”的神鬼论也打上了问号。一次，先生出了《清明祭鬼论》的题目，叫学生作文。我的论点是无鬼。论据写了两个：一是一年清明祭一次鬼。吃一顿饭，鬼会被饿死；二是人死了后都变成鬼，地狱怎么能容得下？尽管我的无神论是这样的

肤浅和幼稚，然而，它却引起了我对社会的新探索。

寻求救国真理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陕西以后，西安、三原等地学生罢课游行，揭露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西安学生不顾军阀陈树藩的阻抗和威胁，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在广大人民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从这个时候起，反帝爱国的思想意识在我的心中开始萌发。

在高小学习中，我更多地了解到日本、英国和其他列强侵略我国的罪行。朦胧意识到中国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乱也是帝国主义捣乱的结果。我和同班同学乐以成、同继志等七八个同学组织了“互励会”。整天扩膀子，练武艺，准备将来和英、日侵略者较量。那时，我还跟潘自力学跟足球，培养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潘自力是咸林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他英勇强悍，外号“潘狮子”，是足球场的健将。我们都不约而同把打倒英、日列强作为共同目标。后来，潘自力在魏野畴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共陕西地区较早的领导人之一。

我高小毕业之后该怎么办？这将是我人生的关键

抉择。我想继续上学，家庭情况不允许；在家务农吧，我又不甘心种庄稼。因为在我的心里还有一连串问题有待解决和实践：怎样摆脱封建统治？怎样消灭剥削压迫？怎样赶走英日列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在思索无奈的情况下，我一方面种地，一方面到赤水职业学校去看书。这个学校是我农哥王尚德办的。他是陕西党组织的首创人之一。在武汉中华大学上学时，他就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参加了恽代英领导的进步组织“利群书社”。1922年8月，他受武汉党组织和董必武同志的派遣，回陕发展组织。在渭南赤水一带，他组织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在此基础上，他集资办起了赤水职业学校。他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底，他与张浩如在赤水开始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团的组织。随后，他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建立了赤水支部干事会。不久，团的赤水支部又扩大为赤水特别支部。

在赤水职业学校里，我仿佛进入了新的知识天地。《新青年》、《响导》、《马克思传》等充满革命气息的书刊使我大开眼界。《共进》刊物上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战斗檄文，字字印在我的脑海：

“生命之火烧了！

自由之花开了！

不必再在苦痛中求生路了！

杀死恶魔，
赶走群鬼，
收回我们已去的权力！
达到我们期望的自由！

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我勇敢地加入了驱逐军阀刘镇华的行列。在华县城一带，也有我撒的驱刘传单。

我的表哥不仅鼓励我参加社会活动，还诱导我学习革命理论。在他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玄学与科学的论战》、《陈独秀文存》等，知道了马克思、列宁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领袖，了解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这时，我觉得眼前好象一片光明，昔日苦闷烦乱的情绪一扫而光。因为我要寻觅的救国真理找到了。我的精神也有了新的依托，这就是共产主义。

组织罢课斗争

母亲看我经常到赤水职业学校，就对我说：“你父亲在世总想叫你把书念成。当个先生，有些名望，再不受人的气。我看你还是再念几年吧。”我知道家里给我娶媳妇、给父亲办丧事已借债一百多元，上中学要的学费就更多了，我怎么能上得起呢？后来，听

说在师范读书不要学费，公家还管吃穿。母亲对我说：

“家里事慢慢混。只要你念好书，我就有了指望。”

我深为母亲的深明大义所感动。为我前程，她又得付出多少艰辛的代价啊！

1923年暑假，我含泪告别母亲，到西安去考师范学校。

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十一个封建王朝曾在这里建都。雄伟的城廓、宽阔的街道，使我惊奇兴奋。我就要在这儿上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不巧的是师范学校考期已过，这怎么办？我到同村老乡程云蓬那里请教。他说：“师范学校是秋季始业，成德中学是春季始业。你先在成德中学补课，年后考成德中学。”这样，我就在成德中学补习功课。到寒假时，我才回家。1924年春节后，我带着母亲借的三十元钱到成德中学考试。在报考的二百多名学生中，我幸考第一名。我给学校交了十元钱学费，就算是成德中学的学生了。在编班时，我和吕剑人、王菊人等四十余人编在一个班。我当班长，吕剑人当副班长。开学两个月后，我带的钱花完了，只得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学校教育主任姓卫，是华阴县人。他认为我是好学生，不同意退学。他安慰我说：

“下学期给你免学费，其他费用以后再说。”在亲友的资助下，我勒紧腰带继续上学。

这学期开学不久，张秉仁从华县咸林中学转到了

成德中学三年级。因他班的宿舍已住满，他就和我住在一个房子。我俩趣味相投，无话不谈，关系十分融洽。一天，我在他抽屉发现一本《sy》（社会主义青年团刊；以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刊，即《cy》）的刊物。我知道他是团员后，更接近他了。他不仅让我看团刊，而且还给我推荐了许多进步书籍。

3月的一天，张秉仁问我：“你愿见魏野畴吗？”对于这个才华横溢、思想敏锐的教育界名人，我早已仰慕不已。怎能不愿见他？当时，魏野畴是西安一中的训育主任。我和张秉仁一块来到魏野畴的教学办公室。他和蔼可亲地同我们拉家常，问寒暖，很快使我消除了拘束之感。从此，我就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他也成了我早期革命的指路人。

成德中学是陕西省原督办陈树藩办的私立中学。它以“成”全封建道“德”为宗旨，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宣扬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学校落后势力占统治地位，对主张教学改革的教员横加排斥，指责宣传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是“过激分子”，说他们“违背了孔孟之道”。所以，这个中学成了西安地区顽守旧思想的落后堡垒。

成德中学有个姓潘的数学教员，公式概念总是讲不清。学生给这个教员起了个“潘浆子”的绰号。“潘浆子”课教不清，又不想多讲。还没到6月，他就草草结束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学生要求他继续教第二学期

的课程，他不答应。我把学生的意见反应给校长，校长满不在乎地说：“这一学期怎么能上下一学期的课？你们课上完了就开始复习！”学生的意见被校方否决以后，大家都十分气愤。我给魏野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他斩钉截铁地说：“组织罢课斗争，改变这个学校政治上沉闷的局面！”在魏野畴的指导下，我们班开始了罢课斗争。校方感到震惊，多方劝解学生复课。高年级学生对我们声援支持。社会舆论也都在学生一边。魏野畴向我们推荐曾反对教育厅长尊孔而出名的王授金作罢课顾问。我和吕剑人是学生代表。我们向校方反映了学生的两个要求：一是另请教师上课，二是罢免“潘浆子”。校长采取推托的态度，说换教师要等到下学期。罢课坚持了二十多天还没结果，学生情绪逐渐低落。这时，校方对学生又进行威胁：“不愿复课的学生挂牌除名！”我说：“你们敢挂牌子。我就敢把牌子砸烂！”那时，开除学生是要挂牌子的。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没敢开除一个学生。临近暑假，学生对罢课失望，除我外全部复课了。

这次罢课虽然失败了，但却是我组织革命活动的一次有益尝试。教训和经验同样宝贵。这次罢课的教训一是群众发动的不充分，没有形成全校罢课斗争态势和社会的强大舆论，对校方压力不大；二是没有形成斗争的核心，学生思想不统一，经不起对间的考验。

罢课失败后，我该怎么办？我又求教于魏野畴。他筹思片刻，作出了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抉择：“不念书了。进行革命！”我问：“我在那里吃住？”他说：“我们一块吃住吧！”从此，我告别了学校生活。在魏野畴的资助下，我开始了职业的革命生涯。

青年生活社

1924年8月，为了进一步组织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我跟魏野畴、张秉仁等创建了青年文学社，并出版《青年文学》旬刊。魏野畴是主编，张秉仁是编辑。张秉仁是在校学生，魏野畴还有教学任务，只有我一个青年文学社的专职人员。《青年文学》是四开单页的铅印刊物，每期印数近千份。我负责编辑以外的所有杂务。从印刷到发行，都是我的工作。我整天奔跑在印刷厂和邮局之间。

青年文学社及其旬刊的宗旨是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学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青年文学社的成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年文学》旬刊也受到进步人士的好评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

《青年文学》出刊四、五期以后，为了适应青年学生对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迫切要求，魏野畴提议

把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把《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魏野畴亲自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青年生活》发表的《学生会整领法》、《中国青年的出路》等文章在指导学生开展读书会、讲演会、学术研究会、平民教育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左右一天晚上，魏野畴叫我和张秉仁到他的办公室。魏野畴首先向我宣布：“我和张秉仁介绍你加入青年团。以后你要用团章的标准要求自己。”接着，他宣布成立团支部，由张秉仁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团支部后来被称为西安第一支部。不久，师范学校的吕佑乾、雷晋笙、金宏图、李复生等成立了西北青年社。创办了《西北青年》周刊，并成立了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后来被称为西安第二团支部。这两个团支部分别开展工作，都和上海团中央直接联系。

张秉仁担任团支部书记之后，我就成了青年生活社的秘书（那时没称书记）。王授金是青年生活社的顾问。我的主要职责一是建立基层组织，发展社员；二是负责《青年生活》旬刊的印刷发行。我把每期刊物都如教分发到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咸林中学、渭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和有青年生活社组织的学校和单位。按照魏野畴的指示，我整天穿梭于西安的学

校、工厂，进行组织联络，开展革命活动。人称我是“跑断腿”。后来，大部分学校都有了青年生活社的社员，许多学校还有青年生活社的组织。有青年生活社组织的学校都有联络人。成德中学有何清洁、王文彬等，民立中学有王圣域、张汝慎、宁克齐等，第三中学有张含辉、张金印等，第一中学有任致远等，职业中学有师守命、宋乃鸾等。就连美国人办的圣工会也有了青年生活社的组织，社员有耿觉、王仲英、王仲儒等。1924年底，青年生活社已发展到七十多人，以后还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

在西安地区广大青年学生政治生活中，青年生活社不仅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而且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青年生活社的社员几乎在各主要中学都有，并成为各种政治活动的中坚和骨干。他们主动开展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帮助而安的裱糊匠、印刷工人、裁缝等成立工会组织。1925年青年生活社周年纪念时，魏野畴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开展反奉、反帝、非基（反对基督教）运动和农运、妇运等具体工作计划，使青年生活社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我党统一战线的影响下，

倒戈推翻了北京直系军阀政权。随后，冯玉祥电邀在广东的孙中山商讨国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李大钊派方仲儒、崔孟博等到陕西开展这一运动。

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青年生活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当时的任务是到各学校联络青年生活社成员，宣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陕西的国民会议筹备会。年底，西安团组织以青年生活社的名义倡议成立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21日，在魏野畴和王授金主持下，西安学生会、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实业公会等十七个团体举行代表会议，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2月1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魏野畴担任主席，正式成立了促成会。会议通过了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各地同胞的三个电文，表示愿作国民会议之后盾。

2月5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指出：

“民国成立十三年中，战乱频仍，工商凋蔽，人民颠连困苦，备极惨劫，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军阀政治蝉联重位，而又变本加厉’。美、英、日帝国主义之列强各扶持其在吾国之政治经济等特殊势力，以利诱挑唆军阀、政客等互相战争，而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我则重困陷于殖民不如之地位，此又根本原因之根本原

因也”；“鉴于十三年来之显明教训，有联合全国民众之势力，作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教之大运动，外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绝一切黑暗肮脏之乱政，真正实现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域”。宣言号召陕西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

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我又组织青年生活社广泛开展宣传会议精神的活动。在各地青年生活社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各界、各地区也相继成立了促成会。

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消息传入陕西后，陕西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在王授金的主持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接连召开两次代表会，强烈谴责善后会议。吕佑乾等代表在发言中严厉指出：“国民会议需要真正国民起西组织。现在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系由法制院拟定，又需经善后会议议决施行，是名为国民会议，实则无异军阀官僚及政客之会议也”。会议一致决定：否认伪法制陕与善后会议所规定之国民会议条例，赞成孙中山所主张的在国民会议来正式成立前，应以全国各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及其他各职业团体各致党的代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产生正式国民会议作为大会议案。会议还公推王授金为代表大会永久主席，积极进行代表大会的一切事宜。接着，陕西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召集会议，

纷纷谴责善后会议，力争召开国民会议。

在陕西人民反对善后会议、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中，以刘镇华为首的反动势力，暗地却进行着阴谋破坏活动。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青年生活社通过发表文章、散发传单、举办讲演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及其走狗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促进了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之际，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4月15日，促成会在大莲花池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追悼会。魏野畴、王授金、吕佑乾、雷晋笙及各界代表都讲了话，魏野畴在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告成中国之革命。会后，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刊》。

1925年9月，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协助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刘含初、张含辉、王授金、魏野畴、王尚德等都在临时党部任职。临时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

党右派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驱逐军阀吴新田

1925年4月30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把军阀吴新田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代替被驱逐了的刘镇华统治陕西人民。1922年春，吴新田借追剿陈树藩余孽进驻汉中，纵兵为匪，鱼肉百姓，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臭名远扬。陕南人民在吴匪的浩劫下，民穷财尽，十室九空，挣扎在死亡线上。陕西人民坚决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罪恶决定，并决心驱逐吴新田。在正式受命的第二天，吴新田就暴露了杀人的魔相，制造了迫害西安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

5月4日，西安一中学生在操场踢球，把球踢出墙外，被吴新田二十八团匪兵拾去。学生前去要球，匪兵不但不给，反以砖头、铁铤乱打学生。接着，匪军官下令吹号，集合匪兵，冲进学校，用刺刀、木棍对徒手学生乱打乱刺，使四十余名学生受伤，两名学生生命垂危。

惨案发生之后，西安一中学生立即全体罢课，发表宣言，揭露吴新田匪军的滔天罪行，并呼吁各界予以援助。西安党团组织坚决支持一中学生的正义行动，并借以组织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魏野畴在工会中活动，我发动青年生活社基层组织在学生中活动。

5月5日，西安许多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一些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行凶匪军官兵，解散匪军二十八团；向学生道歉，医治受伤学生，赔偿损失等。

吴新田匪兵的暴行也激起了陕西各界人民的愤慨。5月6日，西安各校教职员数百人，冒雨到一中开会，研究通过了支持学生斗争的十七条办法，并成立了西安全体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作为具体进行工作的组织。西安一些公私西体，也以不同形式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贯于草菅人命的吴新田，对群众正义的呼声置若罔闻，不作答复。这又激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怒。西安党团组织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驱逐吴新田军阀和彻底打倒军阀制度的响亮口号。党的这一口号，得到全市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使罢课斗争进入新的阶段。5月16日，在北京出版的《共进》刊物发表了《本社对吴新田军惨杀学生宣言》，表示了共进社和旅京陕西学生对驱吴运动的坚定立场。

为了使驱吴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在党西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各校联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学联的直接领导下，学生在街头巷口贴标语，画漫画，撒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军阀罪行，宣传驱吴道理。驱吴运动引起吴新田的憎恨。他污蔑学生太嚣张，严禁学生上街聚会，指使在各校门口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

动，并扬言打死学生不偿命。

驱吴运动很快波及全省。为了把驱吴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离开了吴新田控制的西安，到杨虎城管辖的三原县继续领导这一运动。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作出了发动全省学生支援西安一中学生斗争、开展驱吴运动等决定。会上，我以西安学生代表的名义，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吴新田匪兵残害学生的罪行。会后还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建立宣传队到渭北、陕东、汉中等地宣传大会决议，发动群众开展驱吴运动。同时，选派代表到国民军中活动，争取驱吴力量。随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成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都纷纷开展了驱吴运动。

为了把学生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于这年暑期在三原举办了二个月的青年训练班。魏野畴主讲，教师还有李秉乾（李子健）、赵保华、耿炳光、王尚德、魏昔言等。学员主要是三原和西安的教师和学生，共有一百多人。我记得的学员有张仲实、王爱玉、王子静、赵中润、梁俊骥、马文宪等。这期训练班以革命理论武装学员，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学员在驱吴运动中也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1925年7月，国民二军从河南进入陕西。我和张含辉以陕西学生会代表身份到潼关迎接。我们接回了李虎臣部的丁增华团长。随后，杨虎城也南下，迫使

吴新田不得不经宝鸡逃到汉中。这是陕西人民驱逐军阀刘振华后的又一胜利。

转为中共党员

驱吴斗争胜利后，为了更好地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党把领导机关从三原迁回西安。陕西学生总会执行委员会、西安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迁到西安。1925年7月，我随魏野畴一块回到西安。

我回到西安时，西安地区各界人民在党西组织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西安各界成立了反帝国主义惨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发表反帝宣言；木漆行工人举行大会，支援上海工人斗争；数千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回西安后，我即组织各行各业青年生活社的社员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反帝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渭南、三原、陕北等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也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西安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西安、延安等地学生、市民举行了“非基运动周”，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

为了加强党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指导，魏野畴又立即着手创办了党的刊物——《西安评论》。党组织通过《西安评论》向西安各界分别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党组织向各反帝团体指出：尽量扩大学生的反帝运

动；成立工、农、商大联合，扩大各界反帝运动；把西安反帝运动扩大到农村各乡镇。党号召工人组织同反动的省工会作斗争，号召农民学习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组织农会的经验，号召教育界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党组织对学生运动也指出了方向，号召学生在斗争中组织起来。

为了扩大驱吴斗争的胜利成果，青年生活社继续为实现三原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决议的主要精神是：（一）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学生课程，革除思想腐败的教职员，购买新的书报杂志，添加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和住宿费。（二）力谋教育改革。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的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三）注重社会运动。克服学生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对于种种爱国运动、民众运动、各种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群众宣传，学校和政府当局不得干涉。

为了实现决议，我们组织学生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顽固的教育厅长郝朝俊慑于学生压力，不得不答应三个条件：（一）力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办；（三）教育人员应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质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并对教育有兴趣者为合格。

游行队伍到省议会门口，学生们把那些坏议员骂了几个小对。游行的学生还同教育界的败类质开了斗

争，把一中、三中、女师校长及几十个思想腐败的教职员赶出了校门。

三个星期后，教育厅长郝朝俊不仅没有兑现诺言，反而把一个佛门弟子康继尧从神庙请出充任女师校长。9月16日，陕西学生总会协同三原、西安、合阳等各学联代表，去教育厅质问郝朝俊，并向郝朝俊发出了驱逐令。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省长不得不免掉郝朝俊的教育厅长职务。随后，学生又乘机把刚走马上任的康继尧赶出了女师。在西安学生运动的影响下，渭南、富平、榆林等地的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十分活跃。

1925年9月，团中央派吴化之到陕西整顿和发展团组织。接着，党中央也派黄平宛到陕西发展党组织。为了加强团组织的统一领导，决定把直属团中央的西安两个团支部改选合并。在选举时，两个支部的人都互感陌生，只有我这个“跑断腿”大家比较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大家选为团支部书记。我不仅负责《青年生活》和《西安评论》的印刷发行，而且还要独立开展青年团工作。就在这年年底，我被豫陕区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经常组织工人、学生到街头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理论。一次，我上街演讲时，一个市民问我：“你说共产主义好，什么时候能实现？”过去，我只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但什么时候实现，我的确

一时说不清。在公众面前，我仍很坚定地说：“我们这一代实现不了，儿子手里可以实现；如果儿子手里实现不了，孙子手里一定会实现。反正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二 渭华起义前后

(1925·11——1929·8)

派入国民军

北京政变后，由于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冯玉祥转向革命，造成了对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也由于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使北方的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化。对于这种局面，党中央在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在国民革命激流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的封建军阀已经逐渐崩溃，分化出来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因此，党决定：“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的是帮助国民军”，而且必须“加紧在国民军的工作，帮相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以李大钊同志为首

的北方区委，按照中央的方针，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为此，李大钊同志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派人和通过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做工作，向他们解释和宣传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同时，李大钊同志还指示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工作，深入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在国民二军和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官佐及其他重要职务。陕西党团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号召党团员积根带头参加国民军，并派宋乃骞等人到广东黄埔军校，派我到国民军第三军工作。

1925年冬，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刘月溪部在陕西华阴县驻防。这个旅的参谋长是张兆丰同志。他是李大钊同志1925年11月派到国民军开展党的军运工作的。他到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以后，利用职务之便和旅长的旧交情，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把第一团团团长孙金宣和该团第二营营长谢连锋介绍入党，后来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党的旅支部委员会。接着，北方区委又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到该旅，分别担任了第一、第二、第三团的副团长，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

这年冬，我穿着棉袍，在李林同志带领下，从西安往华岳庙去。到部队后，我被分在一团。我们的团长和两名副团长都是共产党员。我到这个西后，团长

很高兴。他叫我脱掉棉袍，换上军装。之后，他又说军人要像军人的样子，还要剃掉头发。我当时留的大背头，舍不得剃，剃了个小平头。团长叫我脱帽，一看说不行。我只得第二次理发，剃了个光头。团长为使我工作方便，叫我当他的差遣。从此，我就在部队做青年团工作，开始了戎马生涯。

到华岳庙不久，部队就移防到洛阳西宫。我和李林沿途做宣传。我们拿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等标语，沿途张贴。路上，李林同志告诉：“豫陕区已批准你为中共正式党员，党组织派你到部队做青年工作。”在洛阳西宫住个把月后，又移防到石家庄，住在桥东。这时，团长对我说，要进行正规化训练。他派我到新成立的学兵连，一方面搞青年工作，一方面自身学习锻炼。

在学兵连，我过着新兵加小媳妇似的生活：给全班战士叠被、端饭、洗碗，都是我的事。训练时，班长要求特别苛刻。动作稍有不规，就要挨打。拳打前胸、脚踢后踢，是常有的事。有时他手中藏梅花针，袖中藏木棒，用以惩罚操练不合要求者。每次训练，我都全神贯注，唯恐不合要领，练得我腰酸腿痛。回来后，还得额外干“小媳妇”的事情。这样的训练，我硬是熬了几个月。

一天，我的班长拿着一个口令条。他左看右者看不懂。我给他念了一遍。班长用敬慕的眼睛打量着

我，说：“你识字？”我说：“能认几个。”他说：“你会写信吗？”我说：“可以。”他叫我给他家里写了封信。念后，他高兴地说：“行！真行！”此后，班长开始对我另眼看待。他向大家宣布，再不把我当新兵了。我也从杂活中解放了出来。

1926年初，北方革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我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冯玉祥国民军势力的不断扩大，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受到极大的威胁。于是，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张作霖和吴佩孚弃嫌和解，在“反赤”的幌子下，组成了反革命的“讨赤联军”，企图进行所谓的“南征”和“北攻”，消灭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方国民军。军阀李景林和张宗昌都分别从北京和山东出发，截断津浦路，包抄国民军。军阀刘振华、吴断田和孔繁锦分别从河南、陕南、甘肃进发关中，围攻西安、三原等地。在西安党组织的推动和支持下，国民军、杨虎城的陕军和西安、三原等地群众英勇抵抗。这时，我们部队急行军赴涪州打仗。学兵连因打仗被分编到各连。我被分配到二营的一个连，给我发了一支七九步枪和二十排子弹。因第一次准备打仗，我非常高兴。班长在战前检查时，要过我的枪拉开一看，说撞针短了不能用，另给我换了一支。当我们行军到深县时，正使新春佳节。在沧州的北边泊镇打了一仗，我们赶跑了张宗昌部队，还俘虏了一些

白俄。这些白俄是苏联革命胜利后的逃亡分子，张宗昌把他们编了一个旅。泊镇大捷之后，我又当了团长的差遣。部队在献县、饶阳县休整了一个时期后，奉命又经安国县到达长辛店。

段祺瑞政府“三·一八”大屠杀之后，形势十分紧张。张作霖部队从山海关大举进发北京，国民军第一军节节向南口、张家口方向撤退。我们第三混成旅的第二团叛变，投靠了军阀吴佩孚。为了给国民第一军守南口修防御工事争取时间，我们在牛栏山同张学良部队打了一次阻击战。之后，撤到宣化县。

在张兆丰同志的建议下，我们第三混成旅在宣化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由辛林和王珪同志具体负责，张海如同志为教官。有三个苏联顾问也是教官，其中一个叫志明，教政治课和军事课。学校的学员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天津、郑州的失业工人。天津党组织还介绍来了几十个革命青年。张兆丰和李林同志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军校党支部。我被分编在学校的一连一排一班当副班长，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还发展了一些共青团员。那时，学校的学习和训练工作十分严格、紧张。

1926年5月，我们旅除第三团打山西阳高县外，又从张家口、宣化向绥远方向转移。当时，绥远是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我们一日急行军80多

里。经过张家口、兴和县，到达玫瑰营子时，那里的天主教堂和当地民团结伙阻拦，声言叫我们缴械。大家气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在李林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同与教堂勾结的民团土匪打了一仗。这次战斗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再加上我们不熟悉情况，所以损失很大。校长李林、旅军需官郝久亭等负了伤。我们的班长也牺牲了。在进攻到村边时，我觉得腿上发烧，用手一摸，满手是血，才知道负了伤。部队集中到集宁镇整顿之后，乘火车到包头。我们重伤员从包头又乘船沿黄河逆水行舟十多天到达五原。

正当北伐军由广东胜利进军武汉之际，冯玉祥于9月从苏联回国。他立即召集国民军高级军官商谈重振国民军之大计，决定组成国民联军。他并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9月16日向全国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这一誓师宣言，是冯玉祥国民军进入新阶段的行动纲领，是整个国民军发生革命性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天，即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举行了国民军誓师授旗典礼。在大会上，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宣布全军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敌政府、配合商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口号。刘伯坚的讲演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前途，大大鼓舞了全军官兵

的士气，全场掌声雷鸣。冯玉祥郑重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全场群情激奋，欢声如潮。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扛着大旗，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率部在五原街上游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随后，在刘伯坚等大批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改编部队、聚集流散官兵，并在全军范围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队伍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联军迅速发展到了20余万人，成为一支有比较鲜明的革命倾向、并能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部队整编后，我们第三混成旅编入国民联军第五军。李林同志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我为宣传科长。这时，我的腿伤已经化脓。医生给我动手术后，我已不能走路了。

五原誓师后，李大钊不失时机地给国民联军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随后国民联军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一路从宁夏、甘肃入陕，一路从榆林南下，两路包抄围攻西安城的刘振华军阀。10月，国民联军西路到兴平，北路从陕北南下。刘振华为了集中兵力顽守西安，撤围三原。10月中旬，国民联军西路到达咸阳，向西安以西的刘振华军队发起进攻。西安城内军民也组织出击。在国民联军和西安军民的联合打击下，刘镇华的镇嵩军于11月底败逃河南陕州（今陕县）。至此，长达8个月之久的守城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先头部队从五原出发后，我们伤员随军部骑着骆驼向宁夏进发。北国寒冬，风沙弥漫。我的鼻孔吸满了沙土，呛得人透不过气。冷风刺骨，冰封黄河。偶尔还可看到未冻严的冰窟窿，但骆驼队却顺利通过黄河水面。西安解围后不久，我们到达了西安城。

创办军校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革命形势很快进入高潮。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就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史可轩任保卫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兼《新国民军报》主编，许权中任保卫队第一大队长。此外，共产党员杨明轩、王尚德、王授金、杨晓初等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在魏野畴、史可轩等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下，使共产党成为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和重大政策方针的决定者。魏野畴利用他职务之便，还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仅政治保卫总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还担任了师长、团长等高级职务，使这个师成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正规军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组织决定在西安同

时创办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分别培养军事干部和党政干部。一天，李林通知我参加中山军事学校的筹建工作。此后，我就跟李林等同志在西安市北院门开始筹建西北地区黄埔军校式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以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名义创办的，定名为“中山军事学校”。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人干部为宗旨，招收18至25岁的青年。

学校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李林，政治部主任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是党组织选派到国民联军中做工作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之一。他接受任务后，于1926年底从莫斯科到达库伦，又经过长途奔波，于1927年3月到达西安任职。我在学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党总支书记，负责全校党团工作。

1927年3月18日，学校开始招生。学员大部分来自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全校建立一个总队，总队长是共产党员许校中。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第一大队长高致凯，第二大队长张汉俊，第三大队长杨浪波。每个大队又辖三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大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每个大队设一个党支部。第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施巍然，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党支部书记由大队长兼任。学校还设有俱乐部。

邓小平同志主要讲政治课，他讲课通俗易懂，鼓动性强，课堂十分活跃。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有《中国

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等。我负责印过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也是学员的学习材料之一。有的学员文化水平很高，其中还有大学文化程度。李林、许权中同志主要讲军事课。军事课的主要内容有《战术学》、《射击》、《步兵战术》等。我有时给学员作时事形势报告。

到1927年五、六月份，学校已有学员七百多人，其中共产党员约有一百多人。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象中山军事学校各级军事、政治及教育大权，自上而下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的，在全国众多的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1927年3月31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及冯玉祥部队的许多官佐都参加了典礼大会。

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成为培养大批军政人才的重要基地。在中山军校的影响下，国民一军各部队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形成了有各新兵种、各门类齐全的“军权群”体系。同时，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组织帮助下，还成立了军官、骑兵、炮兵、交通等教导团，举办了军械、军需、军医等许多所训练学校。这些学校对培养各类军政人才、提高官兵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之后，冯玉祥看风

驶舵，开始跟随蒋介石反共。6月，他为了肃清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员，以在郑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名义，将各军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公开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邓小平和李林同志就是这样离开学校的。走时，他们乘坐骡子拉的轿车。我把他们送上路后，才回来。他俩走后，我们还一直盼望着他们尽快回校。接着，冯玉祥又排除异己，先赶走了于右任，派石敬亭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6月下旬，他又命令史可轩带领中山军事学校和保卫队赴河南“整训”。名为“整训”，实为阴谋消灭这支革命力量。在此情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决走：部队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撤离西安，见机行动；准备开往陕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在史可轩同志率领下离开了西安市北院门。

组建许旅

1927年7月中旬，史可轩同志率领保卫总队和军校学员一千余人，从西安北四十里的草滩乘船东下。上船时，我见到杨晓初，他是渭南县人。史可轩把我和杨晓初叫到一块，传达了省委关于部队撤离西安的决走，并说省委叫杨晓初同志跟我们一块走。之后，史可轩同志又指示我派熟悉陕北情况的一些学员到陕

北先遣侦察。7月18日，我们部队从临潼北上。部队走到临潼交口镇时，许权中同志因事回了家。部队到富平县美原镇时，遇到国民二军田生春师驻军。史可轩和田生春是老相识。他亲自去找田生春，并打算说服田生春让路。不料田生春受二军上层人物指使，于7月29日竟将史可轩同志杀害。噩耗传来，全军悲痛。大家立誓要为校长报仇。史可轩同志1890年3月9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马堪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加入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1926年5月，他经王若飞和陈家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他同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从苏联一起回国。五原誓师后，他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警卫师长。正在他为革命大展宏图之际，却为革命捐躯。

7月30日，部队由美原镇返回交口镇和栎阳镇一带。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我们从交口镇叫回了许权中同志。从此，许权中同志担任了这个部队的总指挥。许权中同志是陕西临潼交口镇人。1924年后，他先后在国民二军任营长、团长。1925年，许权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国民二军失败后，许校中同志所在的旅被吴佩孚改编。1926年7月中旬，经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同意，许校中同志在门头沟起义，加入了国民一军，先后被任命为团长、旅长、代理师长。

许权中同志继任总指挥后，我们部队仍不接受冯玉祥的调遣令，准备在革命条件较好的本省待机行动。这时，我们周围的大小军阀把我们团团围住，都想把我们吞掉。我们利用军阀矛盾，接受国民二军冯子明改编。番号是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部队驻临潼关山镇整训。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内部已经决定：取消中山军事学校名称，改编为教导营。高致凯任营长，我任营教导员。

冯玉祥公开反共后，陕西革命处于低潮。陕西省委也处于秘密的工作状态。史可轩同志牺牲后，我们军队和省委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许权中、杨晓初和我共同商量决定，由我找省委联系。

我到西安找到省委以后，省委给我安排了住处。晚上，省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李于洲和我接头。来时，李子洲扮作老商人，随行还有一个打灯笼的同志。我向李子洲汇报工作后，他说：“省委决定许旅直接归省委领导，以后只和我一个人发生关系；许旅成立旅党委，成员由许权中、杨晓初、高致凯、张汉俊和你五人组成，书记由你（高文敏）担任。”他对我们部队最后的指示是：发展力量，整训训练，等待时机。

我们在关山镇驻军一个多月后，驻军在高陵县的田玉洁部惠显峰旅愿归我部。为此，我们移防到高陵县。我们相商：收编人家总得带点礼物。于是，杨晓

初便从他父亲钱庄拿来了二百块白洋。就这样，我们收编了惠显峰旅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共四百余人。步兵营的营长叫李蕴山。这时，我们部队共有两个步兵营、一个教导营、一个机炮连，共1,290人，枪支1,020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4门。

11月15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到兰田县普化镇。旅党委开会决定：请示省委后部队再行动。同时决定，由我到西安请示。

党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9项决议案。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不仅要力事发展，更当力谋健全”。李子洲听我汇报后，对我说：“接到中央最新指示，委健立鄂、豫、陕根据地。这样，部队乘机南进，在这几省结合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暴动，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旅党委按照中央和省委命令，随冯子明部南渡渭河到兰田。

部队到达兰田普化镇后，冯子明觉察许旅动向可疑，就指示打入许旅的参谋主任惠介如策反。惠介如企图在杨锡民和徐裴威两个连搞兵变。这两个连长把

情况汇报营长任耕三。任耕三又汇报给许权中。此后，许权中叫我从教导营派一连人警戒司令部。我派张羽军连长执行任务。准备工作就绪后，许权中下令枪毙了惠介如。后来，在惠介如护兵的棉衣夹层里搜出了蒋介石授予惠介如“西北宣尉使”的委任状。随后，和惠介如关系密切的参谋长韩威西等也不辞西别。与此同时，冯子明又密令赵汉章旅包围监视许旅，并派小分队占领黑龙口道路，企图将许旅围西歼之。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抢先占领了黑龙口，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此后，我们宣布同冯子明脱离关系，并把部队向东南转移到许家庙、墩子镇和黑龙口一带。许权中利用他的旧关系，又将部队改编为李虎臣新编第三旅。1928年1月17日，许旅开到洛南县三要司驻防，秣马厉兵，等待时机。

1928年2月13日和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召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和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决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会后，省委指示我到西安接受任务。我经过化装之后，离开了三要司。

在西安，军委书记李子洲给我传达了省委新近会议精神，并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暴动，要许旅准备参加暴动，并将陆续给许旅派人加强领导。随后，他给我带了一批文件。我把这些文件伪装成点心一样的小包，于当天就返回了。

路过渭南时，这里正处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发生了宣化事件。以刘铭初为首的渭南县反动豪绅，勾结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把共产党员教师赶出校门。继而又纠合反动分子，捣毁我党的活动据点宣化小学。为此，渭南县委组织县中学和东关小学学生及部分农民进行了回击，打死了反动豪绅，打伤了反动校长。此举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也引起了敌人的反扑。敌人封闭了渭南县中学、渭南东关小学等党团活动据点，收缴了党所掌握的华县高塘自卫团的武装，逮捕了高塘小学、谷堆小学等学校的四十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

到渭南时，我想顺路到华县高塘塬了解情况，以便为暴动作准备工作。我上渭南塬十八盘后，遇到渭南民团押着八九个高塘教员和学生从高塘塬方向迎而过来。我手里提着文件，若被敌人发现可不得了。我想，改变路线会引起敌人怀疑。我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一个团丁惊道：“这不是跑了的那一个吗！”另一个说：“大惊小怪！朝咱这边来还能是？”走到临近时，一个准备抽烟的团丁问我：“你有洋火吗？”我说：“没有。”那个团丁骂道：“滚！”我握了一把汗，真危险。这时，我分析高塘方面形势一定很危急，于是改变路线向东走。我下午到高塘附近的圣山北边，碰见了谷堆小学教员程养谦。他心情很沉重，对我说：“现在情况很紧张，你要注意安全。”我就

近回到自己的家时，天已快黑了。这是我投身革命以后第一次回家。我对母亲说：“外面情况很紧，到处捉人，也可能捉我。”我母亲说：“你睡觉，我看着。”她端了个梯子放在后端，说若有动静就叫我从后墙登梯逃走。这一夜，没发生意外。我安安宁宁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给了我两块白洋，弟弟送我启程。我沿着迂仙河进峪，翻过秦岭，回到了部队。

在我回到洛南县三要司以后不久，省要先后又派唐澍、谢子长、王授金等同志协助许旅准备暴动工作。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行政上任命唐澍为旅参谋长，谢子长为二营副营长，准备代替营长职务。

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在许旅中加强了党的建设。到三月下旬，许放的放要员会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5个发展到18个，党员由原来的53名增加到165名。同时，我们对许旅进行组织整顿，清除了不纯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党团员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进行了思想整顿，教育士兵克服军阀队伍习气，树立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的思想。每天拂晓，山沟里，河滩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进行操练。

刘志丹同志到许旅后，旅党委派他带领工作组做群众工作。刘志丹带领十多名干部到会仙台、高耀

子、鸡头关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学会。部队协助农民协会打土匪，斗恶霸，分田地，先后处决了大恶霸何豹子，劣绅何品堂、阮化生，土匪丁克盛、许海水等人。群众心花怒放，在关帝庙搭台子唱戏庆祝。农民高兴地称许旅是自己的队伍。

参加起义

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22日决定在包括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在内的渭华地区组织暴动。

陕面省委之所以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暴动，主要是因为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基础。渭华地区是关中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文化比较发达。这个地区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省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时，中共陕西省委将一些在西安站不住脚或不便工作的党员干

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加强工作，开展斗争。当时，尽管陕西省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受到了破坏，但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基本保存下来。据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3月20日《党务概况》记载：华县、渭南各有同志五百余人，而农民同志占75%至80%，为全省同志数量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五一县有“同志约三百余人，农民同志亦占50%以上…；原临潼支部改设成了县委；原华阴支部改设成了区委，属华县县委领导。共青团组织也有较大发展。渭华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特别是农民武装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共华县县委成立了农委，指定了各区的农运负责干部，举办农民训练班和平民学校，秘密恢复农民协会。在县委的组织下，何永安、郑如璧、同继志在华县城西门外击毙了国民党华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纪实；华县高塘的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六七百名徒手农民、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斗争了土豪王文凤等人。渭南县委在渭南中学增加了“军事课”，在县立第一高小办了党员训练班，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教育。中共五一县委组织群众抗粮抗教，迫使地方反动当局答应了农民的一些要求。

“二·二九”宣化事件后，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13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

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斗争中建立农村苏维埃，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扩大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均及时由县城转移到乡村。广大党、团员走出学校、机关同农民结合，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中共渭南、华县县委均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和特务科，区委设特务队、侦探队、交通队，制订了《行动须知》，专事夜间打击土豪劣绅，夺取反动组织的武装。渭南县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华县击杀了县政府的收粮委员，五一县抄了大土豪的家。渭华暴动迫在眉睫。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以党的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为特委宣传委员。4月6日，特委听取了渭南、华县的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陕东工作计划和许权中旅的行动问题等，通过了关于暴动的《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整个渭华地区处于暴动的前夜。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陕西省委特来中共中央给许权中、旅党委及全旅同志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时委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发动群众的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至于脱离的日期，可根据实际环

境与你们的布置与省委协同决定。但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被他们解决的。”“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切军官应尽量换成我们的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的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党的组织应大大的发展，尤其在士兵中要尽量发展。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枝枪，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可要求各地党部多介绍同志及好的农民来当兵。第四，加紧党的训练，至少需使一般同志都明了党的新的政策、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并有决心为新政策来奋斗，来牺牲。”关于许旅脱离李虎臣后的去向，信中指出：“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准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那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陕西省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给许旅的党组织也写了一封指示信，指示许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中共陕东特委在第一次扩大会上讨论了许旅的行动问题，并规定由许旅“渭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

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许旅一方面加紧训练和整顿，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另一方面为渭华地区积根

培养了军事骨干。陕东特委抽调了二十八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由华县高塘的共产党员薛自爽带领，到许旅学习军事技术。部队给每个人配备一枝枪，四个手榴弹及一些子弹。四月下旬，旅党委又派党委委员张汉俊带领这些同志返回渭华地区。为了工作方便张汉俊同志以后化名为李大德。陕东特委以这些受训同志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一百多人的陕东赤卫队，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由少年组成的大刀队。特委任命李大德同志为大队长，薛自爽同志为副大队长，冯养浩同志为党支部书记。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移驻高塘镇西南的塔山，构筑工事，设立枪械修理所，储备粮食，形成了一个军事据点和后勤补给基地。这支队伍素质好，战术灵活，又熟悉当地群众和地理，后来在配合工农革命军反对反动派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8年4月，冯玉祥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激战于豫东、豫北和豫西，令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哲元率部出潼关后，李虎臣遂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乘虚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面调兵围攻面安，一面集军开赴潼关，欲断冯部回陕归路。李虎臣亦命令许旅赴潼关作战。在此期间，陕面省委又明确指出：不参加军阀混战，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尽快参加渭华暴动。

在两个命令面前，旅党委就如河利用军阀混战和

是否在三要司就地起义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对第二个问题认识比较统一，认为三要司地处秦岭之南，周围有李虎臣部队钳制，如果就地起义，难于飞越秦岭天险。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大家表示坚决按省委指示，不参加军阀混战。而许权中同志一人主张先攻占潼关，扩大和装备我军，然后再参加渭华暴动。李虎臣调令很紧，若迟缓行动，就会暴露我党意图，招致围攻。所以，在第二个问题统一认识之后，党委决定雷天祥同志带领一个营，作为先遣部队立即赴渭华参加暴动；其余部队随后翻越秦岭，跳出牢笼，再展翅膀。

5月上旬，部队沿石坡、巡检司路线翻越秦岭，进入潼关县蒿岔峪。因王授金年纪大，拔山涉水十分困难，所以我把自己的马让给了这位年长而受尊敬的老同志。我给他牵着马，走在部队的前面。一日行军八九十里山路。到蒿岔峪口时，我已疲惫不堪。在司令部还未到达的时候，我已经在—老乡家门口睡着了。司令部赶到时，侦察出有条到高塘的小路。刘志丹和唐澍要抄小路直奔渭华。许权中还坚持先打潼关。为此，又发生了争执。当要开党委会决定时，派人到处拔不到我。我睡醒后，立即到司令部。刘志丹和唐澍同志都埋怨我贻误军机。我说：“立即开会，马上开拔，挺进渭华。”他们说：“已经到了下半夜，为时已晚，李虎臣的其他部队已经赶到。我们撤军他们势

必阻拦，只有另待时机。”

这时，渭华暴动的战幕已拉开。渭南县的崇凝镇、阳郭镇、三张镇已举行了群众暴动大会，处决了恶差，收缴了警察枪支，抄收了劣绅商店财产。华县高塘镇开了暴动大会，会后查抄了大恶霸的浮财和商店，烧了帐簿，分了财物。五一县委组织特别武装队，处决了土豪，烧毁了敌军的西板桥粮站。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百姓扬眉吐气，红色敌权苏维埃纷纷建立，革命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面对这种局面，刘志丹、唐澍和我都很心急，可许权中同志还是坚持委先打潼关。

第二天，我们部队开到了潼关南原十二连城。一天下午，许权中和杨晓初到潼关县城附近侦察地形，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潼关。唐澍、刘志丹和我商量决定，趁许、杨外出之机，带领部队赴渭华参加暴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委会议，只能分头到驻扎阵地紧急动员，带部队出发。接到通知的部队，都按计划行动了。我把教导营全部都带出来了。就这样，我们共拉出来近千人。天还没黑，部队已开始向渭华方向移动了。

我和高致凯负责带教导营。当高致凯发现许权中未走对，思想产生了动摇。他越走越慢，一会儿竟不见影了。看来，他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正在怀疑，突然他的两个护兵冲到我跟前喊道：“营长叫

你放下枪！”我感到事情不妙，气愤地说：“要下枪？叫你营长来下！”高致凯这时已赶到我附近，说：“把你枪放下，和你说几句话。”我说：“你够不够朋友？”他说：“够！”我把枪给他一扔，说：“你说吧！”他说：“为什么背着放长把兵带走？我要找许旅长去！”说毕，便带着他的两个护兵走了。后来，他投靠了国民党。

行军两天，我们把拉出的部队已全部集中到华县瓜坡镇东北一带。5月15日左右的一天晚上，我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讨论了部队参加渭华暴动的目的和意义，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及其名称、番号和组成人员等有关重大事项。

第二天上午，部队在瓜坡镇附近一个村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告武装起义，摆脱李虎臣，脱离军阀混战，成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全军战士群情激昂，举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掉了国民党的帽徽，激动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万岁！”……宣告起义的同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杨晓初和我。总司令唐澍，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我是参谋主任。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军党委成员刘志丹、

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总顾问，杨晓初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财经委员。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即警卫队）和一个骑兵小队。一大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长谢子长，三大队虚设，四大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泉。

许权中和杨晓初侦察地形回来后，带着十多个骑兵也来到瓜坡镇。他派人和司令部联系。党委派我叫许权中回来，他不愿到司令部。以后，他带着骑兵小队始终和司令部保持一定的距离。

部队抵达华县高塘镇后，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中兵陕东特委、中共华县县委、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等讲了话。会后，处决了几名反动豪绅，举行了军民万人大游行，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三反“围剿”

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再次到渭华地区检查工作。潘自力同志在高塘镇南的涧峪口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军委、司令部、中共陕东特委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斗争形势、建立苏维埃、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等问题，会议认为，建立苏维埃是正确的，筹备建立渭华苏维埃政府

也是正确的；地主的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给穷苦百姓。鉴于许权中在军事行动上未执行省委指示，军党委提出给许权中以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我由于睡觉贻误军机，军党委也提出给我以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对此，潘自力同志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也没有听说省委批准军党委提出的处分意见。

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设在高塘镇，赵雅生领导的第一大队驻扎在沈河两岸，雷天详领导的第四大队驻在箭峪口一带，谢子长领导的第二大队驻扎在高塘镇一带。第二大队和第四大队配合陕东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捉劣绅，分浮财，并组织成立村苏维埃政权。谢子长同志和我一块打游击。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是陕西安定县（今于长县）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过清涧起义。第一次出阵时，我和谢子长同志带了一个中队到赤水地区的张岭子打埋伏，结果半天没遇上敌人。我们随后又到赤水镇抄了两个商户，把东西给群众分了。返回时，又遇到冯玉祥的几个后勤运输兵，驾着马车。我们捉了四个人，就地处决。

工农革命军成立并同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渭华地区形成了以高塘和塔山为中心，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在起义的中心区域内，反动的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垮。一村为单位，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据了解，渭南、华县、五一县共建

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大部分基层苏维埃政府建立有赤卫队。有的赤卫队还有枪支武器。在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基层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群众向农村封建地主阶级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先后清算斗争了一百五十多名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其中处决了六十余名最坏者。渭华地区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革命气象。

渭华地区的红色风暴引起了反动当局和大小军阀的惊恐和不安，继而由相互混战转为暂时联合。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的胜利和巩固而安的城防之后，在渭南、华县集中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三个师，并调集渭华一带的警察、民团，对暴动的中心区域实行军事“围剿”。与此同时，李虎臣也率兵从商县由南向北，形成对工农革命军南北夹攻的“围剿”阵势。工农革命军和渭华地区的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

6月上旬一天拂晓，宋哲元以一个旅的兵力从渭南县城向东南进攻，妄图经龙尾坡攻占塔山，遭到埋伏在段家村附近的第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的伏击。敌人惊慌失措，被迫撤退。我们赢得反“围剿”的第一次胜利。

6月中旬，军阀田金凯的骑兵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大明寺，夜袭我司令部所在地魏家原。这天晚上，第二大队夜袭华县城，我司令部兵力空虚。在

魏家原阵地上。我军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赤卫队的兵力，阻击敌人一个师。我们二大队返回时，在瓜坡镇发现马蹄印很多，断定敌人已向我发起进攻。在魏家原阵地紧张之际，我们第二大队已赶赴战场，从东西两面对敌形成夹攻之势。敌人左右受击，误为中计，仓皇逃走。我们又取得反“围剿”的第二次胜利。这次战斗后，我患了疟疾病，时热时冷，四肢无力。刘志丹同志派侦察参谋陈祖舜同志（华县人）照料我，并把我安置在南山峪一位和我军有关系的民团家养病。

6月19日，敌人以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个师的兵力，并以地方民团李振戍、王佐两部为前锋，由宋哲元亲自督战，向我军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敌人三个师的兵力分为东、西、中三路向我高塘和塔山据点进攻。东路一个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向高塘镇以南地区进犯；西路一个师，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向塔山进击；中路一个师，从赤水出发，由宋哲元亲自指挥，分两路从赤水东川和赤水西川同时攻打高塘镇。我工农革命军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同志分别指挥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

刘志丹、唐澍、谢子长指挥第二大队，在总司令部村外的前沿阵地同宋哲元的一个师和一个旅进行鏖战。从拂晓打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到牛峪口和箭峪口。次日天亮后，敌人分头向牛峪口和箭峪口全面进攻，廉益民、吴浩然同志在牛峪口壮烈

牺牲。

在魏家原和塔山一带，许权中的骑兵小队，李大德和薛自爽带领的陕东赤卫队，互相配合，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在大炮掩护下的一个团的多次冲锋，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宋哲元恼羞成怒，从牛峪口抽调部队，向箭峪和塔山增援。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薛自爽同志英勇献身。

6月22日，我军各部大约五百多人相继撤退到秦岭南的洛南县的两岔河。这时，本应就地休整，而司令部却命令第一大队进驻洛南县保安镇。我军在保安镇立足未定，李虎臣的方少海部出动，五个旅的兵力包围了保安镇。部队突围时，唐澍带领六十余人从两岔河赶来增援，结果在保安镇北边陷入重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同志们英勇奋战，除一警卫员外，唐澍等六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唐澍同志是河北省易县南贾庄（今徐水县）人。1924年5月，他在黄埔军校学习，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派他到工人纠察队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1927年8月，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六旅任参谋长，并担任地下中共党团书记。同年10月，他和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举行了清涧武装起义。唐澍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他牺牲时，年仅25岁。

7月初，我军余部约三百多人转移到兰田县南山张家坪一带。部队又暂时投靠了李虎臣的刘文伯师，后改编为刘师第九旅。8月，许旅进入河南邓县时，被当地地主武装“红枪会”包围缴械。许权中旅这支革命武装就此消失了。

渭华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暴动地区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华县的高塘镇和渭南县的崇凝镇分设县佐。专事镇压参加过暴动的党团员、学生和农民。凡是暴动涉及的地方，反动地方当局均成立所谓“清乡团”，实行“连坐法”。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反攻倒算，恣意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数百革命人民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烈士薛自爽被鞭尸示众，共产党员程养谦、王授金被政人残害致死。反动派还玩弄“以金赎罪”的伎俩，迫得许多群众卖儿卖女，倾家荡产，背井离乡，流落乞讨。真是：秦岭南北，腥风血雨；渭河两岸，尸骨遍野。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革命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渭华地区的工农群众和党领导的军队相结合，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武装斗争的舞台上演奏出了一曲威武雄壮的战歌。它不仅鼓舞了人民、教育了人民，而且使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胜利的曙光。渭华暴动的烈士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名将永政史册！

渭华暴动的失败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敌强我弱，力量相差过于悬殊。主观原因主要是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不够明确，对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也很不理解。只看到军阀混战的可乘之机，而忽视了军阀联合扑灭革命的可能；只看到渭华地区群众基础好的有利因素，而忽视了这个地区离西安较近，又是敌人战略咽喉之地的不利因素；只看到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的有利物质因素，而忽视了这个地区地势比较平坦、作战难于迂回隐蔽的不利地理因素；只采取了硬打硬拚的消耗战术，西不懂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许旅在作战失利后，本应把余部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但旅领导却没这样做，又采取投靠军阀保存实力的策略，结果招敌全军覆没在地主武装之手。另外，工农革命军领导的不团结也不能说不是失敌的一个原因。

渭华暴动失敌以后，刘志丹同志到山峪找到我。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但革命还会暴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叫我同他一起去向省委汇报，说他下一步准备回陕北搞武装斗争。我说：“我身体还不行，身不由己，走不动。”临走，他给我写了个纸条，叫我病好后到西安东关民立中学附近一个巷子找姓李的女同志接头。

一天，民团派一个人对我说：“清乡团就要搜山，

你得赶快转移。”过了几天，我勉强可以行动了。在陈祖舜同志的陪同下，我拄着木棍，默默离开这个洒满战友鲜血的地方，心情十分沉重。

陕北找党

我在陈祖舜的陪同下去找省委。我抱着半病的身子，摇摇晃晃走到临潼县的零口镇。住店以后，陈祖舜对我说：“我想回家。”我说：“革命怎么还能留恋家庭？”但他执意要走。临走时，我对他说：“你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你回去以后还可在地方做些工作。”

去零口镇的路上，我已经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在窃窃私语，说我脸色不正常。所以，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但一摸兜，却找不到刘志丹同志给我写的纸条。于是，我只好去执在渭北搞侦察工作的许尚志同志。他是蒲城人。蒲城还有其他熟同志，通过他们或许能够找到党组织。到蒲城后，我先找许尚志，但没有找到他的家。后来，我又拄到成德中学的共青团员刘鑫森，我叫他执县委。过了几天，他说：“县委执不到，城里风声很紧。”他介绍我到县城西纸房镇东边一个姓万的同志家住。这个同志是西安三中学生，原来是青车生活社的社员，后来是共青团员。他对我说：“你先住在我家养病，我们继续执党组织。”

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我想只有到陕北去找党的关系。去陕北没有路费怎么办？正在这时，陕北军阀井岳秀准备成立学兵队，在渭南、蒲城一带招收学员。这是进陕北的好机会。1928年9月，我就报名应招，随学兵队踏上去陕北的路。路上，我又碰到了原中山军事学校的学员王孝慈。他也是借招学兵机会到陕北找党的。之后，刘森森和姓万的那个同志也以学兵名义到陕北。阴历8月15日，我们到了米脂县北的鱼河堡。第二天到了榆林城。

到榆林城后，井岳秀办的学兵队又受到宋哲元的制止。无奈，他又想送我们到阎锡山办的斌校学习。为了考得好一点，他把我们这十多人送到了榆林中学的高中班补习功课。

榆林中学是我党在榆林活动的的一个据点。校长是杜斌丞，教育主任是马济川。马济川是个秘密共产党员。杜斌丞平时不在校，学校工作实际是马济川管事。我通过马济川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党的关系。我向特委汇报了渭华暴动的一些情况。特委把我、马济川、王孝慈等五六个人编了一个特别支部。指示我们一方面认真学习，一方面在榆中开展党的工作。我曾要求到县上去做地方工作，特委不同意。对我说：“我们打人井岳秀部队不容易。已经打人井部，就要很好隐蔽起来。以后我们要搞兵变，搞武装暴动。”不久，我担任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王孝慈任共青团支部书

记，兼管榆林女中团的工作。榆中当时有党员和团员二十多人。

国民党为了党化军队，要求军队中排级以上干部都加入国民党。井岳秀怕国民党拆自己的台，不想叫干部加入国民党。为了应付上司的命令，井岳秀决定秘密给干部填写加入国民党志愿书。为了保密，他叫我们在榆中补习的十几个学员替他们填写假表。为此，我请示了特委书记杨国栋。他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若叫你们自己填表也可以。通过填表还可以掌握敌人的情况。”填表需要盖章，他们就用萝卜和蜡烛伪造图章。填表需要像片，井岳秀命令排级以上官员照了合影像，然后分洗出来。我们填完表后，井岳秀叫我们也填表。我们按照特委的指示，自己也填了表。就这样，国民党就算发展了几百名党员。

1929年春，井岳秀通知我们到山西考试。我请示杨国栋，他说可以去。于是，我们就报了名。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两三天，特委又通知我们不要去了。我随学兵到米脂后，就逃离了部队。在这个期间，我会见了刘志丹同志。他叫我和王孝慈一块到米脂县三民中学。此后，我再没有见过刘志丹同志。到三民中学后，一个同志把我们带到特委。特委派我到清涧县任中共县委委员兼第三高小支部书记。我公开的身份是小学教员。这个学校离县城七十八里路，党的力量比较雄厚。特委分派王孝慈同志到延长县第一高小当

教员。

我到第三高小的任务是在农村、学校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我们党支部的成员有张子良、王怀德、周在丰、王仁杰、白金贵。白金贵是学校的炊事员。县委书记赵通儒，是第一高小教员。县教育局长也是党员。我在学校教国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师生认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好教师。在这里，我们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宣传工作也搞得很活跃。一次，我们组织学生教发传单，在店子沟镇周围四五十里的一些村庄都贴上了传单。绅士们恐慌不安，惊呼“三小来了外路人，有了共产党”，要求追查。王学慈在延长县也受到当地教员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叫我们离开陕北，介绍我俩到中共顺直省委。

暑假时，我和王学慈同志一起从清涧县出发。出发时，特委指示我们不能走大路，从县城东北方向的小渡口过黄河。正值大风大雨，我们踏着泥泞小道艰难赶路。黄河奔腾咆哮，波澜涛天。当地人也望而生畏。为了尽快到达北平，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乘着颠簸起伏的渡船划向彼岸。

三 在河北的日子 (1929.8—1933.12)

任北平军委书记

过黄河后，我们步行几天到达榆次，又从榆次乘火车到达北平。

在北平，我遇见了肖明同志。他是湖南省新田县人。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他到陕西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陕东特委委员。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又派他到直隶省任中共省委委员。在肖明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省委（当时叫顺直省委）。省委分派王孝慈同志搞工人运动。顺直军委书记张兆丰同志知道我的情况，分派我协助谷雄一到磁县彭城一带做红枪会工作，争取搞武装暴动。

谷雄一同志是河北省安国人，1925年曾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西北军中任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部队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在河北省从事兵运工作。约在1929年9月，我和谷雄一同志来到彭城镇。

彭城位于磁县中部，以产磁器的悠久历史驰名全国，有“日进斗金”之美称。据记载：“北朝时期磁州贾壁开始制陶，至宋代始迁至彭城镇。”宋代磁器产品已远销日本，明代已有相当发展。1922年至1923年间，彭城的村镇缸碗窑已近三百座。但是，这些磁窑却成了地主和资本家吸食民脂民膏的血盆大口。人民群众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此，这里的群众多次以不同的名目组织起来，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里的红枪会是一支农民的秘密武装。它曾经打败过奉军的一个团。磁县彭城是红枪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和谷雄一第一次到彭城时，见到了红枪会的军师。他说他们的头目韩某没在家。等我们返回北平时，路费花光了。我们饿得没有办法，上树摘柿子，成到地里拔萝卜吃，好容易熬到北平。

1929年12月，我第二次到彭城。到彭城镇后，沿着山峪又走了二三十里路，来到了红枪会军师住的山村。我在他家住了一夜，吃了两顿饭，饭稀得见碗底。我以诚相见，军师对我也很客气。他时我说：“我们的头头到东北去了，我愿带你一同去找。”我欣然同意。一路上，他谈古论今，谈论《三国》、《水浒》中的打仗故事。到天津之后，他又说：“到东北找人，如大海捞针，难以找到。”我俩只好分手。我回北平，他返彭城。以后彭城地区革命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向统治阶级、窑主、黄色工会等，进行过持续的

斗争。

1930年1月前后，顺直省委军委通知我担任北平市军委书记。我起初住在和平门外南柳巷的华州会馆。这里住的都是华县的同乡。我外出时，就由同乡照看我的房门。我们军委成员共三个人，一个人在商震部队活动，一个人在阎锡山的保安师里活动。我和在保安师中的同志接头的地方在圆明园。我们交接文件情报的地点在圆明园的一个假山石洞里。

除了兵运工作外，我还有青年工作。我以穷学生的名义和法政学院三院团员郭从周联系。有时，还在他那里吃住。有一次，我和一些学生到天桥搞飞行集会，在街头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学生被派出所扣留，我们还在派出所抗议要人。

1930年初，北平市委决定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北平反帝大同盟、洋车工人代表、印刷工人代表、青年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妇女互助会、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大同盟等革命团体发起并决定于4月20日召集各群众团体开代表大会，正式产生“五一”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号召和领导“五一”运动的总机关。开会之前，我的任务是训练纠察队。开会的那天，纠察队拿着网球拍、石灰袋和辣椒面袋，以准备和警察侦缉队搏斗。4月20日，我们利用教徒做礼拜的机会，把会址选在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散堂。这天，到会的有供电、电话、电车、铁路、印刷、学

校、革命团体代表三百七十多人。纠察队切断电话，严把大门，监视教士，只许进不许出。我在会场外面的茶馆侦察动向，指挥纠察队。会议开得热烈紧张，只用了半个小时。最后宣布“五一”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宣布散会时，有代表临时提议游行示威。大家高呼“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刚出门口，就被国民党埋伏的侦缉队便衣冲散。接着，大批军警挥舞皮鞭、警棒迎面扑来。经过一场搏斗，有五十多名代表被捕，十多名代表受伤。王孝慈同志被捕后，敌人给他鼻子灌辣椒水，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这次纪念“五一”活动之后，侦缉队开始对我跟踪。一天，我刚上电车，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便衣也跟着上来。车至新华门时，我突然跳车，被摔倒在地。几分钟后，我才挣扎着爬起来。但那个便衣也被我甩掉了。我向北平市委汇报了这一情况。随后，省委决定调我到天津市任河北省委军委秘书。

天津被捕

1930年6月，我赴天津就任。这时，顺直省委已改称河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天津市。

我到天津后，按照接头的方法住在指定的旅社。不久来了一个同志，他说：“你的住处还没准备好。

现在先开展工作。”过了十多天，组织在法租界给我找了一间房。这间房在一个裁缝铺的二楼。去时，我以行李为幌子带去了两柳条箱文件。第二天，我到天津市委接头处找刘长春。在河北区一间小房中，我见到刘长春和孔秀珍同志。刘长春同志是市兵委的负责人，孔秀珍同志是市委机关工作人员，他俩以夫妻名义进行秘密工作。在这个小屋子里，我和保安师的一个军人同志谈论工作。天黑了，他们说今晚就不要走了。我也怕找不到我住的地方，就在这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俩都已出外。等我八点来钟出门时，三支手枪对住了我的胸膛，并严厉地宣布：“你被捕了！”敌人带我正走时，我碰到了刘长春。我俩照面都没吭声。这下我可放心了——他一定会把我被捕的消息告诉组织，告诉孔秀珍。

到公安局后，我已编好了假供词。预审科长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我说：“我叫王子和，是山西石楼县人。”他问：“到天津干什么来了？”我说：“在家做生意，过不下去。到天津找朋友，托人找工作。”之后，他们又拿出从刘长春房中搜出的几本书籍和一本天津兵运委员会办的《士兵呼声》。问道：“这是谁的？”我说：“不知道！”此后，他们又叫我写到天津的经过。我估计敌人要查对笔迹，考察《士兵呼声》上刻写的稿子是否是我写的。《士兵呼声》尽管有些文章出自我手，但幸亏不

是我的笔迹。

审讯后，我被关到了拘留所。这个拘留所，每个房间有一个大通炕。我疲惫不堪，一进去就扑倒在炕上睡着了。这个号房有个“笼头”，是第二十六辈青红帮，是为汪精卫招兵的一个旅长。他看我与别的犯人不同：别的犯人一来坐立不安；我一来就呼呼入睡。等我醒后，他问我：“你是什么犯？”我说：“人家说是政治犯。”他看我老练的样子，就又问：“你是第几次进监？”我说：“这一次就够倒霉的了！”这里的犯人对共产党印象很好。他们说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笼头”可能是把我当共产党人看待，对我颇为宽厚。他打破了新犯先睡到马桶旁的惯例，叫我睡在他的身边。他不仅对我没有敲竹杠，还叫我陪他吃别人“进贡”的黄花鱼。

在拘留所，我从哨眼发现对面房间的乔国楨同志。他是我在渭华起义期间认识的同志。这对，他化名为高子香。他向我示意后，悄悄对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要给敌人留口供！”在多次审讯的情况下，我真的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口供。敌人认为我吃硬不吃软，把我的手脚捆死，吊打审问。他们问我：“承认不承认是共产党？”我咬紧牙关就是不承认。突然，他们喊：“叫证人来！”我一看，他们绑来的是孔秀珍同志。我不晓得她怎么被捕了，也弄不清她是怎样招供的。我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对她进行“谴责”：“我托你

男人找事有什么罪？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孔秀珍同志理解了我的意思，她装着十分气愤的样子说：“我就是这样说的，我对你就不了解！”这时，我才放了心。几天以后，敌人把我送到了天津监狱。

监狱绝食斗争

天津监狱是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这个监狱里还有一个小监狱，有人称“新监”，有人称“红监”。小监里关押着一百二十多名政治犯。由于河北省委书记王藻文等人叛变，彭真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陆续被捕也关押在红监。在这里，共产党员写下了团结战斗的英雄史诗。

这个所谓模范监狱完全违背人道主义，对犯人进行残酷的虐待和迫害。他们克扣囚粮，每天给犯人吃两餐“三合米”——发霉的小米，谷子和砂子。每顿每人一小片咸菜，一碗盐水汤。牢房潮湿龌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刑期三年以上的都要带上沉重的脚镣，稍有不满意就得挨打挨骂。有十多个共产党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折磨死的。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彭真等同志组织大家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斗争。我进监狱时，监狱党支部又开始了绝食斗争。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了八条要求：一是不吃脏臭的小米、咸菜、盐水汤，要吃白米白面、蔬菜和肉类；二

是开放监房门及号筒门；三是政治犯一律除去脚镣；四是增加家属探监次数；五是政变病人生活待遇；六是延长运动时间；七是冬天监房要生火取暖；八是社会人士能读的书报刊物，放治犯也要自由阅读。监方时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

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党支部把斗争的计划报告给了省委，并请省委动员社会舆论予以声援。省委批准我们的计划后，我们进行了积极地准备。首先，我们用两种渠道和省委保持联系，一是通过探监，传递密信；二是通过同情我们的看守捎寄密写的信件。同时，我们还准备好了食盐。因多饮盐开水能延长绝食时间。绝食斗争开始后，狱方表面伪装镇静，说你们不吃饿死活该。但背地里却采取一系列花招。一方面把他们认为的十多个为首分子关押到单人牢房，另一方面把已判刑的彭真、李运昌等二十多人转到天津陆军监狱，妄图分面治之，我们的党支部成员均被分散隔离。随后，我和一个姓王的等三人又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姓王的是支部书记，我是委员。大家选我出头，我又向敌人重申了我们的八条要求。狱方给我戴了一个十斤重的大脚镣。一个看守给我把镣砸住后，恶狠狠地对我说：“看你以后还闹不！”晚上，带着大镣是难睡觉的。我脚疼得不停地抽动。

绝食斗争是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场生死搏斗。散人一方面劝我们复食，另一方面却威胁道：“再

绝食捣乱，就要严处！”我们的同志也据理相争：“我们既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监狱克扣我们的伙食，折磨我们，使我们无法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我们才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这是法律所允许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许犯人不吃饭。不吃饭就有罪？”我们义正辞严，使敌人无隙可乘。按照事先定好的办法，我们静坐抗议，低呼“反对监狱压迫”、“改善生活待遇”等口号。

监狱当局硬的失败了，又来软的。他们送来大米粥，诱骗大家吃饭，说其他条件好商量。他们欺骗单人牢房的犯人说：“别人都吃饭了，你们不吃饭太傻了。”有两个青年很坚强，敌人偷偷把点心送给他俩，他们还是不吃。他俩说：“要死，我们都死到一块。”

我们在绝食中，省委发出《动员广大群众援助天津被捕战士绝食运动》的紧急通知；新闻记者也到狱中进行采访，《北方红旗》多次呼吁社会支持绝食斗争；《大公报》、《益世报》也多次进行报道。当时，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正在河南、山东一带混战，奉军已进山海关，天津市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公安局长曾延毅怕事态发展，于7月5日到三监妥协。他向我们表示：除不允许阅读新闻报纸外，其余要求全部接受。在同志们强烈要求下，高于香、高子林等同志于当天回到了红监。高于香和高子林

同志都是监狱支部的成员。高子林同志被捕前是天津区委书记，高子香同志被捕前是河北省工会党团书记。

经过英勇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获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我们在狱中的生活有了改善，脚镣一律去除了；每天早晨，我们可以把监房门大大地敞开，让新鲜空气充满房间；从早起至入睡，我们可以毫不拘束地在院里活动。每日三餐都是白米白面，每顿一菜一汤。

为了纪念死者，教育生者，我们还为死难的同志开了追悼会。我们每人臂缠黑纱，默哀致敬。圆形走廊里挂着挽联，表示着对烈士的哀思。

我们还成立了学习小组，经常在为政治犯而设的图书馆进修学习。党组织和家属给我们送来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大纲》、《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二百多本。我和张孟旭、孟庆林在一个监房。他俩都是河北省师范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我起初跟张孟旭学习英文。后来监狱支部要求学习《资本论》，我又放弃了英文，跟张孟旭一起学习《资本论》。

那时，我们的生活已基本规律化。每天早饭前还要出操，我和一个姓王（李勃、蒙族）的同志是早操教练。到元旦时，我们还出墙报，演节目，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那时还演过一个反映工人阶级

联合起来斗争的话剧。我们这场话剧的“布景”是党旗。把红被子绑在圆走廊的墙上，被子上贴着用纸剪的镰刀斧头。

一天，检察官对我说：“你是公安局送来的，无罪释放不可能。你只要供认一点儿罪，判一点儿刑就可出狱。”我把这一情况报告监狱支部。监狱支部共同研究了 my 的口供。法院再一次审讯我时，法官问：

“你看过刘长春家那几本书吗？”我答：“我顺便翻了翻。”法官问：“你认为这书有问题没有？”我说：“我看那上面写的都对着哩！”他说：“好啦！”这样，就以同情共产党论罪给我判刑六个月。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组织第二中央，搞分裂党的活动。河北省委也有个别人跟着成立了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的党组织几乎陷于分裂。第二省委还通知监狱支部归它领导。监狱党支部当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认为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分裂党的行为，一致不承认第二省委。大家对组织第二省委的人进行了尖锐地批评：“我们正在死亡线上同敌人进行搏斗，你们却把矛头对着领导我们的省委和中央。你们应当感到惭愧和痛心。”会议根据这些意见作出决议，并向原省委写了报告。这个报告是密写在《中华杂志》中的。

2月8日，我刑期已满。我带着高子林同志让我转交省委的《中华杂志》出了狱。

任直南特委军委书记

我一出监门，就遇到组织派来接我的王同志，他是朝鲜族。他把我带到劝业场的一个茶馆。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以后叛党）已在这里等着我，我们边说边喝。我汇报了监狱的一些情况，并把写有工作报告的《中华杂志》交给了廖化平。他叫我住在旅馆等待分配工作。我在店里住了几天后，省委叫我到北平休养待命。

我回北平后，张金印等人已成立了北方筹备处，企图另立中央。在这些人的活动下，省委的肖明、吴化之等都参加了北方筹备处。张金印原是西安第三中学青年生活社的负责人。因过去的工作关系，他派人力图把我也拉入北方筹备处。我住在法政学院郭从周那里。肖明几乎每天到法政学院来给我做工作，动员我参加北方筹备处。我说：“王明是第三国际的代表，有什么意见可以在党内提。我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分裂党！”一天，他又约我到天安门。行至金水桥，我断然表示：“以桥为界，分道扬镳！”后来，肖明等同志也承认了错误。过了两星期，省委派我到唐山任军委书记。

到唐山下火车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我想：在唐山人生地不熟，若联络同志，势必暴露组

织。想到这里，我没出车站，又上了对面来的火车，返回北平。到北平后，组织叫我到天津听了一次传达中央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之后，把我派到河北省直南特委任军委书记。

直南地区位于河北省的南部，地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多年来，这个地区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繁多，旱涝灾害频仍，兵灾匪祸不断。人民群众多次组织反抗地主豪绅的暴动。中共党组织早在1925年就在这个地区活动。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这个地区党组织领导和发动过多次农民暴动，都失败了。党的组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直南特委机关先设在邢台市一个面坊。这个地方遭到敌人破坏后，机关又转移到磁县马头镇第三高小。特委书记是冯和斋、组织部长是刘大风、秘书长是喻屏。搞团工作的有车九思、杨三等。之后，直南特委机关又移到安阳市。

我到邢台后，特委派我到石友三部队联系兵运工作。石友三部队驻安阳一带。蒋介石的刘峙部队逼他北撤。我从邢台到安阳，和石友三部队中的高参谋联系。之后，石部北撤，我们又约定在冀县城外西南角一个学校进行联络。石友三部队北撤到保定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我住特委机关期间，曾到任县、磁县、肥乡等县巡视过工作。我到过彭城张兆丰同志的家。张明丰是

张兆丰的哥哥，张有衡是张兆丰的儿子。张兆丰牺牲后，张明丰坚决阻止侄儿参加革命活动。经我做工作后，张有衡同志才又开始了革命工作。

1931年7月，冯和斋通知我：“特委决定让你去大名县任中心县委书记，并继续担任军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整顿、恢复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魏县五县的党组织工作。”

大名是当时直南地区军事、政治的中心。明清以来，直南镇守使、道台都驻大名府，管辖十多个县。军阀混战时期，这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战乱不息，这里人民生活十分穷苦。立三路线时，这里党组织发动过麦收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我去大名县时，先到城东的小学找到了许彤云同志。经过准备，我们成立了中心县委和团委。中心县委共三个人：我任县委书记，前任县委书记李亚光任担织部长，许彤云任宣传部长。许彤云家在本县城东李茂堤；李亚光家在巨鹿县。县团委的书记是李世农。

开始，我住在街道小店里。后来，老许说：“现在高粱长起来了。能挡住人。比较安全。晚上可以睡到村外的井台上，不用花住店费。”晚上，我们几个人就都睡在村外的井台上。

我到儒家寨村去的次数最多。这个村有十多个党

员，支部书记是甄家的长工头。还有个党员是推小车贩运碗的，他姓赵，家很穷。他为了掩护我，让我住在他家里。晚上，我们在甄家的场坊里开会。我们协助这个村党支部恢复了原有的穷人组织——“杠子会”。过去，肩杠子给人抬轿娶媳妇、抬棺材埋死人的都是穷人。杠子会主要帮办红白喜事，所以也叫礼仪公会。杠子会有几条会规，敲几遍锣不到不行。这个杠子会实质成了党领导群众同地主豪绅斗争的群众组织。杠子会给地主办红白喜事要钱很多，对穷人则要钱很少或不要。有的杠子会还代表群众清查村长帐目，反对村长摊派不公平，维护群众利益。以后，一些杠子会还发展成救国会。

为了便于掩护工作，我们在县城南大街西边的关公庙前找了一间房子，从大铺子里进些零货，开了个杂货店。后来，又从魏县雇了个会织袜子的人。这样，我们对外既卖袜子，又卖货。这一年十二月，我们还在李茂堤村的李蕴珂家创办了县委机关报——《工农小报》，半月出一期，共出了八九期。内容有国内外形势，也有县内斗争消息和斗争口号，很受群众欢迎。

大名县党组织恢复起来后，我就着手抓其他四个县的工作。向南，我先到南乐县。刘大风同志就是南乐县人。麦收暴动时，南乐党组织没受大破坏，党的组织也比较好。我和县委的负责同志交谈工作后，又到清丰县。我先找到县城北关小学的教师乔献廷。经过

工作，恢复了这里的党团组织。县委书记是王冠儒，委员有杜化庭、岳图南（小学校长）。

接着，我又来到濮阳县。按照联络路线，我先找到濮阳县模范小学刘晏春。我问：“县委书记在那里？”他说：“在井店化村教书，离这很远。”我走了六七十里。到化村找到王从吾同志。我们先恢复了县委组织。县委书记仍是王从吾，成员有刘晏春、刘俊贤等。后来，我还到基层发展党组织。在两门地区的一个村里，还发生过红枪会和我盘道的事。一天晚上，这个村红枪会的头目说：“听说共产党的头目来了，我要和他盘道比高低。若共产党的道高，我们归共产党。若红枪会的道高，共产党在这里就不能存在！”一些新党员被这样的挑战吓住了。红枪会道确比共产党道高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和红枪会盘道。我和红枪会各自都带了保镖的人。红枪会的头目说：“红枪会是天道，天下将要归红枪会。”我给他宣传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道理。但我再说，他也不肯认输。随后，他问我：“你们红军的头是谁？”我说：“是朱德！是朱洪武的后代。”他哈哈大笑，说：“怪不得你们是‘红三党’（共产党）。我们是红枪会，你们是‘红三党’，都是‘红道’。两道相通，一家人。”此后，这一带的红枪会和共产党组织相处比较和谐。

我没有去过魏县，李亚光同志去过。那里有一个

支部。我见过支部书记。这五个县党组织恢复起来之后，我每过两三个月到各县巡视一次工作。

盐民斗争

在直南，我们在恢复党组织的同时，还组织这一带盐民反对盐务缉私队的斗争。

濮阳、清丰、南乐等县，地临黄河，盐碱地较多。

“早天白茫茫，涝天水汪汪，刮风黄土地，寸草难生长。”碱区许多农民不得不依靠做小盐谋生。盐民一家老小，五更即起，深夜始眠，辛苦几日，晒一池盐，交租纳税，所剩无几。若遇阴雨连绵，寒冬腊月，盐民啼饥叫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尽管如此，盐民还不得安生，天津长芦盐业公司将海盐运往内地，并派来长芦盐务缉私队。他们为了使大盐畅销，严令取缔小盐生产，不许小盐上市。缉私队骑着高头大马，手持真枪实弹，砸熬盐的锅，折卖盐的称，逼得盐民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1932年春，我来到濮阳县巡视工作。当天，刘晏春对我说：“明天盐民要驱逐盐巡（盐务缉私队的简称）。”我说：“县委要通知所有党员，并组织尽可能多的学生、群众支持盐民斗争。”

3月19日早饭后，几百名盐民手持铁铲，去包围盐巡驻地——王家大院。盐巡闻讯逃跑。“现在怎么

办？”有个人跑来跑去，急得满头汗。我从后场的土堆下来，找到这个人说：“给大家再鼓一下劲。冲进去把盐巡的窝子砸了！”这个人脱去上衣，高声喊道：

“乡亲们！盐巡跑了，我们能罢休吗？我们冲进去端掉他的老窝！有种的跟我面北磕个头！”盐民们一听，哗地一声跪倒。这个人一声呐喊：“冲啊！”他拿起长把盐铲冲在前头。盐民们蜂拥而入，把王家大院的门窗家具砸得一塌糊涂。盐巡用的锅、碗、瓢、勺也被摔打一空。事后，我才知这个人叫杨进才。

伪县长得知盐民闹事的消息，带着保安队前来镇压。几百名盐民把县长和保安队包围起来。保安队被盐民挤在一起，难于下手。盐民们据理和县长争辩，使县长狼狈不堪。县长见势不妙，只得向群众答应：

“盐巡退出濮阳，准许大家继续制盐。”斗争胜利之后，杨进才和我互通了姓名，他叫我到他家吃饭。从此，杨进才和我成了朋友，并叫我住到他家。

赶盐巡之后，我们派代表到附近各县联络，宣传盐民斗争胜利成果。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盐民在县城唱对台大戏庆祝胜利，周围数县派代表祝贺。会上，濮阳县成立了盐民协会。杨进才、刘玉峰、李银岭被选为正副会长。以后，我们还派代表到各县联络，扩大组织。到六月间，内黄、大名、长垣、南乐、浚县、观城、范县、东明等十三县都组织成立了盐民协会，开展了盐民反盐巡斗争。盐巡在濮阳一带

呆不下去了，又向北撤。听说清丰县的群众用土枪土炮截击。盐民斗争已经发展成群众性的武装斗争。这场斗争也为后来建立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

秋后，我到两门、桑镇一带巡视工作。在这里，我得了伤寒病。我在一个姓张的农民党员家养病。我不能吃干食。他家里每天给我熬汤吃稀，关怀备至。快到春节时，杨进才把我接到他家过年。他家给我端吃端喝，特殊照顾，使我很快康复。这一带人民对我的兄弟情谊，至今记忆犹新，感人肺腑。

过了正月十五，我的病基本好了。这时，王从吾同志代表特委通知我：“省委说你犯了富农路线错误，现调你回省委重新分配工作。”我不解地问：“怎么犯了富农路线错误？”他说：“一是十县盐民联合会代表中有富农、绅士；二是你依靠的杨进才是富农。”我问：“杨进才怎么能算富农？”他说：“杨进才经常请人晒盐，有时还雇人。”我生气地说：“他整天为盐民协会奔波，就是大家帮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把介绍信给我后，向我交待说：“到北京后，在介绍信里面写明你的住址，把信放到北大西院信插中，以后就会有人找你。”最后，我提出要到大名交待工作。王从吾同志对我说：“那里工作我们安排。你就从这里直接到北京。”我怀着郁闷的心情离开了濮阳县。

奉命赴沽源

我离开濮阳县后，经过会龙到达北平，住在华州会馆。按王从吾同志告诉的接头方法，我把介绍信放到北大西院的信插中，但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我过几天就到北大看一次，信一直无人来取。我感到情况有变化，又移住到蒲城会馆。

在蒲城会馆，我遇到陕西老乡王圣域。他想到苏联留学，正在攻读俄语。他需要俄语辅导教师，我就把法政学院的郭从周推荐给他。由于找不到组织，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困难。这时，我只有求助于王圣域。他慷慨解囊，每月给我资助30元生活费，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一天，我在蒲城会馆，巧遇谢子长同志和一个同志接头。我向谢子长谈了我的情况。不久，省委和我接上了头。省委即分派我到沽源县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做军事工作。王林（王霁然）是这个师党委的负责人。由于他受张金印的影响，不服从省委指示。为此，省委给我的任务是：通知开除张金印党籍，王林犯了错误。然后，由我接替王林工作。后来，我又见到了谢子长，他约我到陕北打游击。我说：“省委最近已给我分派了工作。我不能随便离开！”这也是谢子长同志和我的最后一面。

九月初，我通过地下党员钟师统找到了玉林，商量了到沽源的办法。冯玉祥儿子冯洪国是十八师的营长，共产党员，是这个师党委的成员之一。省委派我和他接头，共同落实省委指示。这时，冯洪国的妻子准备从北平到沽源。这样，我就以给冯洪国送妻子的名义去沽源。中秋节那天，我们到达张家口。晚上，我们住在高树勋的公馆，第二天到了沽源。我住在一连。一连长是共产党员朱大鹏。一连的党支部书记是张文舟。我给他们说了来意。他们说冯洪国不在部队，叫我先在连的党员会上传达省委指示。后来，听说部队要开到热河省赤峰县，我建议在赤峰一带打游击，也没有被采纳。我在部队住了十多天，师党委仍没有人接待我。一天，张文舟对我说：“有个团长知道了你的情况。他说你再不走，就对不起朋友了！”无奈，我离开了沽源。

我回到北京后，省委已遭到大破坏。和我接头的王克平也被捕了。我到蒲城会馆后，王圣域即告诉我说，前几天特务还在这里等着捉人。我在这里吃了饭，蒲城一个姓雷的把我送上电车。分手时，我对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

离开蒲城会馆之后，我就游击式的在同乡那里住一夜，那住一晚。我想尽了办法，还是找不到党组织。这时，我想起了谢子长叫我回陕北打游击

的话。

回陕西谈何容易？从西边走，绥远有大沙漠难以通过；从东边走，要经过渭华地区，这是通缉我的白区。我准备以回陕当兵的名义，再找组织。王圣域说可以把我介绍到驻在陕西朝邑县的王勤轩团长那里。没有路费怎么办？我又找到陕西老乡程仲农。他从关麟征部队中给我搞了一个护照。这样，我不仅解决了路费问题，还保证了途中通行无阻。

四 在陕甘宁边区

(1933·12—1942·8)

回陕找党组织

1933年12月，我到陕西朝邑县，找到了国民党军四十二师一旅三团王勤轩团长。王勤轩是王圣域的老同学。他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先叫我在团部当副官，后在教导队当司务长。

1934年春，我以国民党军队副官的身份回到赤水。母亲因想我已哭得双目失明。我看到她模糊的眼睛没有一点表情，苦楚的面容又添了道道皱纹，不觉一阵心酸。我走到母亲身边，轻声叫道：“妈，我回来了。”失望的刺激使她已经麻木，她已不相信任何人的安慰。妈把我从头摸到脚，忽然激动地说：“真是我的儿子回来了！”她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几天之后，我提出要三个姑母家走走。她坚决拒绝到二姑家去。她说：“你走后，就连你二姑也胡说八道，说你是土匪。还说你抢了她家的被子。”我心中泛起一片波澜，一种崇高的母爱油然而起：生我者母

亲，知我者还是母亲。

后来我找王尚德同志，想通过他找党的关系。他可能因我穿国民党军官服装而戒备，只说他现在和郑云章办合作社，概不谈党组织的事。

我回部队后，部队又移防到洛川。在国民党军四十二师第三团隐蔽，我的主要目的是找党组织。我经常到第一高小同校长雷向阳、教员刘有余闲聊，想找点线索。经他们介绍，我还到城西门外西沟见了种菜的农民唐世杰。他们也找红军联系。我和刘有余商量，由刘有余给我团七连一个姓许的文书（进步分子）写张路条，叫他到黑龙口一带打听红军。后来，这个文书一去杳无音信。我还到王世泰亲戚家去过，也来打听到红军的下落。王世泰也是洛川地区早期共产党员。有一天，部队又派我到富县侦察红军行迹。我想这可是找党组织的机会。我到富县张村驿后，住在一个铺子里。我打听红军的下落，老乡说：“前几天听说黑龙口一带有红军，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

陕北红军是于1932年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主要活动在陕北地区。其主力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二十六军军长为刘志丹。

杨虎城于1934年七八月间命令第三团到清涧去“围剿”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队伍行军到延川时，我遇见了清涧的地下党员白金贵。我说，部队当天就可到达清涧，请他到清涧县城约定的地方见面。我在清

洞住了十多天，部队又调回洛川。在此期间，白金贵一直未来。我没问他的工作地点，也无法去找他。当时敌我对立十分严重，双方戒备都很森严。我无法离开部队单独行动，白金贵的线索又失掉了。一天，教导队大队长刘禹干说发现了红军游击队，命教导队立即出发。我想这又是个机会，结果部队到城西北约四十里的一个村子，空跑一趟，还是一无所获。

1934年冬，四十二师第三团派我到大荔县学无线电。我想，我的老同学乐以成等在大荔，乐曾参加过驱逐刘振华的运动。我可到大荔通过乐找党组织，但这次也没找到。1935年元月，我带了一部电台回部队，团长任命我当了通讯排长。为了到西安找党组织，我借机请求到西安学习无线电修理。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

1935年四五月，我从洛川未到西安，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学习无线电修理。过了几天，我终于见到了张秉仁同志。他和刘文伯当时办《工商日报》，张是总编，刘是社长。张秉仁约我到大雁塔去“游玩”。他问我：“你准备干什么？”我说：“还是干革命！”他又问：“怎么干法？”我说：“我现在失去了党的关系，一直找不到组织。”我向他谈了历尽千辛找组织的经过。他说：“你过几天到我家来。”几天后，他对我说：“你的情况已向组织汇报。你天黑时到皇城西门外等候，会有人来找你。”

我按照接头的方法见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王超北同志。他是党中央派在陕西搞情报工作的。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他叫我做情报工作。我想，程卓民的电台可以利用。于是，我答应了王超北同志分配给我的工作。

一天，一个姓马的同事邀我到易俗社看戏。我碍于情面勉强答应了。进戏院后，一个可疑的人盯上了我。我转身就出了门。有两个便衣把我拦住。一个说：“请到省党部走一趟。”我说：“我不是党员是军人。我犯法有军法处，为什么要到党部去？”他们看我态度强硬，就问我：“你是否姓高？”我说：“是！”他们又问：“你是否叫高文敏？”我说：“不是！我叫高子谦！”我亮出了排长的身份证。他们连说：“误会！误会！”我看他们软了，就理直气壮地说：“怎么能随便抓人？请你们到绥靖公署走一趟！”他们知道省党部和绥靖公署有矛盾，到绥靖公署不会有便宜，不敢去，所以就溜走了。

无线电队队长程卓民和我关系很好。我以听新闻为名想借电台。程卓民说：“现在特务监视很紧，不能利用。”我失掉了做情报工作的条件，请求组织派我搞地方工作。此后，王超北同志又介绍我和地下党员孙作宾同志接头。

组织临时省工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于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围攻。他命令陕、甘、晋、绥地方军阀联合围攻陕北红军，将原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中央军调入陕西伙同“围剿”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下，陕西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

1935年8月，在陕西省委已经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孙作宾同志、崔廷如同志和我组织了陕西省党的工作委员会。因我是通过王超北介绍给孙作宾同志的，他以为我是党从上海才派回来的。所以他和崔廷如同志坚持选我作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最后，我们讨论分工的结果是：我负责全盘，兼管西安和东路（西安以东）；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兼管军事；崔廷如担任秘书，兼管西路（西安以西）工作。还有一种叫法，说我是临时省委书记，孙作宾同志是组织部长，崔廷如同志是秘书长。这种提法我记不清了。会后，我们各负其责。孙作宾同志介绍我和西安市党组织负责人姚全接头。我们接头地点在北门外护城河公路西边的一个电线杆旁。他向我介绍了西安党组织的情况。

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确定的路线，我们分头传达会议精神。第二年五月中旬，我到韩城找到王均。他又陪我到华县咸林中学找到华县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玉堂同志。刘玉堂同志说：“这里开会不方便，还是到三张村我亲戚家去开会。”于是，我们当天又到华县赤水三张村。参加会议的有刘玉堂、王均等。我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当我说到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有我们的同志时，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下午，王均的弟弟王勋从华县赶来，神情紧张地说：“西安通知，姚全叛变了，西安正在抓人，不久要到东府抓人。”我吩咐大家立即转移，并设法尽快告诉与姚全有关系的同志隐蔽。

我们分手后，我回了家。过了半个月，我收到张秉仁同志的来信。他说中央叫我和孙作宾同志到陕北汇报陕西省工作。我回西安后，中央派交通员把我们俩个带到杨虎城的军法处。我感到纳闷：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正迟疑时，看到我在清涧县委工作时的一个姓师的委员，才放了心。第二天，我们乘坐杨虎城的大卡车经过洛川到延安。当天又趁黑连夜到了安塞。在安塞接待站，我见到了叶剑英同志。我对他说：“许权中是个人才，应把他叫回来。”叶剑英同志对我说：“已派人叫了。”第二天，接待站又把我们送到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县。我刚到保安县时，接待人员

看我身穿国民党军装，以为我是统战对象，招待得很好，每顿饭有菜有汤。以后听说是自己人，饭就换成一碗小米饭了。

在我到达保安县期间，曾经有人把天津一个叫高文敏的女人登报自首的事误安在我的头上，并给中央写了反映信。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同志汇报陕西工作后，李问我登报自首的问题。我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叛变革命！我能犯一个错误，不犯两个错误。若自首是真的，是一个错误；再不承认，那就成了错上加错，犯了第二个错误。”此后，孙作宾同志回西安了，我被分派到争取东北军委员会工作。

合水被捕

争取东北军委员会是周恩来同志负责的。1936年8月，周恩来同志派我到东华池县做东北军工作。等到9月份，习仲勋同志要到关中工作，我背着夹被，穿着单军装，和习仲勋同志一块从保安县出发了。

我步行几天，走到了东华池县。东华池县委设在严家洼。这一带群众生活很苦，但对人很忠厚。

我到东华池县约有十多天，游击队从山上逮了东北军一一一师的五个打柴士兵。县委把这些人交我处理。我对这五个俘虏宣传抗日道理。我说你们都是东

北人，为什么有家不能回？日本人蹂躏我东北同胞，你们为什么把枪口对着共产党？为了感化这些俘虏，我对他们在生活上格外优待。没有家鸡，我就弄来野鸡给他们吃。在我耐心开导下，他们思想都有很大进步。我提出叫他们引我见一一一师的师长沈克，设法向沈克宣传抗日道理。他们答应了。我拿着毛主席告东北军同胞书和其他宣传材料，以进俘虏名义去沈克师部。快到师部时，这五个俘虏却又执意不让我见沈克。他们说：“我们师长对共产党十分仇恨，见了共产党就要杀。你去凶多吉少，万不能去！你若去了，就别怪我们不够朋友！”我无奈，只有和他们告别。临别我嘱咐他们，以后要宣传抗日思想。他们连连称是。

我刚转过一个山岭，突然碰到合水县民团的十多个团丁。他们一听我是外地口音，又搜出我带的宣传品，以为逮住了大共产党。他们把我带到附近一个地主家。我当时穿的还是单衣。团丁们用皮绳把我五花大绑，连夜送往合水县。行至半路，他们把我绑在大树上。一个小团丁把刀在石头上磨了磨，时我说：“干脆把你杀了！”我无可奈何地说：“刀在你手，斩杀由你。”原来他是诈唬我。路上，我通过这个小团丁打听了合水县的情况，并以此编造自己的口供。到第二天下午，我被押送到合水县北川。保安大队长李鸿轩对我进行审问。我借机向民团宣传抗日思想。我说：

“我是渭南县郭家壕人，曾在西北军国民第五军当

兵，以后回家务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四省，又搞冀东自治政府，继续侵占我华北，妄想灭亡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决定再次弃农从军。我去延安一带找在东北军作事的朋友，想通过朋友参加抗日。路过甘泉县南稻草堡时，被红军扣住。红军对我讲抗日主张，我非常赞成，愿意留在红军做抗日工作。因我是旧军人，红军叫我做东北军和国民党其他武装部队的抗日联络工作。我本来准备见沈克师长，被你们捉住了。”我编造的供词敌人虽然信了，但他们审后仍决定杀我。绑我的皮绳已换成草绳，因为他们舍不得皮绳。我的口供传到一〇六师的刘师长那里，他看我似有来头，要亲自审讯。这样，我就幸免一死。我被押在合水县城东关保安大队部，住在一个庙院的小房子里，四个手持盒子枪的团丁日夜看守着我。

合水县的县长李石僧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他看我穿的还是单衣，就送我一件棉衣和一个破腰带。每过几天，有一个姓杨的给我送两个馒头。

一天，我被押送到一〇六师姓刘的师长处受审。师长住在一家东房里，宽大的窗户安着玻璃。透过玻璃发现屋里还有人在听审。师长在门外的屋檐下踱来踱去，耐心地倾听我的供词。我讲完后，他问我：“你们若是真抗日，为什么还要投降俄国？”我反问：“谁说投降俄国？”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建立苏

维埃？”我说：“这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名称，和投降俄国毫无联系。”但我还是说服不了他。我对他又说：“我们毛主席精通马克思主义，他无所不知。若要问他，你是否可写一封信，我一定给你送到。”他不愿写。审问了一两个小时后，他对看守排长说：“严加看守，待后我还要审！”

排长看师长对我的态度暧昧，对我看守也松了。门口看守的团丁撤走了。我还可在院中随便走动。我乘机了解地形，同时作管押我的团丁工作。看守我的团丁有两个原是红军战士，被俘后到了国民党军队。经过两个阵营的对比，他们仍留恋红军生活。他俩问：“我们回红军去，共产党会不会杀我们？”我说：“肯定不会！”经过我的解释，他俩还打算返回红军。

虎口脱险

11月的一天，合水县民团挖好了埋人的土坑，准备把逮捕的外地共产党杀掉。团长的护兵给我透风：“伙计，你今晚的日子不好过。”我想逃跑，可四周高墙，门卫森严，只好听天由命。县政府的秘密党员为了救我，多方活动了县长。县长最后说：“共产党不能分本地和外地，要杀都杀。”争论不下，只好报上去由专署裁决。于是，杀我的计划暂时搁置。

过了两天，县政府一个姓杨的悄悄对我说：

“现在一〇六师和一〇八师正在换防，一〇八师师长很坏。” 奏巧，这天下午团丁叫我和他一块到面坊取面。进面坊门时，突然跳出一只大狗向我俩扑来。意外的惊吓使我和他都跳出了大门。这时，我灵机一动，佯装得十分怕狗的样子，说：“我不敢进去！”小团丁露出讥笑的神色教训我：“狗有啥可怕的！我护你进去。”我还是坚持不敢进去。他无奈地说：

“那我把你带回。”我说：“可以。”但他又不想返回，说：“你在门口等着，不要乱跑，我去提面。”当他进门后，我觉得时机已到，跋腿就跑。正遇敌人换防，东来西往，乱无秩序。我乘机钻在毛驴群中，顺手拣一根树枝，佯装赶驴人混出封锁线。

我越过小河，顺东川沿沟向东北方向逃跑。我又饿又累，高一脚，低一脚，也不知跑到了哪里。天黑了，我看见一个独家户已亮了灯。正想上前问路，又从这家扑出一条大狗，汪汪咬个不停。这时，我又听到后面追兵的声音。我沿老路再继续跑，势必要被他们追上，我跳入深三四丈的沟底。沟里黑洞洞的，沟底树枝密密麻麻，人要想走过去也困难。我庆幸跌入树丛中。敌人赶上来，弄不清我的去向。我怕敌人绕到沟掌根山，我就向对面山坡方面爬行。黑郁郁的山林中，不时传来低沉的兽啸，山鹿在对面发出阵阵惨叫。我该爬向何方？我想，哪个方向有野兽叫，哪

个地方就无人。野兽叫的方向就是我的去向。我登石攀枝，终于爬上了陡峭的山坡。爬上山顶时，我感到头昏腿软。一棵苦栾树把我绊倒，由于身子失去平衡便滚下山沟。我在山坡上翻了三四个跟头，被架到一棵岩生的树上。我喘着气，架在树杈上安然的休息着。我摸到满头粘糊糊的，虽然看不清，但我知道是血。快到山底了，我顺坡溜下，又沿沟而上。这时，我听到身后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怀疑这可能是狼或是豹。我这个饿肚子的人岂能成为它的美餐。我爬上了一棵大树，在树杈上一打盹就睡着了。什么狼、豹、敌人都顾不上了。等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东北方传来隐约的狗叫声。我白天不敢行动，只有躺在树丛中。我头部、身上多处撞伤，但最难熬的还是渴。深秋的空气十分干燥，长途跋涉又流尽了汗水。我口里在冒烟，喉咙像起火。我想小便，但又怕身体失去水份。无奈，我只有喝自己的尿来止渴。

天黑了，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怀里揣着许多尖石，准备对付来犯的野兽和敌人。我从沟底向西北方向的山坡上爬行。半山腰有一户人家。我敲门而入，说我是做生意的，被土匪抢了，恳求给我一碗水。忠厚的山里老乡对我很同情。他让我喝了水，还给了一个大玉米馍。我吃了一半，把另一半装在口袋里。我翻过山，到了二浆川，这里已经是苏区了。我看到二

浆川河哗哗的流水，犹如看到跳动的生命。我喝饱了这带甜味的救命水，好象生命又焕发了新的活力。我怕以后再遭干渴之苦，在河边坐了半个小时，又喝了几口。我过了河，遇到一个农民。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用盐水给我洗了伤口，把我送到乡政府。后来，我才知遭这个人叫焦梦熊，曾在红二十六军当过事务长。乡政府看我的伤势严重，又把我送到吴起镇的红军总医院。那时，我的两只眼睛充血，左眼已发炎化脓。

洛川建党

1937年1月，我病愈来到延安。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对我说：“你的情况组织已知道了。现在组织分配你到巡视团工作。”边区党委组织了两个巡视团。我和白政明带第一团；白坚带第二团。我经三原到庆阳地区巡视。回来后，派我当边区党委的组织科长。随后，派我任边区党委秘书长。11月，边区党委又派我筹建洛川工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全面打响。延安是我党中央所在地。洛川地区是延安的南大门。我党派往全国各地领导抗日的干部和人员大部经过洛川地区。回延安汇报请示工作的，各地革命干部和青年到延安学习的，也

要经过这个地区。所以，国民党把洛川县城作为反共的据点，借以刺探我党的活动。他们派钟相毓任国民党洛川行政公署专员，并派叛徒、特务高仲谦任洛川县党部书记长。为了加强我党在洛川地区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37年11月成立洛川工委。我任工委书记，白风璋同志任组织部长，胡育之同志任宣传部长，柳树青同志搞青年工作，罗士英同志搞情报工作。还有工作人员潘光亚。

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我军和国民党军同时在延安以南地区驻防。洛川地区各县均以国民党军政为主，同时也有我延安保卫司令部派出的“中、宜、洛八路军办事处”，分别驻在宜君县七里镇和洛川县城两处。洛川工委设在城内九里局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以办事处负责人名义开展工作。我住在城里屈崇荣的院内。1938年5月，西北局决定在洛川工委基础上成立洛川特委，我任特委书记，强自修同志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慕生忠同志任宣传部长，杨锡林同志搞秘书工作。以后，孙润华、罗成德还先后增补为特委成员。特委管辖四个县：洛川县、黄陵县、富县和宜君县。

我初到洛川时，我军的一个炮兵团驻在这里。第二年，炮兵团调到太行山一带，陈先瑞同志的警备四团来了。1938年6月，四团走后，韦国清同志的抗大第六大队又来了。大队部在城郊厚子头。为了工作方

便，特委也搬到厚子头。1938年10月，六大队也开往太行山一带。我们特委由洛川县移驻宜君县店头镇，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店头镇办事处。

我筹建洛川工委时，组织给我的任务是：一、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三、发展地方武装；四、保护去延安的青年学生。

我到洛川后，首先发展了雷雨天和郭景龙为共产党员。雷雨天在县东南槐柏镇一带发展和建立地下党组织。到1938年春，该地工作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在特委之下又建立了洛川工委。杨锡林任书记，雷雨天任副书记。潘光亚同志在洛川县城开展工作。他在手工业工人、市民、学生和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组织。后来，派杨月计同志在洛川县东北乡村开展工作，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我派郭景龙同志去黄陵县开展工作。他在黄陵县发展晁清芳、田德霖、李士弼为党员。晁清芳、田德霖又在黄陵县桥山高级小学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并建立了该校党支部。此后，他们又在全县大多数小学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又建立了黄陵工委。郭景龙任书记，田德霖、晁清芳、李士弼为委员。

宜君县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37年前由关中特委和陕西省委领导。洛川特委成立后划归洛川特委领导，

派李笃信任县委书记，薛志仁任副书记。宣传部长是孟树林，组织部长是姓周的，委员有胡建民、王勇录。1940年以后，洛特领导下的党组织发展至黄龙县、韩城县、合阳县、澄城县、白水县、蒲城县等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普遍建立“抗敌后援会”。我们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开展抗日工作。同时，我们还和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做统战工作。我以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身份与专员钟相毓交往，我同驻洛川县城杨虎城部骑兵团高副团长、进步绅士王子万等人交了朋友。通过这些进一步做团结抗日工作。后来，有些统战对象，在掩护我们地下党员活动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10月，国民党的蒋鼎文部要围攻店头镇。我驻守富县的警备一旅文年生部八团准备还击。我请示西北局后，作了战斗部署。我们先撤离店头镇，特务机关转移到富县茶坊镇。我指定强自修、慕生忠同志主持特委工作，我随八团和独立三营行动。在店头镇南边，我们打了胜仗，收复了焦平，和关中联成了一片。

1940年1月，我又回到富县茶坊镇的特委机关。从此，我们开始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1940年初，西北局调我回延安参加学习，我的工作由秦力生接任。

给中央写运盐报告

1940年1月，我从洛川回延安参加学习。

到延安后，我们边学习、边讨论、边检查，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学习期间，我聆听过毛主席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毛主席那精辟的论述，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高岗谈了我在大名县当中心县委书记时领导盐民斗争中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高岗不屑一顾地说：“那是胡来，是王明路线整我们哩！”王从吾同志那时也到了延安，我问他：“你给我扣的富农路线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不好意思地说：“那就别提了！”

我是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书记。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等同志都在我这个总支参加组织生活。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开会时严肃认真的作风，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董老每次发言，都要站起向我报告：“主席，我要讲话！”

在中央直属机关时间不长，我又被分派到延属十县工委搞秘书工作。当时，高岗是工委书记。

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粉碎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有些人不以为然，说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一些干部心中没底，顾虑重重，举棋不定，运销食盐工作进展不大。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主席叫高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并且要求三几天完成。高岗把这一紧急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我接到通知后，于8月13日当晚在富县城关区进行调查。我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副区长鲁忠才和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鲁忠才详谈第一次运盐的经过，王毓贤、孔照庆作了补充。我们通过算帐，结论是一般能驮一百五十斤盐的毛驴，跑一趟可赚一百元以上，好驴赚的钱多，弱驴赚的钱少。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为了把这一重要情况尽快报告毛主席，我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七个问题。因时间很紧，我也没有经过润色和加工，于当晚就写好了。第二天清早即派人把运盐报告送回延安。

我万没想到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毛主席于1941年8月26日为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

个很长的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随后，毛主席亲自给我写的运盐报告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推荐报纸发表。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推导作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成为当时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鲁忠才长征记》

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为《鲁忠才长征记》写的评语，同时，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的前半部分。翌日，又发表了后半部分。全文如下：

鲁忠才长征记

—— 鄞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鄞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谈话，王毓贤、孔照庆补充，高

克林记录，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

(一)城关区第一次应出驮盐牲口五十头，实去二十八头。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动员四十多头)，当时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区政府抓的不紧，——因忙于借粮、公债。

(二)阴历7月18日起身，8月11日回到家，往来共二十五天，由富县至定边十二天，到盐池装盐一天，回来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及各站概况如下：

- 1、郿县至张村驿五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
- 2、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割草喂牲口。
- 3、烂泥坡至李家砭，有二十里山，四十里沟，路难走，草不好。
- 4、李家砭至卢家角，有三十里沟，五里山，最难走，草不好。
- 5、卢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
- 6、乱石头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
- 7、三里庙至梁庄，八十里，有四十里山路，很陡，难走，水难(苦水也没有喝的)，曾看见一个盐脚户把驴跌死。
- 8、梁庄至定边九十里，有兵站，草每百斤五十至一百元，没水。
- 9、定边至盐池四十里，往返一天可回，沙路难走。

(三)沿途的困难：

1、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蚱蜢咬，最好晚上走，对牲口对人都好。

2、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水，人与牲口容易受渴。

3、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

4、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容易走失弄乱子。

（四）一路生活情形：

郫县城关区共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全看你与店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生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五）路上所发生的问题：

好的例子：

1、牲口没有出毛病，一乡和三乡的牲口去时瘦，回来肥了，原因脚户负责，当心喂。

2、脚夫也没有出毛病的，大家身体很好，情绪高，没有一个瘦了，就是晒黑了些。

3、沿途没有遗东西，牲口也没有吃人庄稼。主要是鲁副区长是个老脚户，有经验，又负责，又细心，人也灵活，所以成绩很好。

坏的例子：

1、第三乡第一行政村村会长杜海，卖了好驴，买头坏驴去，结果驴乏了，没有驮盐，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的路费。另外第三乡派去一头坏驴子（腰坏了），四乡监军台村去了一头坏脚驴，都没有驮盐，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路费。另外该村一头驴被着烂鞍子，结果压坏了脊梁。第二乡乡长有头驴，去了一头坏驴，鞍架都不好，在路上捣麻烦。这些事事先区级政府没有细检查，有些像已知道，也未纠正，结果二十八头驴子，只有二十五头驮盐，其余的三头空走一趟，盐价分文无着，白赔了五百到六百元路费，里外损失共在一千五百元以上，此事很值得区乡干部警惕。

2、四乡监军台村村会长不听鲁副区长指示，不给牲口带好料（草麦、蚕豆），而将高粱等坏料充数，结果该乡牲口因没好料吃，在路上发生卧下的事。准备向该村会长作斗争，处罚他。

3、四乡脚户杨万保，在路上“耍死狗”装病，偷跑回来，乱造谣言说：“死了两个人，曹副区长和一个姓王的。路上没饭吃，驴脊梁都压烂了，店里不能寄粮……”使得城内好多人不安心。区长对这件事注意不够，以后要警惕。

4、有几家去坏驴，结果驮的少，每驴只驮百一十多斤。还有四乡监军台村，一家打发驴走时，把笼头都换成坏的，准备驴死，所以一切都不要了。二乡乡长的驴子，这次回来，离家只有十多里就卧下了，他也不肯派好驴去接，打烂帐，以为驴一定会死，一定不会回来的，所以不接。

5、有一二头驴子驮的太多，分给另一空驴驮了四五十斤，到孙三要险（地名）税局检查，因无票，被没收盐五十斤，口袋一条（值洋二十元）。

（六）用费和赔赚问题：

1、每一头驴平均的用费——料二斗，共洋六十元；粮每人一斗五，一人赶两驴，每驴摊七升五，价洋三十五元；路费七十元；合共一百六十五元。外加盐本二十元。平均每驴费洋一百八十五元。

2、平均一乡每驴驮一百三十斤，二、三、四乡每驴驮一百十斤，按现在交到镇盐价，每百

斤二百元，每驮可卖盐价二百二十元至二百六十元。

3、就现有每驮盐价，扣去用费，最少可赚三十五至七十五元。

附注：

一、若每驴能驮一百五十斤盐，按现在盐价每驮保证赚一百元以上。

二、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一百十斤，一乡驴驮一百三十斤，是脚夫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一百五十斤。

三、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好驴，才能更多的赚钱，驴愈坏愈少赚，以至亏本。

（七）经验教训：

经验：

1、城关区这次运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2、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六百元”，“是边区最大的

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4、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会追究），舞弊（把坏高粱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5、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头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1、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三头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2、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3、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百三十斤的可赚七十五元，若驮百五十斤则可赚百十五元。驴越坏赚钱越少，甚至赔本。例如城关区去

了三头坏驴子(一头坏腰,一头坏脚,一头乏驴)。结果没驮盐,每一驴白费路费一百六十五元,每人往返共损失一千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至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头驴可省五十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5、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约值20元之谱,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以上是我1941年8月13日写的《鲁忠才长征记》的全文。1948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经毛主席修改的《鲁忠才长征记》作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附件被收录。使我更受鼓舞的是,时过39年后的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40期上又重印了《鲁忠才长征记》,并加了说明。说明写道:“高克林同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原载1941年9月14至15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录自为这篇调查报告拟定了题目,并且写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所谓的‘长征’,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活跃城乡经济生活,陕甘宁边区富县城关区组织人力、畜力去定

边盐池运盐，取得成功。调查报告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成就和经验教训，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问题讲得这么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同40年前大不相同。我们从事的经济工作，其复杂程度，是过去完全不能比拟的。更加需要人们深入到经济生活里面，掌握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目前在不少同志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识不足，学习不够，我们要在系统地学习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钻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向实际学习。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实在地而不是浮夸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看看《鲁忠才长征记》，还是很有教益的。”

办民族学院

1941年9月初，高岗和陈正人跟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成立民族学院，叫我负责筹办民族学院工作。

我尽管是办学的门外汉，但我却乐意做党的这项重要工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因为民族解放的首要问题是自求解放。

而求得自身解放又只有在各民族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才能获得。就整个国家而言，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革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使命。在建党初期，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就经常到北平蒙藏学院进行革命活动。红军长征顺利通过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区域，不能不说这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民族干部，动员各民族一致抗日，粉碎日伪政权。革命的形势需要大批民族干部，民族干部也需要用马列主义民族思想来武装。办民族学院势在必行。

早在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党中央就曾指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期分批地把一些蒙古族青年骨干送到延安学习。当时，在延安所设的学校中，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等等，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而北工委决定从大青山来的同志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民族部。

经过紧张的筹备，我党培养民族干部的第一所民族学院于1941年10月10日在延安大砭沟举行开学典礼。

民族学院是在院北公学民族部、中央党校回民部、西北工委研究室的藏、彝及其它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学生汇集起来的基础上成立的。院长由高岗兼任，我是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民族学院共分西个处：

教育处、总务处。教育处处长是乌兰夫，副处长是王铎，工作人员有周吉、迟群、王仲方等十多人。总务处长是梁达君，副处长田广润，工作人员有王国善、李国喜等二十多人。学校还专门设了一个研究部，后改称研究处，是在西北局民工委研究室的基础上组成的。刘春先后任部长、处长，成员有马寅、高鲁峰、马尔萨、孔飞、克力更、刘元夫、韩戈鲁等人。

学生多是从部队、机关、学校来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最多，还有彝、满、苗等民族。从陕北公学来的五十五队也到民院学习，师生共计二百余人。学院把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编为研究班。研究班的学员有乜子清、于子净、云北峰、王化国、胡世贤、何树声、任其久、寒峰、陈炳宇、黄静涛、王希宁等。同时，学院按照民族和文化程度编了五个学习班。一班指导员王志强，二班指导员王仲方，三班指导员海涛，四班指导员宋友田，五班指导员金浪自。

学院的教员多由研究处的同志担任，有时也聘请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刘瑞生等同志讲课。我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校务工作外，还负责给学生讲形势政策，军体操练，给研究班上《新民主主义》课。有时，我们还邀请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给师生作对敌斗争报告，进行形势教育。杨植霖、李维中等从大青山回延安后，都给师生作过形势报告。

中央对民族学院十分关怀，生活上处处给予照

顾。吃饭，保证供应；穿衣，发最好的斜纹布。边区财政厅南汉宸同志对我说：经济再困难，只要你开口，我们都想办法满足。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师生的学习生活还十分艰苦。师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是原青年干部学校的几十眼窑洞。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学校共设了两个食堂，一个汉民食堂，一个回民食堂。吃的是一日三餐小米饭，早晨吃小米稀饭没有菜。中午和下午是小米干饭，一盅一小盆稀汤菜。遇到节日，可以吃到荞麦面团，有时可吃上馒头。晚上，为了省油，学生摸黑讨论学习心得体会。

学生没有课本，都是上大课，靠笔记。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个蘸水笔尖，学生找一节高粱杆，插上笔尖，就算解决了写字的问题。星期天，学生到山上割马莲草、打柴。用卖草卖柴的钱又买回马粪纸，紫色和绿色的颜料。用马粪纸订成笔记本，把紫色和绿色颜料混合制成便宜的“蓝墨水”。为了节约纸张，学生把字写得很小。

学院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学员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他们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外，还种蔬菜、烧木炭、打窑洞，开展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学员们课余唱歌、扭秧歌、讲故事、搞创作、演节目，使学院变成了革命的乐园。春节期间，学生们还用自己创作的节目为烈军属慰问演出，受到延安文

艺界的好评。刘春同志还为学院创作了校歌：

“我们是各民族优秀的子孙，
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
汉、满、蒙、回、藏、苗、彝，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各民族亲密的伙伴，
明天是战斗的先锋。
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
高举起各民族革命的旗帜，
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统一的新中国。”

这正是当时民族学院的写照。由于党的精心培养，民族学院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解放后，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是在这里被培养过的。延安的民族学院以她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

五 在塞北抗日前线 (1942·8——1945·9)

受命大青山

1942年6月，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跟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到绥蒙地区任区党委书记。

绥蒙地区是我党一个战略要地。它北靠蒙古、苏联，南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东是晋察冀边区，西南是陕甘宁边区。所以，这个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后大门，晋西北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晋察冀的侧背，是通向蒙古和苏联的要道。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对于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党中央都有至关重要意义。

大青山是绥蒙腹地，东西延绵700里，南北纵深一二百里。它位于阴山山脉中段，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东西连贯集宁、归绥、包头等要镇。从国民党到日本帝国主义，都妄图以高昂的代价争夺这一要地。因而，这里也就成了我党同日伪斗争的焦点之一。1938年5月14日，毛主席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同志时就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

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同年6月11日，毛主席又对建立大青山根据地作了具体指示。在对朱德等的第二次致电中指出：“惟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绥蒙区工作的担子可不轻！我能挑起这付担子吗？这时，我向陈正人同志提出：“我到延安时，有人怀疑我在天津被捕自首。在没弄清问题前，给我这样重要的工作不知是否合适。”陈正人同志觉得事关重要，就请示了中央。毛主席说：“一个人怀疑，一个人不承认。这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是真还是假，到大青山考验。告诉高克林同志，党是不会随便怀疑自己同志的。”就在这一年，西北局对我作了审查结论：1928年“与党失掉联络3个月，可不算脱离党的关系”；1930年在天津被捕“无问题”；1933年11月到1935年8月“这一段关系应当恢复”。我的思想包袱被解除了。那么，在天津《庸根》自首的“高文敏”是谁呢？后来经过反复调查，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弄清此人是天津水产供销公司的高×。

1942年8月，我离开民族学院时，带了部分学员到大青山抗日第一线。我记得有陈炳宇、墨志清、任希舜、何树声、王希宁等同志。抗日救国的共同志向使我和王希宁结合在一起。在延安招待所，我们各自

讲了结婚条件。她说：“你不能把我作为家庭妇女看待，要把我作为革命同志看待。”我说：“我不会做一个好丈夫，和我结婚准备受苦。但我一定做你的好同志和好战友。”出发时，我送给她一个拐棍，作为我们同赴大青山的唯一礼物。我骑马先行，从神府过黄河到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王希宁拄着这根小木棍和其他同志一道，经过二十多天长途跋涉也到了兴县。

“九一八”纪念日，这天恰好也是阴历八月十五，晋绥分局机关改善伙食。分局组织部长王达成同志风趣地对我说：“今天是中秋佳节，天赐良缘。你和王希宁今天就结婚吧！”于是，他又派人把王希宁从分局招待所接来。她穿一身破旧衣裳，裤子多处打着补丁，但很干净。这天，分局代书记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琪都在家。大家围了两桌吃了一顿蒸饺，我们就算结了婚。

兴县会议

1942年8月我到兴县以后，中央晋绥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绥蒙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分局代书记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琪、组织部长王达成，以及罗贵波等同志。绥蒙参加会的有我、张达志、苏谦益等。这次会的目的是分

析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确定绥蒙工作方针。张达志在会上作了汇报。

当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正处于十分紧张艰苦的时候，国际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德国希特勒的侵略军攻占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以后，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6月22日，德寇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同年12月7日，日本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残酷的“扫荡”。日本把绥蒙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和侵华的基地，在其“蒙疆”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频繁进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扫荡”。他们采取所谓“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的暴虐手段，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日寇一方面对大青山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一方面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日寇在大青山和蛮汉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一百多个据点，并在主要山口沟道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为了断绝群众和我军的接触，敌人大规模烧房并村，派兵驻守。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日寇1942年大扫荡后，除部分游击队、武工队外，我主力部队从大青山突围，转移到偏关一带。

在这一时期，坚持大青山抗战的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作出了英勇的牺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

工作上来检查，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晋西区党委《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中所说：“绥远区党委没有认真地研究与执行1940年4月中央对于绥远敌占区工作决定，对于绥远敌占区形势认识不够，在隐蔽政策的执行上不坚决、不明确与不彻底。领导作风上粗枝大叶，党政军干部间存在不团结现象。由于这些原因，不仅妨碍了更大成绩的获得，而且使某些工作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兴县会议重新确立了绥远斗争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会议重申“坚决执行隐蔽政策是绥远党的总方针”，确定“绥远党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蓄积准备力量，以待有利时机”。

为了加强对绥察区和雁门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绥远和雁门两区合并为塞北工委。取消绥远和雁门区党委名称，原雁门地区设塞北工委辖下的雁北地委。塞北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山西省的雁北地区、察哈尔省的部分地区，我是工委书记，胡全是副书记，委员有姚喆、张达志、白成铭、苏谦益、曹振之；成立塞北军分区，姚喆为司令员、郭鹏为副司令员，我是政委，张达志为副政委；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

北支队。塞北行政公署由杨植霖、苏谦益为正副主任。党政军机关暂驻偏关县。

渡河谈判

十月初，我骑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偏关县。这个县是山西省西北角的一个偏僻县，西临黄河，北靠长城，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我到偏关不久，晋绥分局派我到府谷县和高致凯谈判，高致凯是驻守府谷县城的国民党二十二军的一个团的团长。府谷和晋绥边区二分区一河之隔，影响我一、二分区和总后方的安全。为此，分局派我和高致凯协商搞好统一战线关系，共同抗日。

高致凯原是我党领导的许权中旅的教导营营长。渭华起义初，他投靠国民党。这次我去见他，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为了给谈判增加友好的气氛，分局决定王希宁同志随我一同渡河，以拜访老朋友的名义去进行谈判。我们对谈判成功充满着信心，同时也作好了发生意外的准备。

北风萧萧，黄河水寒。吃过早饭，我戴着棉帽、穿着旧棉衣，和王希宁一起渡过黄河。黄河西岸的便衣特务到处都有，把我俩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高致凯没有把我们带到团部，而是作为老朋友领到偏的家里。他避开随从人员，和我进行了友好的谈判。我说

的大意是：“大敌当前，抗日为重。枪口要对着日本兵，不要和共产党、八路军过不去”。高致凯身披武装带，不安地坐在太师椅里。可能出于爱国的心情，也可能出于对过去的忏悔。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依你说的办，我是够朋友的，请你们放心”。王希宁和高致凯的夫人谈天说地，畅叙往日友情。随后，高致凯叫他夫人亲手为我们擀面，吃了一顿家乡细长硷面。饭后，高致凯提醒我们说：“对间不早了”。我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起身和他们告辞。高致凯一直送我们到黄河边。等我们的渡船走远了，他才回去。我们渡河返保德县。第二天，返回到偏关县。

11月，我在偏关召开工委会议，传达贯彻兴县会议精神，落实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参加这次会的有苏谦益、张达志、曹振之和从致后突围出来的有关同志。姚喆这时仍在大青山地区打游击，没有参加会议。根据会议决议，我们向绥南发了指示信，要求他们依靠群众，团结抗日力量，坚决执行隐蔽政策，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把敌人逐步挤出去。11月20日，我们又就落实兴县会议精神向晋绥分局写了汇报信。

偏关会后，我先后到党、政、军的机关单位看望干部和战士，给他们讲形势，讲致策，鼓士气，增强胜利信心。随后，我和苏谦益到雁北地区看望干部和

战士。骑马到老营堡时，我的胡须已结了冰茬，冻成一团，连说话都感到困难。我用手把胡子上的冰茬搓溶，才把嘴“解放”了。到了雁北地委，见了雁北支队长刘华香和地委诸同志，向雁北的干部传达了兴县会议精神和塞北工委要求。在这里住了三四天，我随二营到前线视察后，又回到了偏关。

晋绥分局的指示信

兴县会议之后，我们对塞北工作的总方针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似乎还有问题。1942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及时向我们发来了指示信。

克林同志并转工委：

11月20日的信与工委给绥南的指示信，都看过了。关于塞北工作，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在斯城红军的胜利与轴心军在北非失败的情形下，日寇北进侵苏的危险是减少了(只是在目前)，对中国的压迫必然加重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是会更加残酷的。日寇的侵苏危险虽是减少了，但并未放弃北进的企图，尚未放松侵苏的准备。这是必须认识清楚的，即使在日寇不立即侵苏而仅仅备战的情形下，是不会允许我在

其侵苏前线的绥远站稳脚步的。日侵苏之前，必先驱逐我在大青山之势力，今年大举清剿绥中即是明证。因此，今后之活动地区的缩小，兵员的减少，财政粮食的更加困难等，必须充分估计到，一切工作布置应依据这种形势出发，才不至在困难到来时张惶失措，悲观失望。从给绥南的指示信与工作布置中可以看出，你们对日益增加的困难局面尚有认识不充分之处。三四年来的敌人向我内地进攻对给了我们绥远很好的发展机会，这种有利对机现在已过去了。今天绥远党的面前是摆着日益困难的局面，但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有，只有在今天保存了自己，蓄积了力量，才能在有利的形势下再求发展；但今天最重要的还是准备应付严重局面的到来，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与布置工作。

（二）今年二月晋西区党委关于绥远工作指示中已明确地指出“坚决执行隐蔽政策，是绥远党的总方针”，对于这一方针不应有丝毫的动摇。给绥南的指示信中采取“积极开展对敌伪全面的政策攻势”的方针是不合隐蔽政策的。这并不是说对敌伪不要进行宣传工作，而是宣传方式不应该是“突然地进行全面的进攻”，因为任何突出暴露力量，都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不合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动员秘密党员以群众

面目出现实行优抗，必然会使这些党员突出，同样是与上述政策不合。指示信中把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放到政治攻势下面，亦欠妥当。对于隐蔽政策，希工委能好好研究，务使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适合于隐蔽政策。根据地的作法，铺张的作风，应从思想上有所转变。

（三）关于目前工作，除了以前谈了的外，尚有下列补充意见：

1、为了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必须改善与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工作，更进一步依靠群众，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使他们自觉地爱护我们，帮助我们。这里减轻人民负担是很重要的。这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真地持真简政，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在绥远同样是重要的。组织上更加一元化，把任务相同的机关力求合并，取消一些空架子，如财政机关与供给机关之合并，党的机关与司令部合并，后方杂务人员特别是马匹的大量裁减，要痛痛快快主动地精减一下，以适应新的困难环境。绥南征粮一万二千石，是否可能？绥南能负担公粮的人口有多少？其中给敌伪负担的有多少？在全体人口中真正负担公粮的占百分之几？今年收我如何？公粮以外其它负担多少？总之，把你们的公粮政策和其根

据以及征收中的反映，把以上材料请与去年比较，详告我们。减轻人民负担，蓄积民力，仅仅是群众工作的消极方面，主要的是积极地深入地进行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提到党政军的重要工作日程上。领导把关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指导下级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尽可能地解决农村中的各种问题。应恢复红军时代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每到一宿营地，必须找群众深谈，逐渐提高其觉悟程度，每个干部应找群众领袖深谈。如果能在我们所活动地区从思想上教育成数千个甚至数万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八路军的同情者，这不仅是伟大的工作成绩，而且对于坚持綏远工作，克服困难有决定的意义。这必须使每个干部深刻的了解。但这一艰巨的教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经常给以积极指导，及时地检查工作，纠正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逐渐充实工作内容。如果千篇一律，以一套抗战八股生硬地给群众灌输，会起相度的扰民作用。綏远党的基础还很薄弱，应在深入群众工作中，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党的据点，进行深入的教育。过去，我们得罪了群众，应去道歉，损害了群众应给以赔偿。

2、开展伪军工作对于坚持綏远工作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过去伪军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望作

细密的总结，以教育干部。对防共第一师采取争取方针是对的，但指示中笼统地提出“伪防共第一师是民族敌人”的口号，似又与争取方针相矛盾。过去许多伪军关系是我们自己作坏了。

3、在今后綏远的环境下再不是像过去那样进行如何扩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下保持力量坚持武装斗争，以待有利时机的问题。1943年虽是接近胜利的一年，但是空前艰苦更加困难的一年。中央指示我们准备再减少一半部队，保存精干的骨干，以待有利时机。因此，主力减员后不再补充，两连合为一连，干部抽出来送后方学习，部队采取小连制。这就需要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更加依靠地方干部，把好的地方干部派回重要地区组织秘密不脱离生产的小武装，并给以武器。至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綏远的环境下（四周是敌占区的游击区）亦应改变其内容，不是像根据地那样，普遍地组织民兵建立游击小组，而是使各种武装都群众化、地方化，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同群众关系弄好，以得到群众的掩护。

4、干部教育是目前的重要工作。干部的不安心与缺乏信心，主要是由于对形势与工作方针没有透彻的了解，以及对过去领导上的不满。这就需要对目前形势，我们的任务方针，工作方法，按

级适当的传达，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工委对过去的工作应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使上下级干部互相信任。因此，不要急于派干部、部队出去，首先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其在思想政治上有了转变再派出去。派出去的部队以短小精干为宜，干部要强。对地方干部应有计划地培养，任何不信任地方干部的观点是不对的。

只有在困难环境下，保存了力量，才能在有利时机到来时，大量发展；只有今天的工作做好，才能准备更好的条件迎接胜利的环境。

（四）最后要求：

1、工委把如何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当成领导上的重要任务去深刻研究。

2、塞北地区应基本上执行晋西北行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但工委应根据塞北各地的具体情况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方案，一般地要求应较根据地不同些。

3、保存干部是今后领导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应有计划地送一些干部到延安与分局党校学习，以备新的环境下的需用。

4、应设法使姚、白早日回来，并把各种新的布置给绥西传达，使其及早有准备。

5、必须彻底肃清在供给制度上的不正规现象——向群众抓一把的自杀的政策。否则，所

谓节省民力积蓄力量，依靠群众坚持工作等等都是空话。

分局的信从国际形势的高度分析了隐蔽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对我们工作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指导。这是塞北抗战胜利的有力保证。

渡过艰难岁月

1942到1944年，是大青山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析的形势下，我们依照晋绥分局指示信精神，坚持隐蔽政策，积蓄革命力量，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隐蔽政策。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党、政、军机关合并，使机关人员减少了34%；军分区精减整编，使战斗人员、生产人员增加到了84%；把骑兵三团的两个连政编为步兵团，使主力军更加地方化和群众化。这样，不仅适应隐蔽斗争，而且减轻了财政困难。其次，改进组织形式。建立了地委以下的秘密党委，使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政权与武装相结合，专员兼县长随地方武装活动，县长、区长分别兼县、区游击队长。同时，改变斗争策略。主力军开展游击战争，地方武装政为使衣活动，区以下政权干部以群众面目出现，党员干部完全职业化（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社会化（在群众中认亲交友，建立社会关系）、

群众化（便衣化）。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对敌占区乡政权采取了更现实、更灵活的策略。1943年2月26日，塞北工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对敌占区乡政权工作指示》。指示讲道：“一、绥远和雁北大部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所以对敌占区乡政权进行工作是对敌斗争的重要一环，是我们向敌占区挤进去积极斗争，不是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是为了争取和团结敌占区群众对敌斗争，特别是利用乡政权对敌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因而抗日是主要的，对敌是主要的。二、这些特点决定，在敌占区经过农村统一战线工作，可以争取伪乡政权，争取团结群众进行公开合法斗争，采取两面派的斗争手段，以应付政人，反对政人的抢掠政策，使敌占区完全沦陷为殖民地的企图破产，以使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将采。因之对敌占区乡政权进行工作是敌占区工作的一部分，应便这些乡政权积极地变为革命的两面派。三、对敌占区乡政权进行工作，主要是进行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乡政人员、保甲团、农村知识分子、流氓等都是开始进行工作的主要对象。这里首要的不是如何摧毁敌占区乡政权的问题，而是如何接近、争取为主。当然摧毁敌伪政权是我们斗争的总目标，但不是完全采取简单的打击扣捕办法，而是争取其变为两面派，破坏和削弱敌人统治，并且通过统一战线为桥梁

进行工作。这就要具体研究确定工作对象，要选择接近我区、敌人统治较弱、离敌据点较远、我军政可去活动、有一定关系的区域进行工作，逐渐的自内向外发展，而后选择有社会关系、熟悉民情的工作人员经过政策教育及秘密工作教育，以一定的社会身份，利用这些条件，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四、在敌占区进行乡政权工作应作长期打算，不能以筹资为开辟工作的第一炮……要大胆地挤入敌占区工作，决心群众化，保护群众，依靠群众，保护关系，依靠关系，作长期打算。必须认识在整个抗战形势未转变前，敌占区的形势，不会基本上转变的，一切暴露突出，对埋伏积蓄力量都有害，要注意纠正”。我们工委结合实际制定的这一指示，为胜利渡过抗日艰难岁月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抗战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后方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七两黑豆，口都吃黑了。一匹马的料由一天四升减到二升。在政后工作的同志更困难。他们经常靠挖野菜充饥，许多同志脸色变青，浑身浮肿。长时间的缺油缺盐，许多同志都得了夜盲症。有时搞到点粮食，因无磨子只得用石头砸碎煮成面糊吃。在绥西的石虎子山上，姚喆同志带领部队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掘土三尺，搭起茅庵御寒。他和战士以野菜充饥，用冰雪止渴，在山上共同渡过了1943年的春节。

我们的部队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得以生存，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运粮食、送情报、养伤员。武川县的群众得知部队没有石磨，吃不上面粉，竟把三百多斤的两扇石磨偷送到四十多里外的部队驻地。蒙古族人民经常掩护我军人员，为我军保存粮食布匹。为了打破敌人造成的经济封锁，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我和偏关整风的干部一起到山坡开荒种地，种了很多莜麦，获得了大丰收。部队除种地外，还养猪、磨豆腐，使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日寇疯狂扫荡的艰难岁月里，大青山的几十支抗日游击队遭到一定的损失，我一、二团被迫转移偏关一带。但抗日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和继续。姚喆同志带领的三团和教导大队化整为零，在哈拉沁一带打游击。白成铭、奎壁（蒙族）等同志在绥西坚持斗争。贾长明同志在绥中坚持斗争。张云峰、侯作贵、石生荣等同志在绥南坚持斗争。刘启焕、张万金、张少亭、高增贵、石国柱等同志还以不同职业为掩护，坚持隐蔽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敌后工作的领导，塞北工委多次向敌后派去得力干部。1942年12月，我们派绥中专员程仲一带领导部分干部重返绥中地区恢复工作，坚持抗日斗争。后因形势恶化，他转入绥南进行抗日活动。1943年4月，我们派宋克瓚到凉城县任县长。他

整顿内部，恢复织组，率领游击队活动于棋盘山、蛮汉山，控制了敌人的情报网，镇压了国民党凉城县党部书记长，在蛮汉山地区重新扎下了根。1943年夏，我们又派任建斌等同志到绥中开展工作。他在归绥东北一带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同时，我们还派崔岩、梁劲秀、程仲群、田恩明等同志到绥南，派罗仲群等同志到绥东，这些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还学习晋西北“挤敌人”的斗争经验，不新向大青山地区派小部队、武工队、工作组。1943年4月，我三团派一个连和两个工作组到绥中地区活动。同年6月，我一团向和林、归绥、凉城三地交界地区派出和林武工队；我二团向归绥平川派出武工队。这些武工队、工作组在我地下工作者的策应下，一方面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中小地主和开明人士。活动在归绥城郊的武工队以茂密的高粱为掩护，昼藏夜出，开展抗日宣传，打击特务汉奸。敌人惧称他们是“高粱王”。被评为晋绥边区特等民兵英雄的尹茂官同志，在朔县面山一带串联扎根，发动群众，埋设地雷，开展游击战，使敌人慌慌不可终日。至今这里还流传着他机智勇敢打敌人的故事。到1943年秋，我武工队还同伪保安二团四大队、旗下营警卫队、榆林子警察队等都建立一定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给我们送情报、买军用物资。

在隐蔽斗争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林安正福武工队和绥中李佐玉武工队。这两个武工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为隐蔽斗争提供了创造性经验。安正福武工队的经验是剿匪安民，取得群众支持；巧用计谋，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方式多样，争取伪军和伪政权为我服务，使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队员由十人发展到三十多人。塞北工委在推广这一经验时指出，安正福武工队“是我小型武工队深入敌后，由初期难以立足，到今天能够‘生存’，而且可以坚持下去的一个比较带系统性的工作‘示范’，它的最大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由他的实践证明分局、工委对敌后工作方针的正确，它的成功是由于安正福同志党性和品质的坚强，他毫不动摇地执行工委给他的任务和隐蔽政策，基本上执行了争取群众、士绅、敌伪方针，而且获得了不少成就——能够生存的原因。”党中央、晋绥分局也高度评价了这个武工队。毛主席称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

在敌伪统治力量较强的绥中地区，李佐玉武工队也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塞北工委印发了李佐玉同志《关于在绥中开展敌后工作的报告》。在印发这个报告时，工委高度评价了李佐玉武工队的工作。指出：这个报告解决了不少同志过去怀疑或未解决的问题：一、如何下平川去工作；二、怎样争取伪政、靖乡青

年队以及特务；三、在敌后运动秘密游击队问题；四、不要军队、不要枪能否在敌后存在，能否开展工作问题；五、伪军伪政甚至特务是否都是坏的，能否争取的问题；六、在敌后活动的方式方法问题等……都得到了正确的答复。这个报告进一步“证明中央对于争取伪军伪政权方针的正确，以及在各种伪组织中仍然潜存着不少民族志士，只要我们能认真地细心地去找，去开展这一工作，一定能获得伟大成绩的”。

1943年冬，副团长黄厚同志率领第二团的两个连自偏关进至蛮汉山地区，并依托绥南常到绥中活动；第一团也从右玉西山进至蛮汉山地区活动；第三团也自萨拉齐山区向北活动。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由化整为零转为集中兵力，开始公开出击敌人。到年底，绥中地区南自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的地区内，我们都可以活动了。绥南的蛮汉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了。

偏关整风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作整风报告后，在全党开展了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1943年1月，晋绥分局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于1943年3月到1944年7月，以

分批轮换的方式，在山西省偏关县开展了整风运动。

参加整风的区以上干部共约二百人。在工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三个整风大队。塞北工委、塞北行署直属机关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苏谦益，后期是杨叶澎；雁北地区党政军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胡全，后期是李登瀛；军队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张达志，后期是曾锦云。11月，从大青山陆续调回的干部也分别编入整风队。

偏关整风开始时，我把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同志调到工委任秘书长，并由他负责整风的日常工作。

偏关整风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3年3月到7月。这一阶段是学习整风文件，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更好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工委负责同志和大家一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照《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和晋绥分局给塞北工委的指示信，检查工作中的失误，明确今后工作的正确方针，通过整风学习，广大干部和党员对绥蒙地区和雁北地区敌占区形势及坚决执行隐蔽政策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如何开展敌占区斗争有了根本性的思想转变；认识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批判了不关心群众利益在财政上“抓一把”，不充分发动群众而片面强调“武装打天下”等错误作风；认清了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性，批判了某些忽视大青山地区特点而生搬其他老根据地经验的做法。这段整风运动使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的收获很大。普遍受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过去工作中犯错误的根源，找到了克服的途径和方法，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从1943年8月到1944年2月。这一阶段把整风和审干结合起来，错误地进行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和“反特”斗争，给整风运动带来很大的恶果。1943年5月，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参加整风的人都要写历史自传和揭发材料，开展坦白运动。并要求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争取失足者。绥蒙地区干部担负着抗战的繁重任务。我担心抢救运动会把干部队伍搞乱。于是，我请示晋绥分局：“绥蒙干部整风是否以学习为主，弥补过去游击战争学习较少的缺陷，或者推迟抢救运动。”晋绥分局给我的答复是：“抢救运动是全局性的配合行动，是中失的统一部署。”我的意见受到否定。后来，我们才知道抢救运动完全是康生一手炮制的。康生以极左的而目干扰了整风。他说我党内特务如麻，把许多抗日的先进组织和我党的外围组织都划到敌人的阵线，竟把河南、陕西等地党组织也打成打着红旗反红

旗的“红旗党”。10月中旬，偏关也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把在延安用逼供信得到的不实之词，不时向偏关发电报。说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反革命”，搞得人人自卫。起初，我对这些电报半信半疑。一天，延安来一份电报说高鸿光同志原是河南“红旗党”的党员。我问高鸿光同志：“你是不是红旗党党员？”他说：“是！”就这样，高鸿光同志成了“特务”。1943年12月到1944年1月，整风队以班为单位，分别对每个同志进行审查。不少人被打成了“特务”、“叛徒”。许多人行动受到限制。有的同志从敌后回来，还没来得及汇报工作，就被打成“反革命”。过春节时，偏关一片沉闷景象，大家心情都十分忧悒。我作为工委主要负责人，对偏关整风出现的错误应负重要责任。究其原因，一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党中央政策没有真正理解；二是初到游击区，对干部底子不情；三是轻易放弃了自己主张不搞“抢救运动”的正确意见。后来，毛主席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提出了九条甄别方针。我们立即转入甄别阶段，迅速纠正整风中的失误。以后，我对被错误对待的同志多次表示过歉意。

1944年2月到7月，是偏关整风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消除“抢救运动”的不良后果，对坦白运动中提出来的问题一一甄别，作出结论。各整风队都成立了甄别小组，对整错的同志进行

平反。不少同志甄别后离开整风队，重新回到前线。7月，工委召开了民主大会，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号召大家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把主要精力转到对敌斗争方面来。偏关整风虽基本结束，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少部分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及时作出结论。1945年8月，一些同志尽管背着沉重的包袱走上了前线，但在对敌伪的英勇斗争中表明了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有胜利后的欢乐，也有胜利后的挫折。1944年中秋节刚过，晋绥军区“七月剧团”到偏关东川向群众慰问演出。戏刚开演，群众报告驻在五寨方向的日寇向偏关方向扫荡。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警卫连只有在山地与敌人周旋。家属、后勤人员向河曲县方向转移。我们部队从下午急行军一直到第二天拂晓，到偏关东南方向的黄树坪村北山上。正准备吃饭时，敌人打了信号弹，我们才发现司令部已撞入敌人的包围圈。我军在十分疲劳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敌人猛烈的袭击。张达志和白成铭同志带领一路突围，我和苏谦益同志也分别和一些机关的同志分头突围。我的警卫员关宝子把他的马让我骑，他被

敌人俘获，以后听说被杀害。太阳快落时，我到了河曲县的崔家地堰村。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又集结到了一块。经清点人数，军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军区政治部科长谢理云、军区司令部二科长姚典训、军区司令部四科张逢福等四十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这是我军一次重大损失。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苏联红军取得了德寇的决定性胜利。日寇也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持久的战争中，日寇再无力进行大的“扫荡”。他们为了进行垂死的挣扎，拼命集结日伪军对大青山进行野蛮的“清乡”。这时，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反“清乡”斗争，使日寇龟缩在归绥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抗战，到1944年8月，绥西、绥中、绥南三块游击根据地已恢复到1942年7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1945年6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总路线。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各解放区战场上，对日寇连续出击。绥蒙地区也进入了抗战的反攻前夜。在八路军进政归绥之前，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对绥蒙反攻态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作了一些组织准备。1945年2月，中失决定将塞北工委政组为

中共绥蒙区委员会，我任区党委书记，委员有姚喆、张达志、乌兰夫、武开章、杨植霖、苏谦益、白成铭、曹振之、康健民。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绥分局之下设三个区党委，在晋绥军区之下设三个二级军区，在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之下设吕梁、雁门两个行署和绥蒙政府。张宗逊同志任吕梁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学恭同志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我任雁门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吕正操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许光达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同志任绥蒙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姚喆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苏谦益为区党委副书记。原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就此取消。同时，中夫军委还决定设立南北两线两个指挥部。南线指挥部由张宗逊、罗贵波、解学恭负责，指挥三、四、七、八四个分区部队；北线指挥部由吕正操和我以及许光达、孙志远负责，指挥二、五、六、十一四个分区部队。晋绥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一分区部队机动使用。

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接着，朱总司令连续向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发布进军令。从8月11日开始，我晋绥军区南线和北线同时行动，攻打归绥。经过四天战斗，我军连续攻克了归绥外围的毕克齐、察素齐、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等地。8月18日，我军开始攻打归绥旧城。我二十七

团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勇敢地攻入旧城大什字街口，并占领了有利地形。九团和三团从城西攻入小什字街，先后占领了几幢大建筑物，对伪蒙军司令部所在地正丰学校和门树槐占据的银行大院形成包围夹攻态势。这时，国民党三十五军三十一师和挺进队会同由包头东退的日军，与归绥城内的伪蒙军里应外合，夹击我军，我军被迫撤出城外。归绥城被国民党傅作义部夺走。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但一场和平、民主、进步与内战、独裁、反动的斗争又开始了。

六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5·9——1948·10)

随贺龙征战

抗战胜利以后，我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号召。为此，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我党几经努力，蒋介石被迫签订《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并无和平诚意，以谈判为幌子，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争夺要地，对我形成进攻态势。1945年10月，国民党傅作义军已开始沿平绥路向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蒋介石命令傅军一直打到张家口。于是，我们开始组织绥远战役，准备反击。

雁门区党委设在左云县。9月底，我从偏关县到左云县。我调到雁门区党委不久，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来到了左云县。在左云县，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严肃认真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左云举行了誓师大会，开

始了绥远战役。

绥远战役是晋察冀、晋绥军区联合组织的，遵照中央军委决定，战役由聂荣臻和贺龙同志指挥。我投入总兵力为53,000人，敌军总兵力74,000人。战役从10月10日开始。晋察冀军区由东向西推进，晋绥军区从右玉、商都南北夹攻，与晋察冀军区合歼傅作义主力。战役开始进展很快。19日，晋察冀部队攻占了张皋镇、三水岭和隆盛庄。20日，晋绥部队夺取凉城、天城村等地。敌军遭我猛烈打击之后，向集宁、归绥退却。我晋察冀部队乘胜追击，21日，占领丰镇，22日，夺取大同以北孤山等地，截断了阎锡山和傅作义部队的联系，24日，收复了集宁。

我晋绥部队在贺龙率领下，独立二旅、骑兵旅向陶林进攻；三五八旅、独立一旅向卓资山挺进，对卓资山之敌形成包剿之势。这时，凭天险顽守卓资山的敌人有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六十七军新编二十六师。敌骑兵第五师位于六苏水，新编第三十二师位于福生庄、三道营，新编第三十一师位于旗下营。10月24日，我主力第三五八旅、独立一旅、独立三旅首先在六苏水击溃骑兵第五师。继于当日15时将敌第六十七军断编第二十六师包围，19时发起攻击。到翌日12时，我三五八旅将敌军全部歼灭，击毙和俘虏5,000余人。我独立第三旅亦击溃敌新编第三十二师两个团的增援，占领了福生庄。敌一〇一师被我独立一旅阻击

魁盛庄东北，向西逃窜。卓资山战斗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当地群众为纪念这次胜利，把卓资山县曾取名“龙胜县”。

卓资山战斗后，我军即包围了归绥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市）。为了孤立归绥之敌，贺龙同志又率领独立第一旅、晋绥骑兵旅及晋察冀骑兵第二团沿铁路线西去攻打包头。10月1日，夺取兵州亥，歼敌骑兵第四师一个团。2日，夺取毕克齐，击溃敌骑兵第六师。3日，夺取察素齐，歼敌骑兵第三纵队四个团。随后，又迅速夺取了陶思浩、萨拉齐、沙尔沁，包围了包头市。归绥、包头均属重镇，敌方都筑了防守工事。我虽多次攻城，未能得手。因塞外天寒、补给不便，我方不愿形成持久攻坚战，乃于12月14日主动撤回。

绥远战役给进犯解放区的傅作义部队以有力的打击，歼灭和收编国民党军共12,000余人，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等八座县城，再次解放了绥东、绥南6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这次战役中，我带领一百多名干部参加的工作团围绕部队开展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各级公开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新解放区工作，恢复和建立农村政权和农会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密切军民关系，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战役中，仅绥东动员担架1,600余副，马车8,600余辆，粮食180万斤，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绥远战役之后，绥蒙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就移驻集宁。1946年2月，我随部队也来到集宁。与此同时，晋绥分局通知调我又回绥蒙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并调张达志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兼副政委。绥蒙区其他主要负责同志没有变动。

停战命令之后

“双十协定”前后，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屡遭失败。此时，美、蒋又施用假和平伎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调处”内战。1946年1月，成立了有张群（后换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委员会”，还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并于1月5日达成停战“协议”，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命令”。同时，蒋介石在停战令生效的前夕，密令所部“迅速秘密抢占要点”。因此，在绥远地区围绕集宁又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战。

集宁是绥东的重镇，是控制京包铁路的军事必争之地。国民党阴谋袭夺集宁。1月10日、11日，傅作义部队主力猛攻卓资山，遭我部队伏击，大败而归。与此同时，大同之敌也出动配合，向丰镇、集宁方向进犯。13日，马占山及王英部占我孤山车站，14日又袭入丰镇，被我晋察冀陈正湘纵队第四旅夹击溃逃。

同时，傅作义部新编骑兵第四师及蒙古骑兵第二集团军的四、五、六师奔袭集宁。我集宁驻防部队奋起迎击，傅部曾一度攻入我防区。此时，我晋察冀陈正湘纵队第四旅击退丰镇之敌后，赶来增援。晋绥部队和晋察冀部队互相配合，连续反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进犯之敌溃逃。是役俘敌千余，缴获战马八百余匹。至18日10时，当执行部三方代表到达集宁时，集宁城仍飘扬着我人民解放军的旗帜。经三方代表商谈，国共两军以卓资山为界，国民党抢占集宁的企图乃被粉碎。

蒋介石一心要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首先向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此，内战全面爆发。7月20日，我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随后，中央军委又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1946年9月3日，傅作义部队再度对集宁发起进攻，一场争夺与反争夺的集宁战役又打响了。我军参战的有晋绥野战军、陈正湘第四纵队和绥蒙军区。绥蒙军区指挥部设在老虎山的一个石山洞，我和姚喆同志就在那里指挥。绥蒙军区的作战任务是：九团的五个连维护社会秩序，特务营为指挥部预备队，并和独立第三旅二十七团、第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守城，配合外围作战；第七团和独立骑兵团在凉城警戒归绥之敌，骑兵旅在城外围机动作战；路警和民兵守各铁路

沿线各车站及隆盛庄、玫瑰营。

9月4日，敌占领了我福生庄、刘光窑子等地。5日，敌分三路向我进犯。北路：孙兰峰指挥王英、鄂友三等部骑兵，由陶林地区向集宁西北进攻。中路：董其武指挥暂编第十一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各两团，在空军配合下向我卓资山猛攻。我守军独立第一旅与敌激战六个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撤退。南路：新编骑兵第四师从归绥出动，于毫切被我击退。7日，中路敌人从卓资山绕火石坝秘密东进。10日12时，敌三个师在空军配合下占我卧龙山。11日18时，我发起总攻。在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等地歼敌5,000余人，打乱了敌人阵脚，把敌压缩在卧龙山狭小地区，并截断了敌人西退后路。但因缺少统一配合，未能迅速歼灭被打乱之敌，使敌得以重新集结，于12日12时又攻入城内。我军退守通顺街、南财政街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5时，我晋察冀第一纵队增援，将敌赶出城外。9月13日11时，敌军炮兵、骑兵、步兵联合作战，由南营房向通顺街攻击，占领了西粉公司。在这危机之际，姚喆同志仍镇静指挥。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同志走出指挥部的石洞，进西城门察看战情。战士们看到司令部的同志还坚守在阵地，心里更踏实了。他们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加之敌人援军又陆续进入集宁地区，总指挥部命令我军黄

昏撤出战斗。当我绥蒙部队撤离老虎山后，我和姚喆同志才带领指挥部和部分地方干部，经苏集撤到丰镇。

在这次集宁战役中，我军以劣势的装备，歼敌12,400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集宁暂时失守。我们的部队在左云、朔县、怀仁等地秣马厉兵，准备新的战斗。

两年的土改斗争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五四指示》下达后，绥蒙区党委即在集宁县弓沟区、卓资县三义塔乡和凉城县新堂镇三地进行试点。我直接抓弓沟区这个点。我经常把区委书记任重捷叫回集宁汇报工作，布置任务。这个区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建民兵，成立农会等方面工作都比较先进。他们的经验多次被区党委转发推广，有的还在报纸刊登。至9月初，土地改革已在全区基本铺

开。

1946年底，绥蒙区党委给各县都派了工作团，要求各工作团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为了正确指导运动，分局还在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但群众运动开始一段出现偏差。有的地方把中农错划为地主或富农；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方农村干部多分多占。为了弄清这些问题，1947年1月8日到21日，我在左云、朔县的马家河、井坪、麻花头、酸刺村等地进行了考察，和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考察使我感到有必委向各级党组织提起注意。我回到左云后，在干部会上又强调了土改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纠正偏差的具体措施：一是落实富农和中农的政策，侵犯利益的要退还；二是人多地少地区不能“大山药吃了吃小山药”，乱划地主成份；三是干部多分多占的要顾全大局，勇于退赔；四是要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不许随便打人。为了引起干部对学习的重视，我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学习中央“五四”指示情况进行了摸底，分别对学过一遍、二遍以至四遍文件的进行了统计，对一部分还没好好学文件的干部提出了批评。

1947年2月，康生由陕北来到晋西，在临县的郝家坡蹲点搞土改。他对地主实行“挖浮财和底财”，乱打乱斗，把工商业者视为“化形地主”，剥夺经

济；把干部视为“右倾”、绊脚石，一脚踢开，有的甚至作为“候补敌人”。2月19日，康生在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使土改工作大范围内出现“左”的倾向。影响更大的是陈伯达参加的兴县后木栏干村的土改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写了一个《后木栏干调查报告》，分局铅印成册，发到各工作团。这份报告提出划阶级成份要“查三代”、“看政治态度”，使这个村剥削阶级成份由原来的4%扩大到40%。随后《晋绥日报》陆续发表了《坚决联合中农，防止错定成份，反对地主假中农》等社论，指出在分配土地中有保护富农的倾向，使斗争对象进一步扩大化。

当时，左倾错误已在土改中产生了严重后果，但晋绥分局又于1947年初夏在郝家坡召开土改经验交流会，推广康生的错误做法。正在静乐县领导土改的陈伯达也来介绍“经验”，宣扬“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做法。接着，晋绥分局以农会名义公开发表《告农民书》，号召“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当这一套引起干部和群众不满时，康生又训斥干部是右倾，要继续“搬石头”、“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打乱平分”等。6月13日，我到兴县北坡参加晋绥分局土政整党工作会。我见到康生对，他问我绥蒙地区土改情况。我谈了之后，他批评我是右倾，要我以郝家坡会议精神检查我们的工作。这次土政整党工作

会，没有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央土改的方针和政策，而是盲目反右倾，人人检查。我也对自己的“右倾”思想违心地进行了检查。正如毛主席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这次会议批评的那样：“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底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

分局会议之后，分局派了一位负责同志到绥蒙指导工作。在平鲁的卧场和朔县的神头，区党委先后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在会上，分局负责同志批评了绥蒙区党委的右倾问题。我也代表区党委进行了检查。会后，按照分局负责同志的提议：派我到右玉县南山搞土改；派苏谦益同志到山阴县搞土改；派杨植霖同志到平鲁县搞土改；派潘纪文同志到左云县搞土改；派李登瀛同志到朔县搞土改；派裴周玉同志到怀仁县搞土改。区党委日常工作由组织部长武开章同志主持。此后，左倾错误在一个短时期内，陆续出现。有的村子把百分之三四十户定成地富；有的地方对地富实行酷刑逼交“底财”；有的地方甚至把有历史问题或出身有问题的干部作为地主代理人交群众“处理”。据1948年3月3日朔县城关报告，因土改死亡66人，其中打死15人，自杀21人，扣押中病死30

人。1947年10月，朔县下木角村一些群众坚决要处死在工作中有缺点的村长王成贵。为此，工作组和群众意见发生严重分歧。工作组组长王建功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区党委。区党委支持了工作组的意见，并要求工作组给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当王建功同志回到下木角村后，群众已开会准备处决王成贵。工作组尽管在大会上反复解释，群众还是不答应。在“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日子里，王成贵作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1947年11月22日，在右玉县米庄窝召开的土改工作会上，我对“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我说：“走群众路线，不是我们就不管啦。群众不懂的我们要教育，使群众懂得，这不算包办。群众是很懂道理的，只要意见出的好，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时群众办的事情不一定对，你若看出来，可以提醒群众，让群众改。不能看出不管。”我虽然批评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左”的做法，但仍然没有跳出康生搞的一套“左”的框框。

左倾错误的蔓延给土改运动带上了恐怖的色彩。出现地、富以至中农发生逃亡现象。有的人到外地谋生，有的投向敌伪。据1947年平鲁县工作团报告，城关共605户，2,253人，其中逃亡户233户，504人。据情河县三区圪针沟逐户调查，全村17户，逃跑12户，其中富农1户，中农4户，贫农6户，雇农1

户。有的村庄在坏人煽动下，全村逃亡。

1947年12月底，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地主、富农户数“只占8%左右”的比例。参加会议的某负责同志回晋绥后，及时发了五项关于纠偏的指示。绥蒙区党委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土政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了郑重纠偏措施：一是纠正错划成份。把不是以剥削量为标准定的成份重新划定；把剥削量不足25%的划为上中农；把因鳏、寡、孤、病、老而出租或雇人的不能视为地富。二是退赔东西。错分中农的东西原则退还，粮食，要退还足够的口粮、籽种，其余可动员暂借；衣物，退还原物或给棉花、布。给地、富要留必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三是对逃亡户的政策。贫农、雇农、中农因生活困难逃跑的，仍以原成份对待，分给土地、房屋和物品；被地富欺骗胁从外逃的群众，回来后向农会声明不作坏事，既往不咎；因错划误斗的中农，一律改正，通知本人；对回来的逃亡地、富分一份土地。这些政策落实后，使土地改革运动又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948年6月20日，绥蒙召开土改和整党工作总结会。对土政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我曾作过检查。这次土改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我作为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应负一定责任的。但绥蒙区的土改工作，

尽管在运动中曾出现过曲折，成绩还是主要的。全绥蒙解放区的人口共有68万，其中30万人分到了土地。有80%的群众参加了土改，培养了八千多名积极分子，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为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在人民群众支持下，1947年军区地方武装作战257次，歼敌3,619人。解放了平鲁、清水河两县城，摧毁敌乡公所6处。

把战争引向蒋管区

1948年春，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召开了对敌斗争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去的方针，提出发动群众，组织统一战线，开展对政斗争，把工作推向蒋管区去。

为此，我们对傅作义的统治力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1、虽经绥远战役的打击，但主力未受致命打击；2、他守涿州、绥东抗战，有一定影响；3、干部没有蒋、阎腐化，上下未完全脱节，有一定统治能力；4、社会经济未全破产，耕地面积缩小仍有收成；5、采取一些讨好人民的措施，如承认分得地产权，不许倒算；6、笼络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利用一批地方人士；7、设立省、县参议会，召开乡、保代表会等；8、保长以上头目多是国民党员。

对傅作义占领区状况也进行了分析：1、实行保

甲统治，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十保一乡；每保有二名谍报员，一户犯罪，五户连坐。2、有特务监视。3、残酷镇压。4、强迫实行清室空野。5、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群众对我有戒心。同时，我们对傅作义统治不可克服的矛盾也进行了分析：他们依靠封建地主的统治，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鼓舞人心，反动谣言逐渐破产；地主富农逃迁，转移财产，上层头目暗中和我拉关系，反动统治大势已去。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武装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决定扩大武装队伍，消灭敌人，夺取新据点，迎接全国胜利。

1948年8月，为了配合辽沈战役，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由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进军绥远，并统一指挥晋绥第八纵队，消灭傅作义部。8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驻地召见了聂荣臻和第三兵团司令杨成武同志，当面报予进军绥远、配合东北我军在辽沈地区的决战的光荣任务，并着重指出：要思想上、时间上作好充分准备，以便在一年内经营好绥远。毛主席在说明了任务以后还指出，我们进军绥远是会遇到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困难：群众对我不够了解；粮食相当困难；供给不够遂心；战斗不很顺手。因此，要我们把困难多估计一些，估计严重一些，要准备饿肚子。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就可以在绥

远站住脚。三兵团根据毛主席指示，迅速进行战前准备。在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思想动员的同时，向绥蒙军区派了先遣队，编制了各种行军组织。为了保障物资供应，除执行“一切取给在前线”的方针外，另准备驮骡400匹、担架1,000副，随军远征。各级后勤部门还带有大量布匹、白洋，以备急需。

三兵团先遣队到达绥蒙后，我们就全力以赴，作进军准备。8月14日，在朔县米昔马庄，我们区党委的同志和先遣队同志共同研究部署了战前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行政区划、统治特点，我方的武装、群众、后勤等工作，还介绍了民族风俗、气候变化等情况。同时，具体研究了战役计划，制订了征借粮食、建立乡村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各项政策。下午，我们又分军事、政治、后勤三组分别讨论落实。

8月24日，三兵团从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向雁北地区开进，沿途所经之处，群众送水让房，群情振奋。30日，三兵团和晋绥八纵队会师。在欢速会上，我和杨成武同志分别讲了话。9月12日下午，前委召开有绥蒙区党委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杨成武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察绥战役的指示，分析形势，研究了战役计划，确定了“就地取给”的方针，制订了征借粮食、建立乡村政权及武装等政策，由绥蒙区党、政、军干部共同组织了随军工作团，进行就地取

给，支援后勤工作。

九月上旬，为了掩护第三兵团行动，我第二兵团首先在平汉路南段及平北山区积极活动。这时，我第三兵团主要部署是：兵团主力第一、二、六纵队攻占归绥；25日夜，第八纵队、第一纵队第二旅和骑兵旅包围了集宁城。第八纵队由司令员姚喆同志指挥。部队出发前，我给随军工作团讲了话。8月19日，我在八纵队旅级干部一次会议上，又进行战前动员。我讲了目前形势和任务，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要求建立学习、汇报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把自己提高到正规野战军的水平。

9月21日，我随部队从朔县启程。当天经过井坪，夜宿平鲁马家洼。第二天到达高家堡，第三天到达右玉。尔后，部队经凉城西马头山，于26日拂晓到达集宁城西骆驼脖子、玻璃图、三岔口一线。指挥部设在玻璃图西山上。当日18时30分，我军打响了外围战斗。经过一夜激战，27日11时，集宁被解放。同时，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等据点也被攻克。傅作义发觉我军西进之后，仓惶抽调北平、张家口地区步骑十个师向西驰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八纵队于30日又撤出集宁。为此，我军委电令，停攻归绥，东返打援。第三兵团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集宁的西个骑兵旅。10月7日部队开始包围敌人，但敌已经东逃。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区党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军队进入绥远后党政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政策的指示》。粮食政策规定：向地主征借总产量的35%，富农为30%，一般农户20%，佃农、雇农及赤贫户免征；经营农业的蒙民比汉人少征借10%，经营牧业的蒙民免征。干部政策规定：除已有重点分配使用外，其余干部采用工作团方式随军，临时分配，就地发动群众，征借粮食，组织担架，组织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安定后方秩序。乡村旧政权的保甲人员一般暂时留用。在我监督下进行支前工作。武装政策要求在我能控制的地区迅速建立武装，平绥路以南四县在原游击队基础上建立四个支队。这些政策都保证了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担任战勤的万余民工驾着马车、赶着驴子、抬着担架，冒着枪林弹雨，运送伤员、物资。随军工作团不分晴雨昼夜，征借粮草，结算帐目，保证部队的顺利行动；丰凉、丰东、平清、托和的四支游击队剿匪歼敌，越战越强，成为大部队的重要帮手。

丰镇解放后，我于10月3日即派赵芳同志去丰镇。我交给他三项当务之急是：肃清土匪特务，恢复城市治安，恢复和建立党组织。10月6日，我和李井泉同志乘丰到达丰镇。第二天，我们听取丰镇的工作汇报，布置了这里的支前工作，随后又研究定了丰镇和集宁市委的成员。10月11日，第三兵团在丰镇召

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留第八纵队第十四旅与北岳军区部队在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工作。集中一、二、六纵队和第八纵队主力向绥西、绥北进军，攻取包头、武川等地。丰镇市召开了市区长会议，对支前工作、剿匪工作又进行落实。我到会讲了有关政策问题。10月21日，我又到和林县检查支前工作。第二天晚11时又赶到托克托县布置了工作，宣布了县工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成员名单。

傅作义为了确保张家口及平张沿线安全，又将援绥东主力调回。于是，我主力又乘机西进。10月16日至23日，第八纵队解放陶林、乌兰花和武川；第一纵队解放台格尔、毕克齐；第六纵队解放托克托、萨拉齐、察素齐和陶思浩；第二纵队解放沙尔沁。22日晚，包头敌人西逃。23日，我解放包头。31日又解放安北县、公庙镇和长乐店，另一部解放固阳。至此，五加河以东除归绥外全部为我解放。

包头解放后，我和李井泉同志立即进城。在建立市领导机构以后，我们于31日研究了该市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入城政策和支前工作。新市政府及对布告安民。这次解放包头，我们入城政策宣传贯彻成效显著。全城鸡犬不惊，各行各业于二三天内即恢复如常。

11月5日，我部队已集结归绥城周围，准备11日扫清外围，16日15时总攻。我绥蒙区党委已研究了归

绥市干部名单。由于东北大军入关，协同华北我军解放全华北的日子已经迫近。为了不过早地惊动敌人，以便将其抑留在平、津、张地区，毛主席指示我们在11月15日撤围归绥，转至集宁、丰镇地区待机。察绥战役就此结束。

这次进军蒋管区的战斗任务，主要是华北二兵团和三兵团在绥察地区两个月配合东北作战钳制敌人，共歼敌二万余人，解放了绥远和察北广大地区。完成了使傅作义部队不能出关的战略目标。敌人惶惶不安，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接近最后胜利。

七 绥远的和平解放

(1948·10——1950·1)

大势所趋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再也无法阻止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49年2月15日写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10月初至今年1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丧失约154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144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也完全陷于孤立的绝境。

绥远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1949年初，绥远有人口202万，耕地面积1,938万亩。我绥远的人民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个骑兵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独立团，约3万多人。已解放了集宁、凉城、兴和、陶

林、丰镇等10个县、4个旗。解放区的人口达80万，耕地761万亩。国民党绥远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绥远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基地。根据1949年底原绥远指挥所统计，绥远国民党军队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第九兵团，第一一一军，第七、第二五八、第三一〇师，第二十二军的第二二八师，整编骑兵第十二、第十三旅，骑兵第五、第十一旅，保安骑兵第四、第六旅，保安第二旅，独立第三旅，还有从榆林窜到包头的第八十三师的一个团又一个营，总共兵力4万多人。除了第七师是原来傅作义系统的正规部队外，其余大部分是土匪游杂部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在这些部队里，有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同志会、革新社和各种反动封建组织，派系复杂，矛盾重重。

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是绥远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将领。他从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统帅，均是傅作义先生一手提拔。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卖国求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有不满。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统政策的影响下，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董其武这样的高级将领，不可能不考虑绥远的前途和出路。他确实这样考虑过几种命运：一种是同共产党对抗到底，人民涂炭，损兵折将，以失败

告终；一种是逃到宁夏或青海，最后粮尽弹绝，众叛亲离，断送一切；一种是走人民道路，得到共产党的谅解，前途光明。1月22日，傅作义对外正式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条文。董其武对傅先生选择弃暗投明的道路表示同情，并对“绥远该如何办”却颇为着急。第二天上午，他乘专机从绥远飞往北平，向傅先生请示。傅先生对他畅谈了北平和平解放经过和绥远今后的打算，使他逐渐明确和坚定了走人民道路的决心。

和平解放绥远，是绥远各放人民、国民党士兵及一部分中上层人士的共同愿望。当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归绥时，国民党上层人士张钦、于存灏以及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人发起组织了“绥远和平促进会”，积极赞助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通电中说：“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通电还说：“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

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通电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应再犹豫、徘徊，而应遵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通电最后说：“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通电发到绥远以后，绥远各界中上层人士都纷纷举行了座谈会，大部分人认定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和平解放绥远势在必行。

“绥远方式”的提出

在北平和平谈判过程中，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反映了傅作义谈判代表提出的一个建议：“平津唐绥一齐解决”。中央军委第二天复电回答：“平津唐绥均应解决，但唐绥人民

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平津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唐绥问题。”2月12日，中央军委关于绥远作战方针给李井泉等复电指出：“邓（宝珊）、董（其武）在绥四五万人，用改编方式彻底改造，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之后，目前应让董照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通车，商业允许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暂在归绥、卓资山之间划一界，互不侵犯”。中央军委这一指示，是“绥远方式”最初的轮廓性方案。

3月5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极告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三种方式”。他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

民解放军”。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关注。傅作义先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问毛主席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说：“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路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以看看你的旧部队。时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绥远方式”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的一项重要战略创造。它不仅为绥远国民党的官兵指明了一条光明道路，也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县委书记会议

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争取全绥远的和平解放，绥蒙区党委于5月5日至5月15日在丰镇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

在这次会上，我和苏谦益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大家讨论了1949年下半年的工作任务。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领会了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绥远解放区的形势。认识

到绥远解放区是华北的一个地区，不同于江南的一般地区，这里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反奸清算和土改斗争。去秋进军以来，重新恢复了这一块曾经为敌一度侵占过的解放区，并在部分地区初步进行过发动群众的工作。但是，绥远全境尚未解放，土匪尚未肃清，群众发动的很不充分，加之我们在工作作风上多年来存在的简单粗糙和经验主义的毛病还未克服，干部不足，区村干部多是新提拔的农民，能力与经验均差。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为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绥蒙区党委在1949年底以前的总任务只能是继续发动与组织现有解放区的七十余万群众，巩固人民既得的胜利，同时，积极地开展董战区工作，争取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早日解放绥远全境。

会议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下半年的十一项具体任务。一是发动群众剿匪除奸，做好治安工作。对匪特公开出没扰乱的山区，必须组织包括军事与地方工作的统一指挥部及武工队，以从政治上争取瓦解为主，配合军事分期清除匪患。同时，初步做好地方群众工作。对没有公开的匪特活动的城市与平川的乡村，则应深入清除暗藏的匪特，收缴隐匿的枪支武器，控制还乡人员及其他妨害生产妨害社会治安的坏分子，强迫其劳动生产，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危害社会的封建会道门。严禁贩卖吸食毒品及偷盗聚赌行为。

城市中建立戒烟所，习艺所，以改造二流子。在边沿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坚决消灭一切敢于侵扰的反动武装，保卫生产，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是把恢复与发展生产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首先必须奖励劳动生产，克服农民生产中的各种思想顾虑，解决贫雇农的生产困难，推动地主富农参加生产，改造与强制地主二流子参加劳动。必须充分发挥绥远在农业上的有利条件（土地广、土质肥沃），大量生产粮食，补助平津等大城市及其他产棉区的粮食供应。提倡种植葫麻，发展畜牧，增加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的输出。开发可能兴修的水利资源，政府发放的水利贷款，必须很好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抢耕抢种，防旱备荒，必须坚持下去。夏秋两季组织力量开伏荒翻秋地，打下明年大生产的基础。办好一个农业试验场，逐步推广选种和改良农作法。工业方面、首先准备恢复集宁发电厂，解决钢磨、榨油、酿酒等动力问题。发展毛织、皮革等公私企业，扶持手工业。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稳定金融，整理税收，开辟财源。号召干部学习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知识，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才和我们一道合作来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三是加强建军工作。巩固与提高现有武装部队，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克服享乐腐化思想，加强政策纪律学习，提高战术技术，学习群众工作，完成战斗队与工作队的任务。地方上首先应在党改人员和群众中有

系统地进行建军教育，明确对人民军队的认识与应有的态度。其次除充实与整训各县保安队和游击队外，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巩固与发展强大的民兵组织上来。每个区在大部分行政村建立起民兵组织，民兵的质量和数量都具备的条件下，应组织起一个质量更高、战斗力更强的基干连。四是彻底废除保甲制、建立民主政权。五是大量培训干部。各县在秋收前要训完二千左右的村干部、省委党校和政府办的干部学权要训练一千到一千五百个相当区级的干部。加强在职干部的学习，必须建全县以上学委会的组织领导、提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使领导学习和自己学习成为领导上与所有干部的经常任务之一。六是开展宣传工作，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办好绥蒙日报，使之成为指导工作、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及与反革命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办好学权，加强中学政治教育。改造旧教员，办好师范班，提高小学教员的水平。绥蒙一级继续坚持办好补习学权，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七是加强对工人工作的领导，开展青年妇女工作。秋收前成立省农会筹委会、妇女筹委会等群众组织。大量训练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干部，作为开展群众组织工作的骨干。大量开办工人农民和青年夜校，提高工人和青年的觉悟，当地的负责干部必须尽可能地到夜校讲课。八是开展蒙回民族工作，广泛宣传民族平等自治教策，团结和发动蒙回各民族人民反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反对大汉

族主义。九是开展建党建团的工作。最后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与组织教育工作，警惕与防止党员干部在全国革命迅速胜利和绥远即将全部解放的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一切偏向。教育党员干部认真执行毛主席号召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后，绥蒙区党委从党政机关抽出一百六十多名干部，组织成五个工作组。在苏谦益同志带领下，分赴集宁、丰镇、兴和、凉城等县。一方面组织群众抗旱抢种，一方面宣传贯彻县委书记会议精神。

5月30日，绥蒙区党委和区党委宣传部分别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和《关于举办工人业余轮训班的指示》，分别对学习的方法、内容、要求进行了具体部署。6月16日，绥远党校正式开学。各类业余学校、轮训班已相继诞生。这次兴起的学习运动不仅为和平解放绥远进行了思想准备，而且为党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干部。

艰难的和谈

1949年元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我绥蒙军区“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进攻”，发出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信号。元月31日，我前线部队停止进攻。2月1日，中央军委又命令我部队由旗下营后撤六十里，并要

停止对董其武部队瓦解工作。停止报张广播对董部的攻击，改称董部为友军。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李井泉同志在卓资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在干部和部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我们也经过了一个由不甚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采取“绥远方式”，许多干部和战士思想转不过弯。长期以来，绥远人民受到国民党军队涂炭；在同反动军队对垒厮杀中，我们的许多战士流血牺牲。他们复仇的思想十分强烈。特别是我部队主动后撤，把浴血奋战夺来的阵地又让给了对方。一些长期埋伏在停、董部队内部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在即将组织哗变的对候受到了制止，他们有些想不通。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实现，我们必须排除各种思想阻力。为此，我们区党委向全党、全军和全区各放人民进行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绥远方式”逐步得以实施。

为了保证“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我们一方面把上半年扩军任务从一万五千人减少到六千人，停止武装进攻。并使我们工作重点转移到剿匪减租，发展生产上。这样，减少了对董部压力，造成和谈气氛。另一方面，我们仍不放松战斗准备，揭露顺面派“借水养鱼”、伺机反扑的反动阴谋，打消他们东山再起的幻想，促使他们走光明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代表就提出和平解放绥远的要求。傅作义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但一直保持着接触。由于蒋介石频繁的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绥远方式”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毛主席找傅先生谈了七次话，其中一次谈了一天一夜。周副主席亲自处理傅先生提出的具体问题。耐心而诚意的开导，使傅先生同意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方式。在傅先生的周旋下，董其武先生已下决心走光明的道路。3月23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传达党中央决定，由贺龙主持绥远问题的谈判。双方确定谈判代表后，进行了谈判。这次会不久，华北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原晋绥区划归华北局领导，所以后来主持双方谈判的贺龙改为薄一波、聂荣臻。双方谈判地点在北平接管联合办事处。我方代表是李井泉（晋绥军区政委）、张友渔（中共华北局秘书长）和潘纪文（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傅方代表是王克俊（前华北“剿总”秘书长）、周北峰（原绥远厅长）和阎又文（前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在谈判开始时，傅方拿不出停战分界方案，我方求之过急，故谈判进展甚微。针对我们这种思想，周副主席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要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又要积极工作。否则，

就不成其‘绥远方式’了。”

4月26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的情况下，双方又开始了谈判。在谈判中，傅方提出每月要发23万元大洋的军费，还要在天津开设贸易机构。为划分临时分界线，伪金元券兑换问题，双方争执几天也未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知悉谈判又陷入僵局时，即令我方代表作出让步，尽快与傅方达成协议。5月28日，双方派代表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

《绥远和平协议》的要点是：划定双方临时分界线，停止敌对活动，剿除土匪，保护群众利益；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其武将军所属军政公用运输予以特殊照顾；双方互谈贸易机构，互相进行自由贸易；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方区域得以自由流通；我方在归绥设立联络处，董方得保证安全；解放区书报在董方自由流通；董方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令其离绥。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主席说：“你们离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

不好办了。”

和平协议终于签字。在实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执行《协议》

为了适应绥远和平解放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从1949年4月1日起，把绥蒙区划归华北局管辖。6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原绥蒙区党委改为绥远省委，原绥蒙人民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蒙军区和野战军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我任省委书记、苏谦益任副书记，杨植霖任省政府主席、奎璧任副主席，姚喆任军区司令员，我任军区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省委和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移驻集宁。三套组织积极工作，积极准备绥远的和平解放。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华北局依据协议精神，责成绥远省委组成驻归绥联络处。省委经过研究，组成驻归绥联络处。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二十余人。潘纪文同志任联络处长，鲁志浩同志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郎觉民任组长；银行工作组，张光任组长。联络处的任务是：协

助董先生贯彻执行“协议”，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进步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阎锡山的特务，尽快实现和平解放。

6月28日，潘纪文同志由北平回到丰镇，介绍了北平的谈判情况。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执行和传达《绥远和平协议》的问题。会议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方针。7月12日，省委向所属县团级党委下达了《关于绥远协议的传达提纲》，口头传达到区、营级以上党员干部。《提纲》着重强调了绥远全党同志对《协议》应有的正确认识和态度。《提纲》指出：协议的签定是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绝对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已处于土崩瓦解，而其中某些人选择走光明道路的结果。在执行协议中，必须很好的运用团结与斗争的策略，正确的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提纲》同时指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有严肃负责的态度，任何贪图小利，不顾大局的行为，都是对我党已经庄严签字的诺言的轻率态度，都可能招致我党在政治上受到损失。和曾经是敌人，而今成为“朋友”的人打交道，就委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既委有革命的原则性，又要有为实现这种原则性而必要的灵活性。既要防止可能产生的政我不分、内外不分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左倾关门主义。《提纲》还指出：今晋的领导工

作着眼点必须从绥远全省的范围出发，一切方针政策和人力财力的准备均要有接管全省的打算，必须加强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剿匪、除奸工作，加强群众自卫武装力量，加强对董占区的宣传工作。

联络处进驻归绥

按原计划，我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率部分人员于6月30日先期到达归绥，与绥远当局进行联络商谈。但对方表面与我敷衍，实际采取拖延政策，暗中放布“有武力就能存在”的反动论调，积极抓兵征粮，扩充实力，做抗拒和逃跑的准备。并且把主要的兵力集结在后套地区，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信使往来，接受其金钱和指示。驻归绥的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以“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对联络处人员生命没有保证”为由，百般刁难，拒绝我联络处驻归绥。7月1日，何树声同志在傅先生的派员陪同下到归绥同董其武商谈。刘万春又提出，“绥东来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他保管，“并不许随便上街”。最后，董其武向刘万春答应了“可要求其工作人员少在归绥城活动”的条件，联络处遂于7月11日进驻归绥。当晚，刘万春又指示部下，砸毁了因刊载我新华社消息的《奋斗日报》社。

联络处驻在新城西落凤街六号。银行工作组设在

省银行，铁路工作组设在市火车站。当我们的干部出现在街头时，人们奔走相告，传信报喜。国民党反动派恐惶万状，顿生杀机。7月24日，我铁路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从旧城回火车站时，遭到一一一军某部六连二十余名士兵的突然袭击，打死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事件发生后，归绥城顿处紧张的气氛之中。董先生焦虑不安，亲赴联络处慰问，表示要严追杀人凶手。消息传到我绥东解放区后，广大干部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抬尸游行，撤回联络处，消灭反动派。归绥和绥东顿时出现剑拔弩张之势，和平的天空又出现了阴云。

党中央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毛主席一方面给傅作义做工作，另一方面给我们做工作。毛主席对博先生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其武先生多加注意。”同时，毛主席又召见我和杨植霖、潘纪文同志谈话。8月初的一天清早，薄一波同志用车把我们送到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接见了我们，室内到处都摆着摊开的书籍。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又询问了各自的情况。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答到：“陕西华县人。”毛主席风趣地说：“唐朝大将郭子仪也是华县人。他为人宽宏大度。他因粮草失火差点被错杀，但他并不计较，以后为朝廷屡立战功。”接着，毛主席就把话题转到绥远问题上。他说：“我们和傅作义打了多年仗。尽管我们处于胜利态势。但采

取‘绥远方式’对人民有利。只要我们宽大为怀，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绥远方式’就一定能实现。”毛主席还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管理绥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大事。傅作义当主席，你当副的，因为他们人多。”毛主席笑着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不是为当官。我过去连当乡长都没想过。”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当副职也能作主，绥远还是你要负责的。”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局势好转；给王士鑫烈士召开追悼会，但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街；‘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到中午吃饭时，毛主席留我们三人同桌吃了饭。饭很简单，四菜一汤，米饭是红的。出门后，我问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怎么不给毛主席吃小站白米？”叶子龙说：“毛主席喜欢吃这种米。”

我们回绥远后，广泛宣传毛主席的指示，用党中央的思想统一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我驻归绥联络处邀请国民党绥远政府厅局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一步表明中央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一贯立场，解除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很快稳定了形势。此后，联络处的同志经常到工广、学校召开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董其武先生也主动到联络处商谈工作。这样，绥远和平解放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在省扩干会的报告

8月28日至9月2日，绥远省委在集宁召开县团干部参加的扩干会议，进一步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及华北局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议期间，多数同志对中央的政策表示不甚理解，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一些人觉得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十年仇恨难消”，不服气。一些人对在军政委员会和政府合并中，傅、董为正职，我们为副职想不通。一些人对合并后政权的性质也提出了疑问。为此，省委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经过四天讨论，基本上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在9月2日的大会上，我作的总结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大家的思想情绪、会议收获及省委的态度和立场。我说的大意如下：

会议进行了五天，收获很大。经过讨论，到会同志全体一致赞同中央关于绥远问题的方针与任务。这表现了党的一政性；表现了大家认识已提高一步；表现了同志们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信任。这种忠诚与信任，就是我们的力量。

这个会议是成功的。首先是打通了思想。会上发言很普遍，讨论也热烈，……在讨论中，表现出同志们对绥远问题的认识是提高了，是深刻了，这对将来开展工作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

同志对中央的方针已完全领会贯通，还需我们继续学习。

在分析一些同志产生“想不通”、“不理解”的根源时，我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说明：

一、同志们对绥远傅、董军的具体情况了解认识不够；省委教育不够；同志们注意研究不够。以后要用阶级分析去调查研究这些问题。自己要下决心，省委应多帮助。

二、有些同志，对敌我力量估计得不够恰当。表现在对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影响估计不够；对绥远广大群众要求和平解放的热忱认识不足；对我们有正确的敌策办法去消化敌人，改造敌人的信心不够。把敌人看成一个不变的整体也是不对的，敌内上下之间，官兵矛盾很大，出身、成份、政治态度各有不同。比如改军中80%是农民群众，大部职员是为生活所迫。现在全国胜利，敌人内部在政治上已失去信心，感到无出路。看不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就无法分化争取教育改造他们。这不合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中没有困难，不需要经过反复而艰巨的斗争。相反的，反革命分子仍会以多种多样的阴谋诡计来抗拒改造，破坏和平，其中某些人至死不悟。反动到底的分子也是会有的。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研究自己，研究敌人，知己知彼。大家要明白：毛主席思想传播到哪里，哪里群众的思

想就会起变化。

三、感到没办法。这主要是因缺乏新的工作方法
与经验。我们每个同志要学习运用毛主席思想，不断
向新的事物学习，不断地求进步。我们要学会研究、
分析具体情况，随时取得新经验。旧的经验是不能完
全适合新情况的。我们还要向别的地区学习。如学习
别处改造吴化文、曾泽生部队的经验等。总之，大家
要研究，创造新办法。只要了解情况，大家出主意，
就会有办法。

四、部份同志在发言中，还摆不脱个人打算，思
想上有杂念。如有的同志怕把工作做坏了，将来与个
人不利。

统一战线问题是会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从政权
合并后的领导权及政权性质的讨论引起的。为了帮助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讲了几个基本理论观点：
①今天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
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战线性质的。②今天的政权不
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也不同于抗日时期。在
广度、深度上都不同。③统一战线是各自为利的。有
共同纲领，也有各阶级自己的利益，从反动派中分裂
出来的个别人，可以参加统一战线，但他们必须遵守
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当然，他们也有其自己利益。④
不要把反革命者都当作绝对不变的。其中个别成员，
是可以分化，即是说可变的。反革命在一定时期、一

定条件下，是可以与革命求得合作的。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帝可以与苏为盟；我们在抗日时，曾与蒋介石打过一个时期交道。共产党是现实主义者，与革命有利的就做。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朋。在阶级斗争中也应体会此理。绝对一清二白，不与任何人合作，会造成自己孤立。那怕是暂时的，只要对革命有利，即可与之合作，即可利用。合作，并不等于与之混同。我们与反革命派中分裂出来的个别人打交道并不等于承认反革命阶级不是革命对象。绥远政权合并后，基本上是统一战线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与傅讲统一战线，是为了消灭封建。这已有了共同前提，即军队解放军化，地区解放区化……。

最后，我还就宣传、放民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使大家的思想认识更加清楚了。这次会基本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上，为实现“绥远方式”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九·一 九” 起 义

“绥远方式”确定以后，在我党积极影响和促进下。董其武先生进行一系列进步改革，为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创办革新学院，教育干部转变思想，改组省级机构，改革

人事制度，刷洗顽固势力；改进报纸宣传，制造和平舆论等。

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渡过长江，攻占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反动派仍不死心，在广州又拼凑了所谓的“内阁”，妄图负隅顽抗。他们多次指派特务，千方百计破坏绥远和平解放。华北特务头子张庆恩网罗从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逃绥远的特务和顽固分子，组织所谓“绥远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建立中心据点，大搞破坏活动。他们在包头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狂呼乱喊：“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7月份，张庆恩、潘秀仁在包头召集十一兵团司令、一一一军军长和师长鄂友三等人秘密开会，策划武装冲突，煽动部队西逃。董其武立即命令独立第七师由绥调至包头以西准备阻击。蒋介石还派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到绥远封官许愿，金钱收买，分裂部队，以达到破坏绥远起义的目的。随后，蒋介石又送去1,900两黄金，并晋升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委任原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晋升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妄图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架空董其武。董其武先生识破了阴谋诡计，不仅没有交出兵权，还派可靠人员加强对第九兵团的控制。

为了加速起义进程，党中央派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亲临绥远，协助董先生组织起义。8月24日，潘纪文同志陪同傅先生一行乘专列从北平出发。火车到丰镇时，我们驻丰镇的绥远省委负责同志到车站迎进傅先生一行，彼此问候致意。我们又派鲁志浩同志陪送傅先生一行到归绥。车至集宁，我绥远军区姚喆等领导同志登车会见傅先生。到归绥后，傅先生检阅了部队。发放了慰问金，分别传见了军政干部和各界代表。9月4日，董其武随傅先生到包头市。在这里，他又分别向军、师、旅级干部讲形势，指方向，阐明共产党“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又乘飞机来到包头，企图把傅先生接到广州。傅先生义正词严予以拒绝，使蒋介石破坏和平解放的阴谋最后破产。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通电举行起义。电报是打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电文中说：“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放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

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是对的。”电文历数了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累累罪行。最后表示：“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9月20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绥远起义官兵发了复电。复电写道：“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与此同时，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也发了复电。勉励起义官兵“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九·一九”起义使绥远国民党四万多官兵走向光明，也使国民党占领区120万人民获得了新生。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军民都举行了庆祝大会，欢庆

解放。

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已经成熟。从6月15日到9月20日，我党召集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北平连续举行了八次新政协筹备会。6月30日，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家的前途，各阶级在国家里的地位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说明。

9月21日，即“九·一九”起义的第三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各党派、地区、民族、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的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我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下午7时会议开始，毛主席首先致开幕词。他说：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多么郑重的宣言。只有为革命事业经过艰苦奋斗的人更能理解它的真正分量和含义。

9月22日，林伯渠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作了《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9月23日到9月29日，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代表踊跃发表意见。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等。同时，还分别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建议案，决定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9月30日，大会选举出180个政协委员，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来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大会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最后，来德副主席致闭幕词，毛主席宣布大会闭幕。

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任命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30万群众兴高采烈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我也荣幸地上到天安门城楼，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礼活动。毛主席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了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时，五十四门礼炮齐鸣28响，万众跳跃欢呼。我的心情汹涌澎湃，深深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欢乐。

下午6时，我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我满满地铲了几铤土，默默告慰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先烈：我们的事业胜利了。你们将永垂不朽！

进入归绥的工作方案

10月上旬，华北局在薄一波、聂荣臻同志主持下，召开了有我和傅作义先生参加的会议，商讨绥远工作的方案。经过商谈，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一）两个省府立即进行合并，董其武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合并后，财政、粮食、铁道等，以及各项政策、法令等，均在共同纲领指导之下统一起来；

（二）所有董部军队按两个军（骑兵在外）进行编制。在3到6个月内，我方只派较高级干部进去帮助

工作，不派中下级干部。另成立干部轮训队，由我方负责训练；（三）所有董部之供给，完全由我方负责；（四）初步提议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任傅作义，副主任高克林、董其武、孙兰峰，委员傅方十人，我方七人。

根据华北局原则方案，我主持绥远省委研究制订了《进入归绥的工作方针和步骤》、《绥远军政委员会组织纲要》（草案）、《绥远草政委员会当前工作要项及步骤》、《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等工作方案。

在《进入归绥的工作方针和步骤》方案中，对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组织机构、工作步骤，以及关于部队干部训练问题、政府合并问题、组织活动形式和干部使用方针、经费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方案中提到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协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行约法八章，整训草队，改造政权，发动群众，剿匪除奸，安定社会秩序、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团结汉蒙回各族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方案中提到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步骤：一是双方回绥各作一周到十天的准备工作，然后我们参加军政会的干部及随带人员、部队即赴归绥。去后即张贴布告，宣布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和干部联欢会。二是军队整训，要在一个月內师级以上干部训练完毕。第二个月训练团级干部（如情况许可，

也调营级干部)。第三个月训练连排干部。三个月争取干部训练完毕,争取完成整编的准备工作。三是政府机关要用一个月训练省级干部及县级主要干部,并实行省政府合并,召开归绥市各界代表会。第二个月训练县科长以上干部,并派出工作团到各县。第三个月以县为单位训练公教人员、学生、乡级干部等。召开县代表会,准备下乡发动群众,剿匪除奸,减租生产。四是群众工作,去后即着手与当地群众团体接触座谈。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群众会议,进行组织整理工作,准备各界代表会。

方案对部队干部训练问题进行了具体安排:1、现职干部首先集中精力训练。师级以上干部以半月至一月为期。团营级分批轮训,也是集中训练。连排级在各师或军训练。2、训练课程。短训班以师团在职干部轮训为主,主要讲授共同纲领、约法八章、各种政策、时事问题,用政策说明、解释其疑虑问题。3、教材。基本教材要做到人手一册,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必须购备大批书报。4、教员。除由绥远抽调外,最好由华北抽调,或聘请一批政治教官、名教授。5、另外招收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举办经常干部训练学校。培养军、政、群运工作干部,一般以三个月为期。6、时京、津返绥干部,尽量收容训练。时间三至六个月,课程与上同。7、受训人员生活供给。一般知识分子按普通干部待

遇，营、团干部按中灶待遇；师级以上按小灶待遇。办公费按人数多少确定。

关于政府合并问题，方案中指出：以两周时间做思想准备、了解情况等工作，然后即着手合并，并公布以下数事：1、明令废除旧的一切法令、制度，宣布各级人民政府成立，执行新政策、法令。2、以原董方省政府为基础，尽量录用原工作人员，对个别坏分子加以处理，把我们省政府工作人员插入，组成新的省政府。3、一切法令、公事、财经手续，自新政府成立日起，从头作起。4、公教人员薪给，按现行办法，暂维现状，准备调整。5、其他铁路、级行、贸易干部，随军政会同时入城，按中央统一办法开始工作。

方案中提出组织形式和干部使用方针：1、中共绥远省委入城后即公开。各县、市党组织在一至三个月内或需更长时间，以工作委员会名义出现，待条件成熟后即公开。群众团体组织起来后，即挂牌子。2、干部使用原则，群工干部以我派去干部为核心，尽量吸收当地工、农、青、妇积极分子参加。政府、学校以争取政造、团结使用旧中、下级职员为主，我们只派少数骨干进去起领导作用。因为我们目前干部太少，骨干也不多。但对继续作恶的坏分子要坚决清法。

10月14日，我将省委制订的四个工作方案连夜送

华北局。17日，薄一波同志原则批准了我们的工作方案。

毛主席再次接见

绥远军政委员会怎样开展工作？我们和绥远旧政权人员怎样合作？怎样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这些极为复杂和特殊的问题，都摆在我们省委面前。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再次接见了我和其他几位同志。

1949年10月24日晚10时半，我和姚喆、裴周玉同志乘车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首先接见了我们。半小时后，薄一波、聂荣臻同志也陆续来到。周总理带领我们五人，步行几十米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亲切地询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到京？绥远方面有什么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

主席接着问：“你们干部去绥远有信心吗？”

我说：“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大家信心很足。但也有些反映，如认为没有打仗那样痛快……”

毛主席笑着说：“很多地方有这种反映。开政协会议时，高级干部也有人说，把这些人请来开会，不可理解。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是实现合作，第二步很重要。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们已发了电报。这个电报是党对绥远

的基本方针，共产党更要执行。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意义何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一切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了人民求解放；和平解决，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让同志们讨论透。要很好合作，这是统一战线。傅先生也要做工作。政府是统一战线的，要很好合作。军区也要统一。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傅作义可以提名副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傅扩大人员，我也扩大。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教育、吃饭，正规军和地方军都包括在内。”

正在这时，周总理领着傅作义走进来。主席指着我们三人高兴地对傅说：“今天找绥远三位同志来谈，过去都同你打过仗。你见过他们吗？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见过了。”

毛主席接着说：“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已定下来了。工作原则、步骤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四个原则：1、坚持团结。2、肃清特务。3、纪律要整顿。4、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1、彻底成为解放区与解放军，同国民党政权完全脱离关系。2、恢复交通。3、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工作。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政人，现在成了朋友。合作后也要估计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

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办到算好，否则两年。没有战争，不能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先做思想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一年达到目的，不能性急。蒋介石21年未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快吗？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战士看到干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可搞业余生产，每天劳动一两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凡愿意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与他们合作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有激进的可以鼓励，有缓慢的可以等待。共产党一来运动，也有人讲话。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还有差异。不能用粗暴方法，不能下大雨，要象小雨一样才能消化。按他们接受的程度、时间、条件、具体情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政工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派去的同志进行鼓育，要他们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干部去后不会发生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怎样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不了解情况，老办法也不行。去的人要有充分准备，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时方对他怎样。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

们看，使他们今后同我们合作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同志去了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是有道理的。过去才走了第一步，到现在要实现第二步。总之，要作好事，不作坏事，他们就会欢迎。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如怀疑共产党是否讲理，是否看得起人，是否挤得人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挤得不能站。我们要做好工作证明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有前途。他们才会感觉我们好，才佩服我们。和平改造是可能的，现在有条件，应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是有信心的。但能不能用和平方法都顺利解决，还有疑问，现在已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手软了，对绥远不好用兵了。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认为与共产党员合作有好处，使人感到前途光明，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阶段，要说话兑现，不能

骗人。共产党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新政协各方面都有人，没有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全国都是统一战线。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要永远与非党合作，就不易做坏事，发生官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如此合作。双方要把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那能怕麻烦，怕捣乱，怕吃了亏，切不能叶公好龙。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因为有了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还是一半一半好，是搞五湖四海，共产党人加进步人士好。别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别人。中国已归我们，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并管理好，不能踢皮球送给别人。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绥远也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人都要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只看到80万人民（即绥东解放区人口），就会弄错，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发生问题。只管共产党就会出乱子，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鯀治水。要统筹全局，要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能够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但会有不愉快的事。抗战初期，蒋介石

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政治方法溶共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炼越强。最后把蒋介石天下夺过来，交人民所有。我们要学会搞政治斗争，也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战略问题。绥远要搞政府，用协商办法，互相打通思想，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不要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愿，还是口愿，若勉强就缓办。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缓办。否则，最易出乱子。这回工作若作好了，对双方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来作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好工作，要耐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做工作。”

毛主席的耐心开导和教诲，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绥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增强了建设新绥远的信心和力量。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先把傅先生送出二门，又把我们送到办公室外。

省委移驻归绥

10月25日，华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措施，并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华北局会议结束后，我们即回到丰镇。经过紧张的准备，省委于28日至11月4日，召开了505名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政协和华北局会

议精神，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绥远问题的重要指示。最后，会议通过了《绥远省委第七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首先号召全党和绥远人民热烈欢迎董其武将军等所领导的起义，协助傅作义将军顺利完成对起义军政人员的改造工作，使起义军队真正人民解放军化，起义地区真正人民解放区化。要忠诚地实现毛主席、朱总司令对起义者的指示：“团结一政，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决议》最后号召全省党员必须“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信念”，忠诚地团结起义的军政人员并帮助其学习和思想改造，以达到共同为人民服务，共同建设新绥远的目的。

11月10日，绥远省委发出《关于进入归绥工作与生活中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对进入归绥后工作中应遵守的事项都做了具体规定。11月18日，省委又作出《关于加强领导的决议》，对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亦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绥远指示的贯彻和落实，也为双方合作共事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

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壁、孙兰峰为副主席，苏谦益，张如岗、李维中等22人为委员。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月17日，归绥市广大市民、部队、机关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打扫卫生，张贴彩色标语，使这个塞外名城焕发了生机。这个市当时仅有七八万人口，分新旧二城。旧城原名归化，新城原名绥远，合称归绥。新城有一座一公里见方的完整砖砌城廓，系清初所建。旧城南有著名的王昭君墓。这座共居蒙、汉、回等多民族的古城，长期受到侵略者的践踏，反动统治者的搜刮，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盼解放，盼新生，望眼欲穿。

下午1时47分，我和苏谦益、姚喆、杨植霖、奎壁带领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一千多名干部抵达归绥。董其武、孙兰峰带领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的干部和群众八千余人到火车站迎接。我们检阅了欢迎部队。随后，在车站广场举行了欢迎大会。董其武先生致欢迎词后，我和姚喆、杨植霖、奎壁先后讲了话。我讲道：“今天这个日子，在我们绥远历史上是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绥远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是我们绥远

人民大团结的日子，是人民力量大汇合的日子，也是我们和平解放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日子。我们的和平解放事业，我们的团结统一事业，建设新绥远的事业，从今天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我们要更具体地、脚踏实地地实现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欢迎会充满团结热烈的气氛，洋溢着节日的欢乐，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会结束后，我们在董其武等的陪同下到联谊社共进午餐。

进归绥后，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会，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建立友谊。10月18日，我和杨植霖、姚喆等同志拜会了董其武、孙兰峰、张钦、荣祥等先生和地方知名人士，赞扬他们在绥远起义中所作的贡献。12月19日，我们又邀请七十多位知名人士在联谊社举行茶话会。我首先讲道：“我们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在座的人都要做些事情。如何才能在工作中做到融洽，就必须我们要团结一致。团结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我们有共同的致治信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有毛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关切，有全绥远人民的督促；有傅主席的亲自主持；有薄政委和聂司令员的指导；并有董主席的带领和诸位长者的热心协助。同时，绥远的全体共产党员一定能够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

广大的非共产党员的革命同志，他们也有高度的革命热情，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建设新绥远。”同时，我又讲道：“但团结中的困难还是有的。在互相了解上，难免会有些顾虑。今天，双方的干部已成为一家人了。但是一年前还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生活着，所以在生活习惯、作风上还不完全一样。因此，互相之间也不免会感到某些别扭。在绥东来的同志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也有广大的非党员，其中有许多同志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出身。另有许多同志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也不免带来些游击战争的习惯和作风。加之，我们对绥远情况的生疏，有的同志虽然是绥远人，但因较长期地住在外边，对本地同样感到不熟悉。这些困难也可能产生一些小误会。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引起同志们注意。在和平解放绥远的过程中，蒋、阎反动派曾进行过阴谋破坏。今天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更需要提高警惕。他们会利用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误会，进行造谣、破坏，挑拨我们的团结。”最后，我讲道：“以上这些困难是胜利道路上的困难。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首先是在座的同志，互相帮助，互相谅解，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我相信一定能达到建设新绥远的目的。”我讲话之后，姚喆、杨植霖、苏谦益也相继讲话，阐述共产党对团结的真诚，不管对东、西干部，都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且相信一定能

团结好。接着董其武、荣祥、陈炳谦、孙兰峰等相继发言。陈炳谦以“天地”两字说明团结的重要。他说：

“天”就是绥远得天独厚，毛主席对绥远的处处关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天”。“地”就是绥远地下宝藏很多，过去因没有团结未能发掘。我们既然得天独厚，就要好好团结，发挥力量采掘地下宝藏。最后，他兴奋地说：“光明之路（新民主主义之路）已定，方向（毛主席指方向）已明，又有导师（共产党），大家迈步前进，就可达到幸福康庄之境！”

茶话会临结束前，董其武先生兴奋地带领大家高呼：

“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伟大政策！”“绥远人民团结万岁！”“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茶话会历时三小时，充满团结、愉快和热烈的气氛。

12月20日，我们又专门组织各部门负责同志走访了原国民党“剿总”驻绥远指挥部、绥远保安司令部、三十二兵站等机关。董其武、孙兰峰等先生也对我方人员进行了回访和看望。12月23日下午2时，我和杨植霖、姚喆走访市电灯、面粉、烟草三公司及电讯局、被服厂、印刷厂、毛织厂等企业，对工人阶级表示慰问和祝贺。12月26日下午6时，绥远省委在凤林阁招待一百二十余名工人代表。我向他们讲道：“现在世道变了！中国五千年来都是皇帝、王爷、官僚、

地主、军阀当权。今天一变为劳动人民当权了！”我的话音一落，兴奋的工人群众不停高呼口号。当省委的同志给代表斟酒时，代表们含着热泪，激动地说：“像我们今天这样被人抬举，是从来梦想不到的。”

建立新政权

12月21日，傅作义先生从北京来到归绥。24日，我和傅先生协商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事项。傅先生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大半。干部问题要靠你。共产党决定的我们执行。”我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以你为首。这是毛主席封的。你要事先决策，发号施令。我们保证执行。”

12月27日下午1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在归绥市麻花板举行成立大会。军政委员主席、副主席与全体委员，省人民政府、军区各首长，中共绥远省委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工作委员会与省总工会、省青联、省妇联等团体负责同志，以及蒙回民族代表共127人出席了会议。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列席了大会。

傅作义致开幕词后，我讲了话。我首先宣布了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任命的绥远军政委员会组成名单。同时，我宣布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管辖区域：前绥东解放区十县，原属西北解

放区之伊克昭盟解放区全部，以及董其武主席所领导的绥西地区，共计两个盟、18个旗、22个县、3个市。在讲话中，我还谈到：“绥远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主要有蒙、汉、回等民族。因之，在本年10月24日，毛主席对傅作义、我和姚喆等指示绥远工作时，即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的精神，指示伊、乌两盟应实行区域自治，其他东四旗、土默特旗，暂维现状。指示其他蒙、汉、回各民族杂居的地方以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各盟旗和县统一受绥远省人民政权管辖。这是绥远省行政上的统一团结，也是全省境内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真正统一和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我讲了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后，又强调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我们的职责是当尽力之所及，来指导帮助，使绥远省人民政府推行共同纲领。军政委员会，应即加以研究讨论的是帮助绥远人民政府，解决当前几个紧急问题：一、帮助人民政府，制定1950年恢复和发展大生产的方案，以及具体研究部队大生产方案。二、要帮助省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制定1950年的财政收支预算案。三、帮助省人民政府即着手接收伊克昭盟解放区及其应有的准备工作，并具体研究实现伊乌两盟区域自治的办法。四、着手集结整训部队，剿匪除奸，安定社会秩序，以利生产建设运动之顺利实现。”

我讲话之后，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姚喆、苏谦益、杨植霖、奎璧、张钦、荣祥、刘万春也相继讲了话。姚喆向大会庄严表示：人民的部队坚决拥护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坚决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议，为彻底实现毛主席的指示与方针而努力。苏谦益代表绥远省委号召全绥远共产党员，并带动绥远广大群众为正确实现军政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与指示而努力。邓宝珊主席以来宾身份向绥远人民致衷心的祝贺。最后，在“团结一政，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政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中闭幕。

12月31日，绥远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省政府把归绥和包头定为省辖市，并把归绥定为省会。为了使绥远真正实现“解放区化”。省政府制定了八项施政方针：（一）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二）建立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二五减租，并准备土地改革；（四）组织并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并使之成为各项建设有力的可靠支柱；（五）经济建设遵照共同纲领中“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六）整理财政税收，增加收入，精简节约，以达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目的；（七）实行新民主主义

的科学文化教育；（八）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防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巩固蒙、汉、回各族团结。实行民族自治，发展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同时，省政府还废除了保甲制，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

1950年的元旦，是绥远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归绥市四万多部队和群众隆重庆祝绥远军政委员会、绥远省政府和绥远军区的成立。我和傅作义等都致了贺词。大会号召绥远各族军民执行毛主席和总司令的指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会后，军区文工团、各机关、学校、工厂的秧歌队定上街头，载歌载舞。人们跳呀，唱呀，笑呀，共同庆祝绥远的新生。

八 改造起义部队

(1950·1—1952·5)

安置绥西人员

绥远和平解放以后，绥西的军政人员的思想一时还难于平静。他们为自己的出路担忧，为自己的职业思虑。为了尽快安定人心，绥远省委于元月12日发出《工作要点》，对绥西军政人员的安置已有原则性意见。2月21日，绥远省委又制定了《关于处理绥西军政人员的暂行办法》。主要办法如下：

第一、处理原则：

甲、凡参加“九·一九”起义之在职军政人员及北平解放后被遣散回绥持有证件之人员，原则上一律政留政造，按其进步程度分别使用和处理。

乙、凡参加“九·一九”起义后被裁革或升降之人员（非特务分子），地方上须经民政厅详为审核提交省府委员会或行政会议，部队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重新审查决定去留或升降。

丙、除上述所指人员外，现有要求参加工作之人

员，应向省府申请登记，由省府审查考核，根据需要录取。待训练后，依照任免办法分别酌情录用。

第二、对起义军政等人员之处理办法：

甲、凡属第一条甲项之军政人员确非特务分子，愿为人民服务者，则按其才能分别给以工作或学习改造之机会。

乙、凡本人要求回原籍从事生产或另谋职业，自愿退职者，可准予退职回原籍生产，并视其生活情况，酌发路费一部或全部。

丙、凡年迈体弱不能工作或学习之人员，由各单位提出和友方协商裁减之；如其生活困难者，可酌发一部分补助费。

丁、凡属特务分子，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在起义中或起义后确有显著成绩（如发动起义、积极捕缉或告发特务有具体事实者等），为人民立了功并愿继续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者，可给以工作或学习改造之机会。

2、过去未向人民立功，但今天真正和特务断绝关系并交出特务证件、愿痛改前非、为人民立功赎罪者，应集中到公安厅训练队，在学习和生产中经过相当改造后，分别给以工作出路。

3、凡不愿改造，今天仍与人民为敌，还在或明或暗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有据者，则坚决镇压之。

第三、对起义人员之任免调动。

由省政府或军区司令部依据上级政策或上级司令部之规定，以及党内应履行之手续，结合实际情况拟出具体规定，按规定程序和办法执行之。

按照以上处理原则，我们顺利地安置和处理了三千二百多名起义干部和其他军政人员，为实现部队解放军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合并整编

绥远和平解放后，我以主要精力搞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

为了实现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首先必须合并两方不同性质的军事指挥机关，组成解放军绥远军区。为此，经过双方协商成立了机关合并领导小组。姚喆同志任组长。我方成员有刘华香、裴周玉、张升初、李据智。董方参加的成员有袁庆荣（原军长）、孟昭弟（保安副司令）、李子俊（政工处长）等。

机关合并的原则是：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物资财产移交不催不逼，交多少接多少；部队借用群众的住房都不移交。军事机关合并的方案是：原国民党华北“剿总”驻绥远指挥所和保安司令部同解放军绥远军区司令部合并；原国民党绥远指挥所政工处同解放军绥远军区供给部和卫生

部合并。这次合并，既考虑到了起义部队的特点，又照顾了本人工作能力；既体现了“团结改造”的政策，又照顾了本人的愿望。所以双方都比较满意。尤其是起义干部，原来怕遣送回家，现在看到仍分配了工作，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许多起义干部家属向我们写信或打电话，表示感谢。

经中央军委批准，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两个军、一个骑兵师。为了保证整编顺利进行，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月17日举办了军队高级干部研究班。参加研究班学习的有起义的各军、师、旅正副长官和将去这些部队的政委、主任等六十余人。研究班主要学习毛主席对绥远问题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各种制度。学习的方式是：领导报告，大家讨论；畅所欲言，消除隔阂。我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作了辅导讲话。针对起义干部的思想实际，我还着重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实现解放军化有没有条件；二是有没有困难。对这两个问题，我都进行了肯定的回答。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我讲了四个有利条件：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政治保证；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有利形势；士兵、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这是实现解放军化的可靠基础；大部分高级干部有进步的愿望和决心，这也是实现解放军化的重要条件。在谈到实现解放军化的困难时，我也讲了四个不利因素。这样，既

提高了大家实现解放军化的勇气和决心，又使大家对遇到的困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讨论中，大家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人民解放军是否国家化的军队？”“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等问题。在第二次辅导讲话中，我对这些问题又进行了回答。在学习中，还出现了些不正常的现象。如有的人怕算老帐，过不了关；有的人怕剥夺军权，身败名裂；有的白天讨论不发言，晚上枕枪睡觉。为了解除这些人的思想顾虑，我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还做了几项规定。一是讨论中说错了话不追究，不记录。二是不勉强检查思想。三是允许会客、打电话、上街、看望亲友等。这样，大家学习情绪更加高涨，学习态度更加积极，和我们的感情更加融洽。许多学员积极要求政治干部到部队中开展工作，迫切要求部队实现解放军化。

2月1日高级干部研究班结束后，接着召开了高干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建立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及生产准备等问题，通过了起义部队整编的具体实施方案。从2月7日开始，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番号，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原一一一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要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樊折桂任参谋长。李骥程任副参谋长。下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

三十七军是新颁布的番号，以独立第七师为基础扩建而成。原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晋升为军长，帅荣任政治委员，卫景林、冯梓任副军长，张逊之任政治部主任，化博知任参谋长。下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一个直属暂编骑兵旅。原骑兵整编第十二旅（鄂友三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治委员，强自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宗文任副主任。下辖一个独立骑兵旅，四个团。

学习运动

组织改编起义部队，不等于原有反动性和封建性的消失。只有通过换思想的学习运动，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军化。

原国民党绥远部队编制庞杂，思想混乱。其中除一部分正规师外，多是地方保安团队，地主武装。其成员大部分是抓来的老百姓，另有不少特务、惯匪、恶霸、地主、散兵及遣散俘虏。其组织派系复杂，有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同善社、青红帮、龙华圣教会、宗门圣教会、天主政、基督教、秘密教、同志会、革新社、情报组、军统等，又有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后流散逃亡的反革命特务。这些政治派系中，有内外之分，“大圈套小圈”，明争暗斗，各自培植私人势力。起义之后，少数反动军官还扬言“只换帽

徽，不变心”，“要象水萝卜，不象胡萝卜”（外红内不红），“保存实力，借水养鱼”，“只能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有的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甚至还开办“训练班”，培养私人干将。一些士兵长期受反动封建思想毒害，赌博吸毒。有的强行要挟群众给部队赠送慰劳品，说“老子是解放军还不慰劳”。有的开枪打死群众的牛、马、羊，说“这是草原的野物”。有的奸污妇女，说“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驻安北三团的一个排长居然抢劫合作社的财产，群众说他们兵匪不分。

人民解放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义部队的思想差距只能通过更多的思想教育来弥补。为此，军政委员会在全省组织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统一制定计划，组织领导学习运动。各部队、机关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同时，草政委员会成立了军政干部学习团，分期轮训军政干部（包括不在职的），先后三期共轮训干部4,881人。此外，还责成起义部队自行举办轮训队，共轮训连排干部两千余人。省政府在行政干部学校也轮训了县旗干部一千余人。所有军政机关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有计划地学习时事、理论和政策。

在学习运动中，军政委员会重点抓军政干部学习团。军政委员会设立了无职干部招待所，登记收容了

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回绥的无职干部3,604人。除安排生产和留用的一千人以外，均分别送学习团和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军政干部学习团第一期于元月18日报到，26日编队，28日思想动员，2月1日开学典礼，2月2日开始上课。教材有《社会发展简史》、《政协文件》、《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少校以下干部上大灶，中校以上干部上中灶，将级干部上小灶。在这期开学典礼上，我和傅作义、董其武先生都讲了话。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学员们对共产党有了一定了解，思想压力减少了，学习自觉性提高了，开始有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有的高干还敢于在街上抬东西，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够正视自己，批判过去。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进步比较慢。在这少数人中，有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存在着惧怕和幻想，或者认为有靠山，学不学回去照样当长官，或者对共产党心怀成见，一时难于改变。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于2月20日给学员们又讲了话。我分析了学习状况，肯定了成绩。同时，对阻碍学习的“整体进步，反对个人突出”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我党的土政政策、干部政策等不理解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对国民党能否反攻、第三次世界大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今后的工作部署进行了说明，学员们普遍认为有很大的启发。

第一期学员有现职干部1,270余人，无职干部

1,760余人。由于工作急需干部，学习两个月后就分配了1,500余人。经过学习的无职干部，愿回原籍的发给路费；其余除留绥工作外，分别按职安插到山西、河北、山东等地。

1950年6月，我参加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整风的伟大号召。在省市干部整风学习动员会上，我作了《更好地团结全党、团结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动员报告，我肯定了七个月来学习的成绩：“在部队解放军化方面，完成了初步的整编工作。连队以上初步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正在有步骤地开始士兵群众工作。及时地平息了反革命和特务所制造的少数部队的叛乱。学习团、政干校已整训或正在整训着七八千个起义的军政干部。各机关建立起在职干部的正规学习制度，均在思想改造上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我又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在我们领导机关中，在某些工作部门和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十分有害于人民事业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错误；在团结改造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某些迁就主义；以及极少数干部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省委号召全体干部在整风学习中克服自身缺点和错误，更好带领绥远人民不断前进。随后，全省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学习运动。

团结改造

1950年元月，华北军区给绥远军区选派一千九百多名政给工作干部，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这些同志到绥远后，经过短期培训，于2月下旬陆续分到部队工作。

政工干部深入部队之后，广泛接触群众，采用个别交谈，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等形式，疏通关系，联络感情，逐步开展工作。首先，在军、师、旅成立政治工作机构，建立政给工作制度，行使政治工作职权。第二步组建团政治处。派到各营、连的政治干部由团统一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建立了营和连的政治工作制度。为了实现集体领导制度，在军、师、旅、团建立了军政委员会，在营、连设立了军政领导小组。军政委员会成员由同级军政首长、参谋长、政给部主任、后勤部（处）长，与下级军改一把手组成。主任分别由同级的军、师、旅、团长担任，政委担任副主任。营、连军改领导小组的组长分别由营、连长担任，副组长分别由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担任。军政委员会和军政领导小组分别为同级部队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贯彻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命令和指示。讨论决定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干部升级及工作计划等。集体领导的新制度代替

了旧制度，旧部队一长制的制度宣告废除。同时，团以上普遍建立了生产委员会，部分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营以下建立了学习小组、生产经济小组、纪律检查小组等组织，并建立了汇报、点名、请假、查哨等制度。各级政工干部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制度的作用，诚心诚意为士兵服务，得到广大士兵的拥护和支持。如组织伙食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提高士兵伙食；废除打骂制度，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传统教育，改善官兵关系；军、师两级分别成立了戒烟所，收容吸毒品的官兵，进行学习教育，根治不良嗜好。

1950年，中央军委号召“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在生产建设中，我们把生产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取得了生产和思想双丰收。据当时统计，部队种地23万亩，其中新开荒地21万亩；完成黄河培堤工程土方115万立方，完成渠道工程土方47.8万立方，名列全华北之首。

在团结改造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曾遇到少数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的干扰和破坏。为此，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政治干部开会宣传党的政策，他们无理取闹，冲散会议；政治干部上政治课和文化课时，他们命令紧急集合；他们对政治干部进行侮辱、漫骂和恫吓，甚至组织叛乱。骑兵四师二团的反革命分子公然指着团改委彭志超同志叫喊：“当心葬进了你的小命！”彭志超同志大义凛然，严正答道：

“共产党员怕死就不到这里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广大士兵的利益，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反革命分子用乱枪打死了他，并组织了叛乱。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先后策动武装叛变53起，参加官兵3,270人，杀害政工干部多人。仅三十六军四五两个月就逃亡士兵近千。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华北局批准军政委员会《关于处理叛军、土匪、逃亡官兵及缴获武器的决定》。5月，省军区召开军师军政干部汇报会，专门研究加强团结，教育多数与平息少数叛乱部队两大问题。在平息叛乱中，各部队贯彻军事围剿和政治争取的方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同时，对部队加强团结教育，揭露和取缔军队内的国民党组织活动。董其武视察各部队，响亮地提出“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的口号。一一一师副师长庞茂青煽动一个团叛变，被觉醒的排长孙胜打死，部队全部归来。七月以后，部队出现了转机，二千多名受蒙蔽的战士主动归队。在此期间，还破获特务案件55起，抓获特务113人，主动坦白193人。奉军委命令，又于1950年11月依法逮捕了与国民党保持秘密联系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第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张璞、骑兵四师师长鄂友三3人，挖出了祸根，基本制止了叛乱。

在政造部队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鼓励和支持。1950年4月，我和董其武先生奉

命到北京汇报工作。我们先后向华北局和政务院汇报后，受到了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同志的赞扬。毛主席知道后，于4月27日晚7时接见了我和董其武。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毛主席表扬了绥远的工作。他们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蒋介石与人共事是讲权术，搞宗派。因蒋介石为私，我们为公。毛主席谈古论今，和我们畅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他勉励我们过好“三关”，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5月12日至25日，我们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总结交流改造部队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悼念烈士

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发来贺电，赞扬起义部队“一年来由于贯彻毛主席团结进步的方针，由于党、政、军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部队政治觉悟水平逐步提高，使军队和地方间、官兵间以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间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并在整训部队、参加生产和肃清匪特等重大任务中取得了成绩。之后，毛主席在我们的总结报告上兴奋地写道：“进

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在庆贺之际，我们怎能忘记为部队实现解放军化而献身的188位烈士。1950年12月19日下午2时，绥远省各族各界代表两千多人，在归绥市舍利园召集会，沉痛追悼为部队解放军化而献身的烈士。

会场四周满布着各族各界赠送的挽联和花圈。主席台上悬挂着彭志超、幕生海、王锦云等三同志的遗像，供奉着188位烈士的灵位。我在会上讲了话。我说：“今天我们追悼的烈士有党、政、军中的新老干部和蒙汉同胞，他们为人民的事业而光荣牺牲，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反革命分子虽然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破坏，并杀害了我们的同志。肯定的说，他们是失败了，人民胜利了。对这些反革命分子，都已经或将要给予严厉的镇压。我们今天警告这些反革命，如果继续破坏和捣乱，终究逃不脱人民的法网。”在追悼会上，董其武和姚喆也讲了话。

第二天，《绥远日报》详细报道了追悼会的情况，并发表了傅作义先生和我的题词。傅先生的题词是：“为实现解放区化、解放军化死难诸烈士永垂不朽！”我的题词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党的政策和任务而牺牲的诸同志死的先荣伟大。我们要做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彻底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保卫人民大众的利益。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侵略战争，引起了世界人民强烈谴责。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绥远省各族各界二万二千余人在归绥市集会，庆祝建军节。同时，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的集会游行。下午4时多，人们象潮水一样从新旧城向龙泉公园涌来。会场里，鲜艳的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各色各样的标语漫画，交织成一片多彩的海样。火红的太阳给会场也增加了热烈的气氛。

在大会上，我首先讲了话。我讲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朱总司令亲手培育之下，建设起的一支中国人民的军队。经过23年革命战争的锻炼，这支军队已经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并忠实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无尚光荣的。我们每个指战员同志，都要珍惜我们的光荣历史，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继续提高自己，向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迈进，为捍卫人民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接着，我讲道：“现在朝鲜人民正进行着正义的

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正胜利地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和李承晚匪军进行英勇战斗。这个战争是由美帝指使他在朝鲜的走狗李承晚发动的。当李承晚匪军向‘三八’线以北进攻，遭到朝鲜人民军猛烈迅速地反击溃退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假借联合国名义，发表了一个狂妄的声明，命令美国陆海空军向朝鲜人民直接进攻，命令第七舰队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最后，我讲道：“今天，我们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十三周年，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就是要以群众的力量，抗议美帝的无耻罪行，表示我们绥远人民、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决心和意志。我们要广泛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它们在人民面前的孤立性和脆弱性。教育群众认识这只纸老虎，并有信心打破这只纸老虎的一切挑衅。我们要揭破一切离奇侵诞的谣言，高度警惕和坚决镇压特务破坏分子的一切活动。全绥远各族、各界人民要亲密地团结起来，蒙汉部队、新老部队亲密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加紧生产，加紧练兵，为解族区化和解放军化的光荣任务而奋斗！为解放台湾和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完全胜利而奋斗！”

我讲了之后，姚喆、孙兰峰也分别讲了话。接着回民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部队、青年、妇女、工商、文教代表都分别表态。大家一致表示：加紧生

产，支援前线，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决心打败美帝侵略者。

会议结束后，集会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一个抗美援朝的强大舆论在绥远很快形成。

易地整顿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广大指战员保家卫国的决心书和请战书象雪片般飞向绥远军区。我们把部队这种革命热情报告给党中央和华北局。傅作义也向毛主席建议起义部队赴朝参战，为人民立新功。这样，不仅有利于部队实现解放军化，而且对我们实现解放区化更为有利。毛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1950年11月24日，绥远军区的军、师、旅长奉命到北京接受任务，受到华北局、华北军区和政务院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向我们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易地整顿，准备赴朝参战。

12月10日，傅作义先生从北京来绥远。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部队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作为抗美援朝的第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我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

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边章武兼参谋长，袁庆荣为副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为后勤部长，潘瑞征为副部长。各军、师受命后，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层层传达动员，准备出发前工作。各团级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拟定行军计划，移交财产，安置伤员。12月22日，董其武和我下边了出发命令。三十六军于12月23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三十七军于12月23日从陕坝乘汽车或徒步行军至包头集结，25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骑四师从武川县乘汽车到归绥，12月29日从归绥乘火车出发。我和董其武率领兵团机关于12月31日下午5时乘火车离归绥。

部队驻在治州地区衡水、景县一带，司令部设在景县龙华镇。1951年1月8日，兵团成立了党委。我任兵团党委书记，边章武、姚喆、裴周玉为常委。同时，兵团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董其武任主席，我任副主席，姚喆、边章武、裴周玉、王克俊等为委员。元月11日，在龙华镇召开兵团机关成立大会。我和董其武分别讲了话。

1月20日，我和董其武、裴周玉到北京参加华北军区高干会议。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和刘澜涛同志的报告。1月30日，军政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华北军区会议精神，讨论了1950年兵团工作任务。2月19日，华北军区又电令我和董其武到京接受任务，要

求兵团半年完成入朝前的整顿工作。我们回到龙华后，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指示，落实措施，保证完成各项整顿任务。

从1951年2月中旬开始，部队首先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特务、反革命分子，自我教育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进行，我们制定了有关政策规定，以便分清界限；组织试点，借以正确指导运动。运动中，我们广泛发动战士，进行新旧对比，讨论为谁当兵，提高阶级觉悟；控诉揭发反动阶级的罪行，肃清部队反革命分子。有的同志脱下自己的衣服，露出被毒打的伤痕，控诉军阀主义的罪行；有的拿出母亲的青丝和姐姐的遗书，控诉地主老财的罪行；有的揭发反动军官勾结土匪特务杀害政治干部的罪行。一个战士拿出一件血衣，控诉特务把一个逃亡士兵刺了37刀、并掏出肝肺叫死者父亲吃的罪行。这个战士哭得泣不成声，当场昏倒在地。在场的战士无不悲痛，愤怒高呼：“打倒军阀主义！”“为阶级兄弟报仇！”在这一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有一千六百多人受到表扬奖励成立功，有一千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八百多人提拔为干部。同时，还揭发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905人，参加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1,924人，交出私藏长短枪133支。对这些人，我们都本着团结改造的方针分别进行了处理；对血债累累、起义后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少数人，依法

惩处；年老体弱的进行转业安置；其余的或留部队工作，以功赎罪，或调入教导大队学习后重新分配工作。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华北军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制定了部队参战的整编方案。部队整编的基本原则是：保存傅作义老部队的底子，适当照顾各个山头，以体现团结合作政策；年老体弱转地方工作，编余干部参加学习，生活待遇不变；反对强迫命令，做好骑兵下马工作。

3月底，我和董其武、边章武、裴周玉联合签发了兵团整编命令。兵团辖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三十六军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三个师，三十七军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撤销原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四师独立骑兵旅、三十六军骑兵旅、三十七军骑兵旅。骑兵下马，部队分别并入三十六、三十七两个军的步兵师内；一一一师部队编入一〇六师，后为空架子师；一〇八师也是空架子师，负责接收管理留后编余人员。部队整编后，战斗力增强了，但缺员相当严重。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河南、江苏征集了两万名新兵，给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也改变了部队的成份比例。新兵入伍后，全兵团又掀起了练兵热潮。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初步形成了定向解放军化的新型军队。

赴朝参战

1951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边章伍、姚喆任副司令员，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王克俊任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升初任后勤部长。并要求我们于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1日，毛主席命令我兵团于9月3日出发入朝，担任秦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同时，还命令姚喆同志率必要的参谋人员于9月2日乘飞机到安东，与空军联司进行会商，联系入朝具体任务。接到命令后，兵团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传边落实，并派袁庆荣率先遣队提前到安东，筹备部队住房与入朝前的物资补充问题。9月3日，三十六军乘火车出发；9月5日，三十七军乘火车出发；九月八日，兵团直属队乘火车出发。我们离开驻地时，受到河北省委、政府、军区领导同志和驻地群众的热烈欢送。当我们路过天津、沈阳时，还受到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沿途所经之处，群众端茶送水，手持彩旗，挥舞鲜花，表示对志愿军的敬爱之情。

9月8日14时，我们兵团直属队到达安东。当天

晚上，姚喆同志介绍了入朝的具体工作。第二天早晨，我到镇江公园鸟瞰全市：安市与朝鲜一江之隔，三面环山，一面临鸭绿江，城市已被美机炸得房倒屋塌；远处有十多架轰炸机隆隆作响，全市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9月10日上午7时，在镇江公园我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会。我作战前动员报告。上午10时，兵团党委召开了会议。会议强调做好团结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防奸防空工作，减少伤亡；严格执行纪律，部队和群众分开居住；加强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与苏军和朝军搞好关系等。同时，军政委员会还向各部队下达了任务，确定了入朝路线。三十六军率一〇六师及一〇七师的三一九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云山，进入价川郡院里，担任院里机场的修建任务，三十七军率一一〇师及一〇九师的三二五团，经朔州、清城镇，进入龟城郡南市郊，担任南市机场的修建任务；兵团率兵直及一〇七（缺三一九团）、一〇九师（缺三二五团），跨过鸭绿江后经朔州、龟城，进入泰川郡，担任泰川机场的修建任务。

9月9日下午五时，兵团先头部队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9月11日8时，我们兵团直属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之后，由于路线生疏，道路坎坷，敌机干扰，夜行晓宿，行军十分困难。11日4时从义州出发后，我的司机因过度疲劳，吉普车不幸碰

到山嘴。我的头部受伤，右眼出血，经急救才脱险。
9月18日前，各部队分别到达施工地点。

为了统一集中领导，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修建委员会。董其武任修建委员会主任，我任政治委员，姚喆和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朝鲜检阅相金元凤任副主任。9月16日，修建委员会在泰川郡山城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司令部对修建机场的指示及委求，并确定成立各机场修建委员会分会。价川郡院里机场为第一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一分会，王建业任分会主任，张惠源任副主任，康建民任政治委员；龟城郡近郊南市机场为第二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二分会。张世珍任分会主任，卫景林、冯梓任副主任，帅荣任政治委员；泰川郡的泰川机场为第三工区，设修建委员会第三分会，王克俊任分会主任，工程大队长王连峰、泰川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得兰任副主任。各分会设指挥部、政治部、工程部、材料运输部，分别贯彻执行上级施工计划，保证施工质量和物质供应等。

在施工中，广大指战员以战斗的姿态，不怕流血牺牲，克服各种困难。天寒地冻，战士们提出：“心热不怕寒冷，困难挡不住英雄”的豪迈口号。兵团战勤队刘双喜，一天装卸水泥二十吨，超过定额两倍；后勤部司机何泽民连续出车七昼夜；炊事员一人做35人的饭，还亲自打柴，送水送饭。缺少工具，战士们

提出“劳动和技术相结合，克服困难就是胜利”，自造工具6,744件，大大提高了工效，采石工效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四，运石工效提高了五倍半。在修建中，敌机日夜轰炸，投弹6,850多枚，其中定时炸弹1,900多枚，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出“敌人能炸，我们能修”，“敌人有钢铁，我们有石头”，在敌机轰炸下坚持施工，并冒着生命危险，共起挖定时炸弹900多颗，尽管有的定时炸弹竟深埋三、四米。起挖炸弹时，有几十个同志献出了生命。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以更高的热情忘我施工，用加快工程进度的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10月20日，南市机场完工。10月29日，泰川机场完工。11月14日，院里机场完工。三个机场都提前完成修建任务。全兵团共投工107万个，修建宽60公尺跑道共6,000公尺长，滑行道、联络道共9,437公尺，飞机掩体193个，停机坪8个，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

1951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分别向我们发来贺电。中央军委贺电说：“二十三兵团人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干扰下，终于超计划地完成了任务，甚好。”华北军区的电文是：“部队经过此次修建任务的锻炼与考验，涌现了许多英雄。情绪更加旺盛，斗志更加坚强，部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有显著提高。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各种工作有了成效。对全

体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胜利完成任务，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在修建中牺牲的烈士致以哀悼；对负伤的同志，致诚挚的慰问。望在部队中很好宣传这一胜利。并做好评功工作，以激励斗志。对牺牲烈士做好登记，通知地方政府及其家属；对伤员病员做好慰问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同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还授予我、董其武、姚喆、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六人各一枚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并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授予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一枚，以表示朝鲜人民之热爱和感谢。并希望再接再励。为争取朝鲜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结束而努力。”这是全兵团的光荣，是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成果。

修建机场任务完成后，正当我们准备开赴朝鲜东海岸参战时，战局已发生了有利我方的重大变化，美国被迫进行板门店谈判。11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调回国内整训。12月下旬，部队到达河北省定县。在这里，我们发动群众进行评功、庆功，总结抗美援朝参战经验。全兵团共评出立功者2,600多人，发展了1,000多名党团员。从1952年1月到4月，

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安排，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5月，兵团党委向中央和华北展写了《关于部队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总结报告》后，我就离开了部队，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岗位。

后 记

今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六十三个年头。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奋斗。我们的民族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封建主义和殖民地的桎梏，已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高歌猛进。

这本回忆录是我经历的回顾，也是我向党的汇报。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党精心培养的结果；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是党给了我马列主义的信念；在艰难的斗争环境里，我能取得一点成绩，是党正确路线的座力。我的工作绝非一贯正确，而是从错误中闯出来的。我没有惊心动魄的业迹，只有党叫干啥就干啥，老老实实跟党走的足迹。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我认识了一个真理：坚定不移跟党走，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在革命斗争中，和我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是民族的精华，人民的骄傲。我作为一个幸存者，有责任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记录下来，以慰先烈之灵；我也有义务把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诉诸后人，以励继往开来。我的回忆录作为历史的一斑见

证，或者能对党史工作者有所参考，对青少年有所启发，这就是我的一点希望。

我的回忆录力求准确。不写道听途说之事，不说似是而非的话；对不清楚的争议事件，也不妄加评论。我叙述工作中的成绩，因为这是各族人民流血牺牲的结晶；我也不回避工作中的错误，因为这是用牺牲换来的宝贵教训。忠实地记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是我的主观愿望。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个人记忆荒疏，再加秘密工作的特殊条件，难免遗漏成舛错，万望知情者指正，不胜感激。

1985年，陕西省委经渭南地委同意，派江长录同志到北京帮我整理回忆录书稿，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整理中，中央档案馆及陕西、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北京、天津等省市的党史办公室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许多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宝贵意见，或提供了回忆文章和历史资料。全国人大法工委李伯森同志对此稿进行了反复核校。中华书局陈之向同志、内蒙古日报社常斗同志，对此稿进行了文字修改。杨成武、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刘春、潘纪文、吕剑人、张少庭、韩明、霍健、任重捷等同志对此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高克林

1987年12月